

爱心与教育 素质教育探索手记

我们为什么要办教育

余心言

读了李镇西同志写的教育手记，不由得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办教育？或者说，孩子们为什么要上学？

不能说过去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不但是思想家们、教育家们，而且千千万万为人父母者都回答过这样的问题。可惜许多人的回答过于简单。他们认为，上学就是为了读书。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是为了升学。升了学还是读书。最后的目的呢？找个好职业，过更好的生活。

于是又有新的问题出来：读好书是不是就一定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怎样才算读好书？分数高是不是就一定等于书读得好？

能够教育和受教育，是人类胜过其他生物的一大优势。人生苦短。几十年的实践，加上与生俱来的本能，获得的能力毕竟有限。面对严酷的自然界，实在不足以应付。然而，人还可以通过教育获得前人和他人从实践中得来的知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于是，人就可以一代胜过一代，并且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短短二三百万年，就从“其异于禽兽也几希”的境地，进步到如今的规模，其前途仍未可限量。

在人类的教育史上，教师作为一种专业出现，最多不过几千年（从孔子至今不足三千年）。这算是一个里程碑。现代学校的出现，不过三四百年。这又是一个里程碑。这两次大的飞跃都极大地加快了人类进步的速度。教师是天下最崇高的职业。教师之功不可没。

说教师的职业最崇高，还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是世间最高级的产品——人才。人本身就是宇宙间已知的物质的最高级形态。对这个最高级的物质形态进行加工、雕琢，当然是一种最高级的劳动。人对于人自身的认识又还远远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从事人的教育，更是一种艰苦的、带探索性的、后果往往难以完全确定的劳动。

为了教育自己的后代，人类在这方面的探索并没有停止过，而且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学校的分类、分级，学科、课程的分设，辅助教学设备以至电化教育设施的运用，实验、作业、考试、实习以及各种有益的教学方法，等等，都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

正像人类认识的每一个成果，只要向着好像是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对于教育的领域里许多有用的做法，如果忘记它们只是达到培养人才目的的手段，就完全有可能因为固守这些做法而远离我们的目标。因此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探索更加完善的做法。许多有志的教师正在这样做。李镇西同志的手记反映了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可喜成果。

从李镇西同志的手记里，我们可以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首先是认清自己的教育活动的目标，不是一张张的成绩单，不是一堆分数，不是高一级学校的录取通知，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人才，是能够在未来社会中站住脚跟，开创事业的人才。这样的人才，不仅要在学校里读书，通过读书获得一定的扎实的知识，更需要终身有读书的兴趣，求知的欲望，并且有能力自己学习，有能力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有能力吸取这些知识。这样的人才还要能够正确地处理社会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经历顺利和艰难、成功和挫折的考验。他们需要有知识，更需要有理想，有坚强的意志，有优良的品质。这一

一切都是需要在学校中奠定基础的。李镇西同志认为，这正是自己的职责。

其次，使我们强烈感受的是李镇西同志对学生的一腔爱心。这是所有成功教师的共同经验。爱孩子才能培育孩子的爱心。爱孩子才能无微不至地关心、注视他们成长中的每一个细节，才能为他们的每一点微小进步而衷心喜悦，才能感知他们的苦恼和困惑，并且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费尽自己的心血。爱孩子，才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写下那么多手记、札记，为进一步探索教育的规律积累那么多原始的宝贵的资料。

李镇西同志对待学生的平等态度，可能是他的这本手记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他是学生的老师，更是学生的朋友，而且是知心的朋友。正因为 he 知学生们的心，他就赢得了教育引导的主动权，同时也赢得了学生对他的尊重。在他和学生之间，我们看不见有什么“代沟”。有的人用“孩子王”的说法来贬低教师。其实，要做孩子们认可的“王”，真是谈何容易！

人的成长过程，变数实在太多，因此更需要有众多的有心人用心地探索、研究。李镇西同志的这本手记，就是他的“心灵写诗”。他是把自己一颗火红的心投入到这个美好的事业中的。在这个世纪之交，中华民族振兴、腾飞急切地要求全民族素质提高的时候，出版他的手记，相信会受到许多教师的欢迎，也会受到许多家长的欢迎。同时我还相信，一定还有许多李镇西的同行们，也有他们的札记、手记。

我们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出版。

1998年5月

（本之作者，原名徐惟诚，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现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

引言：高扬民主、科学、个性的教育旗帜

——我的教育思想历程

世纪之交的中国基础教育，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当首推“素质教育”。

对于素质教育，已经有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少精辟深刻、令人折服的见解。我是长期在基础教育第一线从事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因而不具备宏观的、高层次的理论思维，但十多年鲜活的校园生活使我对素质教育不但全身心地拥护，而且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素质教育”的大旗上，有一个大写的“人”字：它是目中有“人”的教育，是充满人性、人情和人道的教育，是为了一切人全面发展的教育！

我的这个理解，不是纯理论思考的结果，而是十几年教育实践赋予我的思想结晶。

不知我这样说是否有拔高自己之嫌：刚参加教育工作时，我有一种真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当然来自我少年时代所受的关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但更来源于我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深深忧虑。

记得当时就有同事对我调侃道：“你把胡耀邦该操的心都操了！”

是的，现在想起来，那时我的“庄严”与“神圣”的确有些幼稚，但我那颗真诚的责任心（后来成了我的事业心），至今未曾褪色！

就理论素养而言，我当时堪称“一贫如洗”。我只是凭着一腔热情便“赤膊上阵”了：一天十几个小时和学生“泡”在一起，真正成了“娃娃头”！

开始对教育进行一些肤浅的理论思考，是在我出手“教训”欺负我班学生的学生之后的反思。

正是在那时，我第一次读到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要相信孩子》，这本定价三角六分钱的薄薄的小册子，成了我教育理论真正的启蒙读物，我也从此成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追星族”一员。

苏霍姆林斯基在我教育生活中的出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我对打学生这种错误行为的自我教育。更重要的是，对比当时的教育现实和我自己的教育状况，我第一次站在了“人”的高度来关注教育。

从教育现实来说，当时的“应试教育”显然远不及现在，但也端倪渐显，并已引起有识之士及社会各界的忧虑（当时对这一弊端的概括叫做“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已经明显开始畸形发展——在不少教育者眼中，学生的大脑就是装分数的容器。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的思想教育、能力发展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从我当时的教育状况来看，虽然我对学生充满了教育热情，但基本上是把学生仅仅当做被动接受教育的客体，而未把他们看做有自己独特心灵世界、有充分主体意识的人；在我的眼中，学生是作为共性存在的教育对象，而不是一个个独具个性的人。另外，当时我虽然也注重了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几方面的教育培养，但这些教育只是孤立的“德育”、“智育”、“体育”等等，而没有意识到任何有效的教育都是互相交融渗透的。

苏霍姆林斯基一系列精辟而又通俗的论述，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他认为，我们的教育对象的心灵绝不是一块不毛之地，而是一片已经生长着美好思想道德萌芽的肥沃的田地，因此，教师的责任首先在于发现并扶

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一株幼苗，让它不断壮大，最后排挤掉自己缺点的杂草。

他提出，教育者的使命，就是让孩子各方面和谐地发展；这种和谐发展的前提是对每一个学生个性的尊重：“和谐的教育——这就是发现深藏在每一个人内心的财富。共产主义教育的明智，就在于使每一个人在他的天赋所及的一切领域中最充分地表现自己。”

他还十分注重“集体”这个有力的教育工具，特别强调集体中“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他一方面指出，“集体是在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智力、共同的情感、共同的组织这几个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如果学生没有个性，那就不会有集体”。

.....

要想用三言两语概括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观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认为，他全部理论的基石无非就是一个朴素而富有 人情味的愿望：把每一个学生培养成幸福的人！他说，教学大纲、教科书规定了给予学生的各种知识，但是没有规定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一样东西，这就是：幸福。他的教育信念就是：“要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他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想。

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是那樣的通俗，语言是那樣的亲切，连书名也充满了“人”的魅力：《要相信孩子》、《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关于人的思考》、《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怎样培养真正的人》.....

可以说，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是在我教育生涯的早晨投下的 第一缕金色的霞光。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苏霍姆林斯基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来写《教育日记》的精神和做法，也深深影响了我。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我也一直坚持写《教育日记》、《教育手记》和《教育随笔》。

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未来班”，是我第一次有意识的比较系统全面的教育实验。其具体做法，在我另外一本书里将有详尽描述。在这里我只想强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来班”的教育实践是成功的，其标志固然是它符合了许多通常教育评价的“硬指标”；但在我的心目中，得意之点主要在于：我自觉地发挥了“集体”的教育功能，注意了各种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有机融合，善于引导学生自我教育，开始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及其精神世界的充实，有意调动学校以外的积极因素参与教育.....

更重要的是，“未来班”为学生的班级生活和我的教育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学生通过生机勃勃的集体生活，切身体验到了成长的乐趣、发展的乐趣、创造的乐趣，他们拥有了自己充实而美好的精神世界；我通过学生的幸福体会到了自己的幸福，通过对“未来班”的创意、建设和发展体会到了教育科研的意义和教育艺术的魅力所在。

我当然不能像“事后诸葛亮”似地夸耀自己如何如何在十几年前就在搞“素质教育”了，但是，我最初的教育探索的目的，就在于试图纠正当时“片面追求升学率”这种教育中存在的弊端，而且也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然而，“未来班”教育模式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虽然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继续向前推进的教育探索，便逐步显示了“未来班”教育的缺陷，这就是：重继承，轻创新。

我是在对“宁小燕”自杀事件的剖析（参见本书《沉重的思考》）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自己的教育缺陷的：革命传统教育永远是需要，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教育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德育永远不可缺少的，但是，面对变化了的社会和日益发展的时代，如果我们的教育不及时更新内容，那就必然会被社会和时代所抛弃；而且，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是“玫瑰色教育”，那么，所培养的学生一旦走上社会必然会碰壁。

“未来班”在具体的教育方式、手段和技巧上，无疑有许多创新，但其教育内容或者说贯穿其中的教育灵魂，却仅仅是力图继承恢复我国五六十年代的道德风尚。在“未来班”，我和我的学生也的确营造出了《青春万岁》中那样一种纯真温馨的集体舆论和班级氛围；但是，我所培养的“郑波”们、“杨蔷云”们（郑波、杨蔷云均系《青春万岁》的主人公），从我这儿出去后，面对迥异于五六十年代风气的社会现实，肯定会产生“宁小燕”式的迷茫。这对我的教育来说，无疑是一种尴尬！

而当时日益汹涌的改革大潮，无疑呼唤着一种既深入学生心灵又真正面向未来的教育。一方面，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紧张的生活节奏，学生的青春期心理疾病渐渐增多，需要教育者深入每一个学生的心灵，而过去我们的教育除了“政治思想工作”，几乎没有真正的心理辅导和心理保健。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并期待着对公民的独立人格、法治观念和民主精神的培养成为我们教育的应有内容。另外，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人才观念、创新意识、平等意识、守信意识、自立意识、破釜沉舟的冒险精神、越挫越勇的进取精神、机动灵活的应变能力、明察秋毫的预见能力以及人际关系处世艺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传统德育所缺乏或比较薄弱的。

1983年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无疑是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第一声春雷；而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则掀起了中国教育改革的第一页壮丽诗篇。万里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是给我以强烈的心灵撞击：“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什么叫‘好人才’？一句话，就是新时代需要的人才。……这个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应该是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这样的人才，才能真正成为新时代的主人和人民的公仆。这样的人才，当然具有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和民主的作风。如果缺乏这种时代精神和新的品质，没有理想、没有纪律、没有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不管有多少知识，也不能算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在这篇讲话中，万里同志尖锐地抨击了传统教育的弊端：“我国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教育内容是固定的、僵化的，教育的任务就是灌输这些内容，不能稍加发挥，不能问个为什么，更不能怀疑，考试按固定的内容和格式照答就行，把学生引导到追求高分上去。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唯书、唯上，必然缺乏创造性和进取精神。历史上，凡是对人民做出较大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是或多或少地突破这种教育思想的结果。……我们现在要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就应该改革

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大大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创新的精神。”

这一时期，我发表了一系列教育反思的文章：《商品经济的德育思考》、《中学德育危机原因初探》、《从理想的天空到现实的大地》、《正视历史的进步》、《回答学生关心的问题》、《德育的困惑》、《关于改进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德育观念的十大碰撞》……

以现在的眼光看，发表于1987年到1990年期间的这一系列文章，观点也许偏激，认识也许片面，论述也许肤浅，但是，其中对教育现状的忧虑是真诚的，对教育弊端的思考是严肃的，对教育改革的期待是热切的。

当然不仅仅是忧虑、思考和期待，我也在实践中充实我的教育内容并改进教育方法——

我将学生青春期心理辅导纳入教育内容，系统地开展了学生青春期心理教育。通过专题讲座、个别谈心、书信交流等形式，真正走进学生心灵，对他们进行富有个性化的引导和培养。我写下的近二十万字的学生心理咨询通信和青春期教育论文，是我对这一教育探索的结晶。

我继续进行班级集体主义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与过去不同的是，我在注重发挥“集体”对个人的教育功能的同时，更注重集体中个性的正常发展，使“集体”成为个性发展的健康摇篮，成为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载体。同时，我还对集体主义教育中压抑个性、依赖教师、追求虚荣等“假集体主义倾向”进行了研究和剖析。1990年全年的《河南教育》特意为我开辟了“集体主义教育漫话”专栏，发表了我一系列的相关论文。

在班级管理上，我进行了“用‘法治’取代‘人治’”的探索。我大胆破除传统班级管理中的“人治”思想，采用体现民主观念和法治精神的班级“法规”对班级实行“法治”管理。我的这一探索被《中国青年报》、《天津教育》披露后，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天津教育》为此还专门展开了讨论和争鸣。虽然我的这一探索不是完美无缺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但我所遵循的基本精神——让班级管理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另外，在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方面，在语文教学民主化的摸索方面，在教育个性化的尝试方面，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的研究与实践方面……我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我开始被邀请到省内各地各学校讲学，后来又应邀到天津、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市汇报交流我的教育改革体会。我在宣传自己教育主张的同时，又得到了许多教育同行及专家的指导。

决不人云亦云，做一个勇于独立思考的教育者；决不因循守旧，做一个善于创新的教育者——是我那一时期教育的自觉追求。

1991年初，我从乐山一中调到成都玉林中学，虽然仍然是当班主任和从事语文教学，但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这次调动是我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

由于正式调动不很顺利，我在成都过了两年“单身汉”的日子，我因此而有更多的业余时间读书、思考和写作。

我重新读了我书架上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所有著作；同时，第一次完整地通读了《论语》、《孟子》和《庄子》；读了《外国教育史》、《人格心理学导论》；还读了一些与教育没有直接联系的书，如《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思想史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等等。我试图从更深远的中外

教育发展史和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来思考教育，并从更多的科学理论中汲取教育养料。在这一时期所读的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和叶圣陶的著作。我以前只是“语录”式地接触过这两位教育家的一些观点，现在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陶行知文集》和《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说实话，我的阅读远远谈不上是精读，还只是浮光掠影的浏览，尽管如此，我还是被两位教育家博大精深而又富于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所震撼。联系我以前读过的苏霍姆林斯基，我不禁感叹：这几位教育大师的思想与我们今天的教育现实实在是太贴近了！他们所言所论，就仿佛是针对今天中国教育的弊端而发出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一些教改“新观念”，早在几十年前或更早，就被这几位教育家提出来了！

我以这些理论思考总结我的教育实践，完成了两本专著的写作：一本是《青春期悄悄话——致中学生朋友的100封信》（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一本是与人合写的《班主任工作指导》（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另外，还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十几家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教育文章。

在教育实践方面，我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生进行个性教育、民主教育和生活教育的研究和尝试。所谓“个性教育”，就是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学生个性的教育，其核心是学生创造精神的培养。所谓“民主教育”，就是学生独立人格、平等意识、法治（注意：包括“法制”，但不仅仅是“法制”）精神等现代观念的教育。所谓“生活教育”，就是教会学生把书本知识转化为生活能力，把学校教育与日常生活沟通，把时代的活水引入课堂，把教育的空间扩展到社会的天地。

我在进行这些探索的时候，脑子里当然没有“素质教育”的概念，但对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叶圣陶等教育家的理论学习和我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的回顾，使我形成了一个质朴的认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着眼于每一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培养“考试机器”；因此，唯分数至上的所谓“教育”，是目中无“人”的伪教育！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很质朴的认识，我开始对越演越烈的“升学教育”（这是我当时的概括）进行无情的抨击。在一篇题为《教育的魅力在于个性》的文章中，我这样写道——

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这话在中国似乎从来就未真正做到过。就目前中学教育而言，“成”的标志，从理论上讲，是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事实上，“成”的惟一标志只是学生们的升学分数以及学校的升学率。这使许多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虽然胸怀教育科学与教育民主的顽强信念，却不得不在“升学教育”的铁索桥上冒着“学生考不上大学一切都是白搭”的舆论“弹雨”，艰难而又执着地前行！

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教育评价：假如某位班主任的工作富有特色（比如班级管理尽可能交给学生，平时尽可能开展各种有益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等等），尽管在当时就可以判断出这些做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但周围舆论仍然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几年后的高考：“工作倒是蛮有新意的，可万一高考滑坡怎么办？”“哼！就会搞一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到时候高考可有好戏看了！”……几年后，假若学生高考成绩不错，人们会齐声喝彩：“你看，人家的班级管理那么放手，而且又搞了那么多的班级教育活动，高考成绩仍然这么好，他确实有两下子！”相反，若高考成绩不理想或低于人们的期望值，同样的人也许会说：“班级管理那么松散，还搞了那么多与高考无关的活动，高考当然会砸锅——我早就料到了！”

于是，在当代中国，几乎任何一位“优秀教师”“优秀事迹”的辉煌大厦，都必须以其班级大大高于所在年级、所在地区平均水平的“升学率”作为支撑的主要栋梁，否则，他的一切教育思考、探索与创新都等于零！

不能简单说这种社会评价舆论完全不合理。因为在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极大的国度，升学是人们今后就业竞争乃至生存竞争的最关键也最重要的途径；而且，使学生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但这毕竟不是惟一的目标！特别是在“升学教育”压倒一切时，不但“做人第一”、“全面发展”、“发展个性”等教育要义成了点缀的口号，而取得较高升学率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学生个性精神的丧失！没有个性的教育必然培养出没有个性的学生——缺乏心灵自由，丧失主体人格，不会独立思考，毫无创造精神！长此下去，我们的民族是很难真正屹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

马克思常用“人的解放”来说明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教育的解放”，就谈不上“人的解放”！——正在告别20世纪走向新世纪、渴望现代化、渴望在世界上彻底扬眉吐气的社会主义中国，尤其呼唤这种“解放”！

……

正是因为我（其实，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多年来就有着这样一种热切的呼唤，所以当我第一次读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到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上来”时，当我听到李岚清副总理提出“基础教育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时，是多么的欣喜、多么的激动！

时至今日，还有人“对‘素质教育’的概念提出质疑，甚至还有人‘对柳斌同志概括的‘素质教育三要义’（即‘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发展’）嗤之以鼻，认为‘搞了半天，素质教育就是这么个玩意儿’”。但是，素质教育所体现的一些基本思想：“教育学生学会做人”、“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主要是通过为每个人的个性发展服务来实现的”、“中学阶段德育要培养学生三个意识：一个公民意识，一个爱国意识，还有一个民主意识”、“要注重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教育多样性、培养目标多样化”等等，则充分表明，素质教育真正是把学生当做“人”的教育！

回顾以往读过的教育理论书籍，我感到，“素质教育”的概念虽然是近几年才提出的，但我从许多前辈教育大家的著作中，都读到了不少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精辟论述，特别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对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陶行知说：“我们此地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他明确指出，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即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进步的方针”。他还大声疾呼，要“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小孩子的双手，解放小孩子的嘴，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解放小孩子的时间”。苏霍姆林斯基说：“所谓和谐的教育，就是如何把人的活动的两种职能配合起来，使两者得到平衡：一种职能就是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另一种职能就是人的自我表现，自己的内在本质的表现，自己的世界观、观点、信念、意志力、性格在积极的劳动中和创造中，以及在集体成员的相互关系中的表现和显示。正是在这一点上，即在人的表现上，应当加以深刻的思考，并且朝着这个方向改革教育工作。”苏霍姆林斯基还以诗一般美好的语言描述道：“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

个人(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界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人的充分的表现,这既是社会的幸福,也是个人的幸福。”

在重新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时,先生有一段话特别震撼我的心灵:

“要想完成乡村教育的使命,属于什么计划方法都是次要的,那超过一切的条件是同志们肯不肯把整个的心献给乡村人民和儿童。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惟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读着这段话,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今天的素质教育。说到“素质教育”,不少教育者往往更多的是把眼光投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设备、考试制度等等的改革,这些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素质教育决不仅仅是教育技术层面的事,它首先是一种充满情感的教育,是充分体现教育者爱心与童心的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

离开了情感,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当年陶行知所提倡的“乡村教育”是这样,今天我们所呼唤的“素质教育”也是如此。

素质教育的提出,一下照亮了我十几年教育实践中潜在而朦胧的思想萌芽,我进而提出了我的“素质教育观”——素质教育是“民主、科学、个性”的教育!它是“民主”的教育:把学生当成有灵性的人,而非“学习机器”;发自肺腑地爱每一位学生而不仅仅是少数“尖子生”;教师把自己视为与学生在人格、尊严和情感上平等的朋友和探求真理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同志。它是“科学”的教育:严格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而不是硬套经济规律,以致把学校办成工厂,把学生当成商品;同时更要符合学生心理的实际和他们的认识发展规律,把教育学生的过程还原为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它是“个性”的教育:尊重学生在性格、情感、思想等方面的独特性,特别应尊重学生的精神世界;要求教育者摒弃“应试教育”中的“一刀切”,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尊重学生的个性,还意味着不用升学与否来衡量学生是否成才,而是尊重学生未来的发展,坚信每一个学生都会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以“民主、科学、个性”为主题,我写了两篇文章:《语文素质教育的思考与实践》、《教育呼唤民主、科学与个性》。前者是谈语文教学改革的,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杂志;后者是谈班主任工作改革的,发表在《中国教育报》。同时,我又在四川《华西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组谈“素质教育”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均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

1997年9月,我来到具有悠久办学历史和优良文化传统的“中华名校”成都石室中学任教,又开始了素质教育新的探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新的世纪已曙光初露,素质教育尚任重道远。我个人的力量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仍然希望通过自己坚韧执着的探索,顽强地证明——

尽管也许还会有碰撞,但素质教育这只世纪鲲鹏,毕竟已经顽强地起飞了!

我把一篇题为《素质教育:在碰撞中顽强起飞》的文章的最后一句话,移植过来作为这篇“思想历程”的结尾,是想表达一个同样顽强的信念:“素

质教育”的旗帜终将在中国的每一座校园的上空猎猎飘扬！

我谨以这本《探索手记》，献给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教育，并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留下一页“素质教育备忘录”。

1998 年 1 月 8 日

爱心与教育

素质教育，首先是充满感情的教育。一个受孩子衷心爱戴的老师，一定是一位最富有人情味的人。只有童心能够唤醒爱心，只有爱心能够滋润童心。离开了情感，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

手记一：爱心和童心 ——我和学生的感情故事

关于爱心和童心的随想

常常有人问我：“当个好老师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

我总是不假思索地这样回答：“拥有一颗爱学生的心！”

已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不过，按我的理解，这“高素质”的第一条应该是乐于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这当然早已不是什么“新潮观点”。从孔子的“爱之，能勿劳乎？忠之，能勿诲乎？”到夏丏尊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从罗素“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格还是智慧都不能充分地或者自由地得到发展”到苏霍姆林斯基的“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们教育思想有所不同，教育风格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爱的教育”。

素质教育，首先是充满感情的教育。

一个真诚的教育者必定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者。

一个受孩子衷心爱戴的老师，一定是一位最富有人情味的人。

只有童心能够唤醒爱心，只有爱心能够滋润童心。

离开了情感，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

但这种情感，不是装模作样的“平易近人”，也不是教师对学生居高临下的“感情恩赐”，甚至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教育目的而采取的“感情投资”（我对这种充满商业气息的说法向来十分反感），而是朋友般平等而真诚的感情。

感情当然不能取代教育，但教育必须充满感情，然而，有时候师生之间相互的感情并不一定有着明显的直接的“教育功利”目的。如果师生间建立起了感情的良性循环——教师经常想：“这么好的学生，我怎么能想方设法地把他们教好呢？”学生经常想：“这么好的老师，我怎么能不好好听从他的教育呢？”——那么，我们的教育便现出了成功的曙光！

爱学生，就必须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而要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就必须首先把自己当做学生的朋友，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每个孩子都引起我的兴趣，总想知道，他的主要精力倾注在什么上面，他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他有哪些快乐和痛苦等等。我的小朋友圈子一天天扩大，并且像我以后才意识到的那样，连我不曾教过课的那些孩子也成了我的朋友和受我教育的了。”——当我第一次读到苏霍姆林斯基这段真诚的话时，我竟感动得眼睛都湿润了：一个享誉全球的大教育家竟然有这样一颗爱孩子的童心！还是这位我敬重的教育家，曾在一个春天，和他的学生们共同买了一条小木船，然后划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上去探险。教育家写道：“可能有人会想，作者想借这些事例来炫耀自己特别关心孩子。不对，买船是出于我想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而孩子们的快乐，对于我就是最大的幸福。”（苏霍姆林斯基：《巴甫雷什中学》）

教师对学生真挚的爱是我们感染学生的情感魅力。有些教师总喜欢在学生面前表现出“高深莫测”、“凛然不可侵犯”的“派头”，从中体验着自

己的“尊严”。其实，这不是尊严，只是威严。真正的尊严是敬重而非敬畏。师生在人格上应是绝对平等的，教师不应自视比学生“高人一等”。因此，我们对学生的爱，不应是居高临下的“平易近人”，而应是发自肺腑的对朋友的爱。这种爱的表达既是无微不至的，又是不由自主的：上课时面对学生的问候，我们不是礼节性地点点头，而是充满真诚感激之情深深地鞠躬；气温骤降，我们感到寒冷时，急切地提醒学生“多穿一件衣服”；学生生日到了，班主任笑咪咪地送上一张贺卡；节假日，邀约学生（或被学生邀约）去远足郊游、去登山探险；在课余，与学生一起评论甚至争论一下北约东扩的影响、中东和平的前景或马拉多纳或郝海东……当我们把爱心自然而然地献给学生时，学生会不仅把我们当做老师。这时我们获得的尊严，就不仅仅是教师的尊严，更有朋友的尊严、同志的尊严、兄长的尊严、父亲的尊严。

教师真正的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我们个人的主观感受，而是学生对我们的道德肯定、知识折服和感情依恋。当我们故作尊严，甚至以牺牲学生的尊严来换取自己的尊严时，学生根本不会买我们的账，只会向我们投来冷漠的眼光；当我们“无视”自己的尊严，而努力追求高尚的品德、出色的教育、真诚的感情，并随时注意维护、尊重学生的尊严时，学生会把他们全部的爱心和敬意奉献给我们。这样，我们便把自己尊严的丰碑建在了学生的心中！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朴素的真理——

教育者的尊严是学生给的！

本来，从某种角度看，我其实是很不适宜于当老师的，因为我性子太急躁，常常忍不住就发火甚至对学生态度粗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当老师又有着自己的可能是独特的优势，这就是我很爱孩子，或者说我的性格里面本身就有许多“孩子气”。就教育技巧或者说教育艺术而言，我有许多致命的弱点，因而在我的教育历程中，有过不少至今想起来还令我脸红的失误，但是，只有一点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有一颗童心！

这颗童心，使我深深地爱着我的每一届学生、每一位学生；这颗童心，使我的学生原谅了我对他们有时抑制不住的暴怒；这颗童心，不止一次使我和学生一起欢笑，一起流泪；这颗童心，使我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学生的情感世界，也让我的学生常常不知不觉地拨动了我的情弦……

爱心和童心，是我教育事业永不言败的最后一道防线。

情洒童心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出于爱孩子的天性，我几乎整天都和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学生泡在一起，因此，学生们喜欢我，他们的家长也很感动。

我首先得到的关怀，来自学生们的家长。

汪斌同学的父亲来学校看我，见我的单身宿舍里除了书桌、书架和床以外，唯一的炊具便是一个煤油炉子，他便对我说：“李老师，您可要注意身体啊！要学会照顾自己，尤其是要加强营养。”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给我带来一筐鸡蛋，说是让我补补身子。可我怎么能收学生家长的东西呢？我推让了很久，但他硬要我收下，我只好收下了。

这位家长走后，我老觉得不安，便想了个处理这一筐蛋的办法。

第二天课间操时，我用煤油炉子煮了一个鸡蛋，然后，叫来汪斌，把热鸡蛋塞给他：“这是你爸爸托我给你煮的，快趁热吃了！”

于是，我开始每天都定时给汪斌煮一个鸡蛋，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后来，有老师知道了这件事，都说我“太爱学生了”，我却不好意思地说：“他是我表弟！”

是的，我没有把握我对学生的赤诚能够被所有人理解，相反，那时年轻幼稚的我生怕别人说我“假得很”……

1983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这年春天，我因劳累过度，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连续几夜不能入睡，医生不得不决定让我住院治疗休养。

我本不打算告诉学生，想悄悄离开学校，以免学生们感情受到震动。可临时代我做班主任的冯老师却在她上体育课时告诉了学生们，于是，在离校那天下午我为学生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教室里哭成了一片！

放学后，许多学生又含泪来到我的宿舍，韩军、李松、张红霞等几个孩子天真地问我联系好医院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他们愿意帮我找“最好的医院”。

一批学生走了，又一批学生来了，就像我永远不会再教他们似的。

天色已晚，我的头也有些昏沉沉的，便准备回我母亲家了。可又来了几位女同学：许艳、毛利、黄慧萍、杨红、耿梅。

她们一进屋，就“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劝她们，但也不能让她们这么老哭下去，便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她们说：“谢谢你们来参加李老师的追悼会！”

她们并没有被我逗笑，不过哭声渐渐小些了。

过了很久，几位同学抽泣着说：“李老师，以前我们惹您生气了，做了对不起您的事。请您原谅！”

我说：“哪儿的话？你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别哭了！你们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谁知听了我的这句话，她们竟又哭得厉害了：“呜呜……是我们把您……气病的……呜呜……”

于是，我装出真的很生气的样子，说：“你们怎么不听李老师的话呢？叫你们别哭，可你们老哭！这才是真对不起李老师！”

她们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只有许艳和黄慧萍还在抽抽搭搭的。

我便给她们提希望，鼓励她们在我走后要听冯老师的话，要努力学习……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对她们说：“你们该回去了，不然会让爸爸妈妈在家里等着急！”

“李老师，让我们给您唱支歌吧！”许艳擦擦眼泪说道。

另外几个女生也说：“对！李老师，让我们为您唱支歌吧！”

“好！”我同意了，“不过等等，我把录音机打开，把你们的歌声录下来。”

唱什么呢？她们讨论了好一会儿，决定唱“李老师最喜欢听的”《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于是，在我的口琴伴奏下，简陋狭小的房间里飘出了世界上最美的歌声：

我们欢乐的笑脸，
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
我们清脆的歌声，
比那百灵鸟还要婉转！
……

我在住院的整整一个月里，每天都在想念学生；学生们也随时在想念我，来看我的学生络绎不绝，使其他病友羡慕不已。4月1日那天早晨，我偷偷地从医院溜了出来，和冯老师一起带着学生去峨眉山玩了整整一天！虽然，晚上回病房时被护士长狠狠批评了一顿：“还是当老师的，这么不听话！”但那天晚上却是我住院以来睡得最好的一夜……

于是，我经常在想：怎样才能报答学生对我的厚爱？

1987年8月31日，是高90级（1）班的新生进校第一天报到的日子。

当天夜里，我刚上床准备入睡，忽听有人敲门。

披衣开门一看，是上午报到时才认识的宁玮。

她神情紧张而急促地对我说：“李老师，周慧病了！”

周慧？我脑子里闪出一张清秀但苍白的脸，忙问：“什么病？”

“不知道。她肚子疼得厉害。”

我一看表：已近十二点。我没有犹豫，马上便跟宁玮来到女生宿舍楼下，几个女生已把周慧扶了出来。

看她弯着腰捂着肚子，显现出十分难受的样子，我决定立即送她到医院。但医院离学校非常远，公共汽车早已停开，只好用自行车送她了。

我估计她要住院，决定让宁玮和我一起去，以便照顾周慧方便些，但宁玮不会骑车。与周慧同寝室的朱建英说她会骑车，要求一起去。我同意了。

于是，我使用自行车搭着周慧来到了医院。

医生一检查，怀疑是阑尾炎，需要住院观察。

住院部在门诊部后面的山顶上，自行车根本没法上去，而此刻的周慧好像更加疼痛难忍了，小声地呻吟着，几乎走不动路了。

怎么办？我一蹲，弯下腰，让朱建英把周慧扶在我的背上。周慧过意不去，想自己走，但我已憋足劲一步一步向山上走去了。

开始还不觉得累，我一边走还一边说些话来安慰周慧。可越往上走山坡越陡，我的腿有些发颤了，大口大口地喘粗气，说话也很吃力了。与此同时，也许是痛得太厉害了，周慧在我背上又呻吟起来。我便和她开玩笑以分散她

的注意力：“周慧啊……你，好会……享受哟！……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走在旁边的朱建英“咯咯”笑了起来，周慧却一言不发，依然趴在我背上，但呻吟声几乎没有了。走了一段路，我又引用臧克家纪念鲁迅的一句诗来逗周慧：“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

走了大约 10 分钟，我们终于来到住院部。当天夜里，我和朱建英一直在病房里守候着周慧。到后半夜，她昏沉沉地睡了，朱建英也趴在床沿打着盹，而我，却望着输液瓶里的点滴，一直到天明……

一周以后，在周慧出院那天，她在彭山农村的父亲赶来了。这位朴实的汉子给我提了一只肥母鸡来，流着泪硬要我收下：“李老师，您就是我女儿的亲生父亲啊！……”

后来，周慧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高中毕业前，她回忆起进高中第一天就生病住院的情景，写了一篇作文《在我生病的日子里》：

……李老师背着我慢慢走着，头埋得很低，腰也给压弯了；他不停地喘着粗气，可还和我开玩笑：“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却在心里默默地接着诗句念着：“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其实，学生对我的爱才真正值得我“永远记住”。

更使我感动的，是我的学生不止一次“爱屋及乌”——因为爱我，进而爱我的家人。1987 年底，我爱人生了孩子后，当时的高 90 级（1）班学生背着我每人从家里拿了一些鸡蛋来，趁我外出开会的时候，送到我爱人的床前。

类似这样的“秘密行动”已不止一次。这里，让我全文引用一篇学生的作文。作者潘芳奕从初一到高三毕业整整六年，我都任她的班主任。这篇文章是 1986 年她读初二时写的，记叙的是那年秋天的事——

秘密行动

“给，这是鸡蛋、苹果，哦！还有橘子……”我小心翼翼地接过一件件慰问品，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一边又回过头去瞥了瞥正站在跑道那边和同学们谈话的李老师：他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我不禁为我们这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动而感到得意……

前两天，我们发现李老师心情很不好，有时还对同学大动肝火。经我们了解，原来李老师的妹妹因病住院了，病情很重，动了两次手术还不见好转。李老师一天到晚在医院和学校之间来回奔波，还要利用休息时间为我们读小说，晚上还要家访……心情怎么会好呢？

对于李老师，同学们都十分了解和敬重。他为我们操的心远远超过了一般班主任的职责范围。就说最近吧，他妹妹住了院，需要营养，这使本来经济就不宽裕的李老师面临“经济危机”，但他仍然继续为班上购置图书，上周男同学买足球，他又把刚刚收到的一笔稿费捐给了他们。

想到这些，我们心里很不踏实。

于是，一个个小脑袋开始凑在了一起：

“我们自己去看李老师的妹妹，好不好？”

“好倒是好。可他妹妹住在哪个医院，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

大家一阵叹息。

可这个难题还是被我们解决了。我们在同李老师谈话时，有意把话题往他妹妹生病的事上扯，结果李老师无意中说出了他妹妹住在市红十字医院。至于他妹妹的姓名，到时

候再说吧！

我们班委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一致决定：明天学校将在市体育广场开运动会，大家从家里一人拿一个鸡蛋或苹果什么的，凑成慰问品，然后我们中午去医院。放学后，李老师刚离开教室，班长吴涛就对全班同学宣布了这件事。同学们的回答都是那么响亮！

这天早上，我还有些担心：大家可别忘了，或者出什么岔，让李老师发现了。

到了广场，一看吴涛的提兜里，早已有了二十来个鸡蛋，还有一些苹果。一贯调皮捣蛋的谈俊彦出人意料地拿了 12 个鸡蛋来！陆续来的同学一个个从身上各个部位变戏法似地掏出鸡蛋、水果。我十分感动：同学们对我们的李老师是多么地爱啊！

运动会开始不久，有同学来向班委报告，听说李老师中午放学后也要去医院看他妹妹。我们当机立断：一定要抢在李老师之前到达医院！程桦、杨毅自告奋勇当了“先遣队”。程桦谎称肚子不舒服，要让杨毅陪他上医院，向李老师请了假便提前离开了。他俩一出广场便骑车飞奔去医院，打听李老师妹妹的姓名和病房……

中午李老师一宣布“解散”，同学们就行动了起来。我和吴涛，还有谈俊彦、李毅、韩广州、喻建忠、彭可佳等十几位同学赶在李老师前面，向医院跑去。

进了医院，等候在大门口的程桦、杨毅便带领我们一路跑步进了李老师妹妹的病房。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看到我们提着东西进来，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十分感动。

“还让你们提东西来看我，怎么感谢你们呢？”她欠起身子不停地谢着，“我哥哥知道不？”

我们忙说：“不知道，你可千万别告诉李老师，不然他会批评我们的。”

我们手忙脚乱地把鸡蛋、水果一股脑儿地放在了床前的桌子上，塞进抽屉里、脸盆里、碗里、杯子里……门口这时已站了好些其它病房的病人，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可我们顾不上这些，时间对我们来说十分珍贵。因为李老师随时都可能进来。我们匆匆放好慰问品，向阿姨说了声“再见，好好养病”，便迎着一双双好奇的目光，一溜烟出了病房。

刚下楼，跑在前面的程桦便慌慌张张跑回来了：“不好！李老师已经进了医院大门！快隐蔽！”我们吓得马上回头躲在旁边一间小房子的后面，大家都蹲着，尽可能地低着头。我们屏住呼吸，只听见自己的心在紧张地跳着，同时又是那样兴奋，一下子觉得自己真像电影里搞地下工作的情报员。李老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离我们身边走过去了。呀，他竟没有发现我们！

等他的背影远了，我们才一下站了起来舒了一口气，大家雀跃着，一阵风似地冲出了医院，像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这时我的心，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向那蓝蓝的天空……

我觉得我的运气好，每教一批学生，他们都对我特别好。比起学生对我的感情，我欠他们的实在太多太多！

我应该也必须还这笔债。

在八十年代，我几乎每年春节都和学生一起度过，几乎每个暑假都和学生一起游山玩水：近的如峨眉山、瓦屋山，远的如重庆歌乐山、云南石林、贵州黄果树瀑布……

如此和学生“泡”在一起，耗费精力不说，的确还很花钱。一些领导和老师都很佩服我：“李镇西简直太爱他的学生了！”我嘴上说：“不过就是一玩玩嘛！我喜欢。”心里却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接手成都玉林中学高 95 级（1）班时，我刚到成都不久，爱人和女儿还在乐山，我实际上又成了“单身汉”。于是每到周末，我都轮流把一个小组的学生请到我家做客：有时是包饺子，有时是煮火锅，有时也正儿八经地做

饭吃……我和学生一起聊天、唱歌、打扑克，闹得天翻地覆！有老师知道后对我说：“你把每个学生都请到家里吃饭，得花多少钱啊！”我只淡淡一笑，心里却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据说在电话日益普及的今天，已很少有班主任家访了——除非某个学生出现了非常特殊的情况。我每带一个班，不管是优生，还是“差生”，或是一般人说的中等生，我都坚持按学号轮流家访。我真诚地希望通过家访把我对每一位学生的爱送到他的家里。不止一次，学生家长感动地对我说：“我的孩子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您是第一个来家访的老师！”我一面对家长说：“这是我的工作嘛！”一面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1993年我教高二时，学校缺老师，校长希望我能多上两个班。我二话没说，在继续当班主任的同时，硬是承担了全年级三个班的语文教学任务，坚持了整整一年。到了1995年，学校又安排我担任两个班（共131名学生）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学任务，我仍然二话没说，咬着牙把“工作”扛在了自己的肩上。如此超负荷工作，我并没拿相应的报酬。不少同事在戏称我是严重的“工作中毒者”的同时，也为我鸣不平；但我虽有遗憾，却不后悔。因为比起学生给我的，我的付出算得了什么？只要是为学生“当长工”，我真的心甘情愿。我仍然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从当第一个班的班主任起，十几年来，我每送走一个毕业班，都要在他们毕业前夕，为他们编一本反映班级三年生活的“班级风采录”。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学期，复习、写评语、模拟考试、填毕业生档案表……该有多少烦琐的事啊！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近乎玩命儿地为学生编着他们的“班级风采录”，不，为他们铸造青春里程碑！看稿，改稿，设计栏目，跑印刷厂，校对……在那挥汗如雨的日子里，我常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14个小时！于是，《未来》、《花季》、《恰同学少年》、《少年》、《童心》……就这样诞生了。一些好心的人难以理解：这些“书”既不能作为申请职称的专著，也无助于学生高考“抓分”，何苦这样“疯狂”？我还是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还债啊！”……

1993年6月“父亲节”，广东《黄金时代》杂志搞了一个代儿女们为父亲寄贺卡的活动。我的女儿只有5岁，显然还不会为我寄贺卡。我却意外地收到了《黄金时代》转寄来的贺卡——

亲爱的老师、朋友和父亲：

我们永远爱戴您、尊敬您、感激您！

您的高95级（1）班全体“儿女”

1993年“父亲节”

手捧这张朴素而珍贵的贺卡，我热泪盈眶，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激动的心情，我在心里叹息：

看来，我对学生欠下的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了！

生日的祝福

当班主任的十几年来，真诚的师生情使“生日”——我的生日和学生的生日，成了我们共同的节日。

最初我给学生送生日礼物是出于偶然。

记不清是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我有一次布置学生写作文《忘不了妈妈给我的爱》，班上有个名叫章舒云的女生却迟迟不交。放学后，我把她留下来问她为什么不写作文，她低着头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流泪。我当时狠狠批评了她，并决定去她家家访。到了她家，我才了解到她其实是个孤儿：爸爸妈妈几年前先后病故，她平时和哥哥一起生活……

我怎么这么粗心，连班上有个孤儿都不知道呢？当天晚上回到学校，我马上找出学生报名登记册，翻到章舒云一页，上面却明明写着她父母的姓名及工作单位。我想，是自尊心使章舒云隐瞒了自己的不幸吧！

我心情沉重地久久凝视着这一页登记表，突然发现，明天就是章舒云的生日！

第二天，我特意买了一个文具盒，作为送给章舒云的生日礼物。

从那以后，我开始尽我所能地为学生祝贺生日。无论多忙，我都提醒自己别忘了学生的生日。为此，我每接手一个班，便把所有学生的生日制成两张“一览表”，一张压在家里书桌的玻璃板下面，一张贴在办公室的墙上。

我可以自豪地说，从乐山一中初 84 级（1）班起到成都玉林中学初 98 级（5）、（6）班，我教的每一位学生都收到过我的生日礼物：大到生日蛋糕，小到一张精美的书笺……

如果说，开初我为学生祝贺生日主要是表达对学生的真诚感情的话，那么，后来这种方式就在表达情感的同时有意识地注入了教育的内容。

八十年代我送给学生的礼物，最多的是书籍，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而赠送不同内容的书。刘令喜爱现代革命史，他得到的礼物是一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我希望程桦战胜自己，赠给他一套《约翰·克利斯多夫》；潘芳奕爱好古典文学，我送他一套《红楼梦》；彭艳阳思想纯正、为人善良，我送她一本《傅雷家书》；雷磊酷爱数学，我送的便是《数学思维训练》；杨鸣明喜欢哲学，我送他《通俗哲学》；范晓靖喜欢军事书籍，我便送他一本《孙子今译》……

进入九十年代，书价猛涨，我的经济能力有些承受不了，便改为赠送笔记本，并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一段热情勉励的话或一首小诗。这里，我摘录几则我所教的成都玉林中学高 95 级（1）班学生进入高三学年时，我写在一些学生生日礼物上的祝辞——

（赠翔威）今天你进入 18 岁男子汉的行列了，同时，你的肩上也就有了男子汉的使命——对自己的前途，对祖国的未来。祝贺你，更希望你——翱翔万里，威震四方！

（赠李慰萱）你在班上独占了两个“全班之最”——年龄最小，个子最高；在你满 16 岁的今天，我祝你再创一个“全班之最”——成绩最好！

（赠李成）18 岁，是生命的呐喊，18 岁，是奋进的鼓点；18 岁，是男儿的热血，18 岁，是青春的誓言！

（赠张剑）致“水手”张剑桅杆也许会折断，信念决不会击碎；躯体也许会困乏，心灵却永远不会疲惫！让意志接受大海的洗礼，让青春迎接朝阳的检阅——风浪中，你驶

进 18 岁！

（赠陈蓓）17 岁的蓓蕾，在初冬绽放，正迎接青春的太阳！

（赠黄金涛）名字也许太普通，人格永远不会平凡；生活也许很清贫，事业永远不会黯淡；歌声也许会暂停，旋律永远不会中断；理想也许还遥远，追求永远不会遗憾！

……

后来，这个班 51 名学生中，除一人读中专外，其余全部考入了大学！到了 1997 年 9 月，自我担任初 2000 级（3）班班主任起，我不得不停止了向学生赠送生日礼物，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相当多的中学生大办生日之风越演越烈，我的贺礼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是许多家长见我给学生赠送生日礼物，便要还礼，我送礼便有“抛砖引玉”之嫌。

但是，我对学生的爱没有变也不会变。

我还经常为学生举行集体生日晚会。最成功的一次，要算 1983 年 6 月 1 日，我为初 84 级（1）班学生主持的“14 岁生日篝火晚会”。我和学生们在河滩上燃起了熊熊的篝火，头上是满天星斗；身边是滚滚岷江。大家高唱《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后，我赠送给每一位同学一张生日贺卡，然后分小组表演各种文艺节目，接下来是玩“丢手巾”的游戏，后来又是一群男生和我摔跤，同学们跳啊唱啊，一直闹到深夜……

对学生的生日祝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学生之间也学会利用生日为同学送去真诚的问候。下面，是我教过的初 84 级（1）班邱梅影同学的一篇作文《生日的祝贺》——

4 月 17 日，是彭艳阳同学的生日。由于期中考试，大家只好等考完了再去祝贺她。4 月 19 日是星期日，我和吴涛、程桦、周磊、陈晓蕾、张荣焱、潘芳奕、刘忠斌等八位同学，相约来到彭艳阳家，为她祝贺生日。

来到彭艳阳家，我们发现林玲、卢婕、彭可佳比我们先来一步。我们笑着骂道：“好啊，你们三个家伙什么时候溜进来的？坦白交待！”她们急了，大声为自己争辩道：“我们可是正大光明地来给艳阳祝生的！”哟，大家都不约而同想到一起来了，真难得啊！

我们还想再吼她们几句，彭艳阳却出来打圆场了。她大叫道：“大家一起来帮我消灭蛋糕，好不好？”“好！”我们忙应道。随后我们就把大家给彭艳阳买的生日蛋糕摆在桌子中央，点上蜡烛——14 根。不知怎的，看着这 14 根蜡烛，我心中陡然涌起一股暖流。艳阳在大家的推攘下，站在 14 根蜡烛面前，一口气吹灭了。顿时，掌声响了起来。大家纷纷说道：“艳阳，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大家！”她真诚地说。从她那兴奋的神情中，我不难看出她心情是如何激动。她激动，我们也激动。因为我们都是幸福的。彭艳阳当班长时，曾给予同学们那么多的关心和帮助，给予班集体那么多的爱！今天，我们来祝贺她的生日，表达大家对她的敬意。

有人敲门。一打开：呀，是李老师来了！这下更热闹了！大家见家里没有大人（李老师当然不算是“大人”），便开始狂欢。我们在李老师的指挥下，放肆地乱喊、乱叫、乱唱……喊腻了，叫够了，唱累了，便又开始吃——于是，盘子里的广柑、香蕉在一瞬间就无影无踪，而地上则开始增添一块块果皮。洗洗手，抹抹嘴，清清喉咙，调整调整面部表情，又开始了欢唱时间在我们的欢唱声中溜走了，我们给彭艳阳写下了一句句祝愿的话语之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的家。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温馨而又热闹的下午。

教师对学生的爱，应该是无私的；但这种纯洁的爱，客观上必然赢得学

生爱的回报。1985年5月的一天，下午读报课时，我继续为学生读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每天的这个时候，都是我的“小说连播”：《青春万岁》、《爱的教育》、《烈火金刚》、《红岩》……进入中学以来，学生把每天的这个时候视为最珍贵也最美好的时光。

“保尔紧张地注视着朱赫来和那个押着他的士兵，心里在盘算着怎么才能救出朱赫来……”我在讲台上朗读着，教室里一片安静。同学们都关心着朱赫来的命运。

突然，坐后排的学习委员陈晓蕾举起了手。

我停住朗读，问：“什么事？你身体不舒服吗？”

她却离开座位走到我面前：“李老师，请您出去一下。”

我想她可能是有什么急事要同我单独谈，便对同学们说：“大家稍等一会儿。”然后跟着她出了教室。就在我走出教室门的一瞬间，我好像看到潘芳奕匆匆走上了讲台。

来到教室外面的楼梯口，我用询问的目光看着陈晓蕾，她却说：“请您在这儿站一会儿。”

我非常吃惊：“站一会儿？你们要干什么？”我转身就要返回教室，可陈晓蕾急忙把我拉住：“李老师，您现在不能进去！”

我明白自己上当了，但同时又觉得挺有趣：好吧，我倒要看看你们要搞些什么名堂！

过了大约五分钟，陈晓蕾跑到教室窗口往里面看了看，然后过来对我说：“好了，可以进去了。”

（后来，陈晓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我领着李老师走进教室时，我自豪极了，像个打了胜仗又抓了个俘虏的将军！”）

进了教室，我仔细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异常。但学生们的表情却神秘而得意，都冲着我微笑，微笑中含着诡秘，仿佛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秘密，不，是“阴谋”。

我问：“刚才潘芳奕对你们说了些什么？”

“没有说什么！”全体学生异口同声。

还有学生说：“真的没什么！——李老师，您继续读小说吧！”

我只好接着读：“保尔出其不意向那兵士扑去……”

接下来的几天，平安无事。直到三四天后，我才明白学生们的“密谋”是怎么回事。

那天我走进教室上语文课。

学生们安静了下来，我习惯地说了声：“上课！”

“起立！”随着值日生罗晓宇清脆的口令，同学们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

“同学们好！”

“祝——李老师——生——日——快——乐！”回应我的，竟是这整齐而响亮的童音！

我被这声音惊呆了。只见坐在前排的谈俊彦双手捧着一张洁白的纸走到我面前：

“李老师，这是全班同学的祝贺信！”

班长彭艳阳捧着一束还带着露水的鲜花从后排跑上来：

“李老师，这是全班同学献给您的鲜花！”

副班长张锐捧着一大摞礼品上前来：“李老师，全班同学的一点心意，

请收下！”

在我目瞪口呆之际，小小的讲台上已堆满了鲜花、生日蛋糕、影集、笔记本、手绢、书签、毛笔等各种礼物。台下，闪着兴奋而得意光芒的57双眼睛望着我，同时响起整齐而富有节奏的掌声。

“今天，并不是我的生日啊！”激动中，我真诚地向他们撒了一个谎。

“是的，今天就是你的生日！”

“5月17日，没错，我们早打听清楚了！”

“李老师，要诚实哟！”

57双眼睛恳切而焦灼地望着我！

我说什么呢？我还能说什么呢？“好……我收下……”我的声音在发抖。

“啪啪啪……”又是一阵长时间震耳欲聋的掌声。

此刻，我的心情除了感激，更多的是惭愧。我走下讲台，缓缓说道：“同学们，我受之有愧啊！我的工作做得并不好。真的，我脾气急躁，时常发火，有时还错批评同学，伤同学们的心……我对不起大家啊！”

教室里格外安静，孩子们静静地听着我激动的话语。

我说：“李老师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高尚。但是，今天同学们又一次深深地教育了我：教师的艰辛劳动所换来的报酬，绝不仅仅是金钱，而更多的，是丰厚得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这，才是今天同学们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我将把它化作无穷的力量，竭尽全力把你们教好！请同学们，不！请我的朋友们监督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带着发自内心的真诚敬意！

“啪啪啪……”又是一阵春雷般的掌声在教室里回荡，在我心头滚过。我感到，面对这57颗晶莹的心，我的心也变得更加纯净！

是的，这样的日子，对我和我的学生来说，都是永远难忘的节日！而在我的教育历程中，有幸不止一次享受这样的节日——

敬爱的李老师：

您好！

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今天是您的生日。

我们几个住校生让您多操了一份不该操的心。您的时间很宝贵，可您每天晚上总要到寝室来看看我们，不是问学习就是问生活。我们对您感激不尽。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除了好好学习报答您外，还凑钱买了一本日记本，请您收下吧！如果今天不是您的生日，这就算我们的一片心意！

祝生日快乐！

您的学生：彭艳阳 任岚 周磊

1986年5月17日

这本笔记本我至今还珍藏着。此外，每年五月，我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我以前教过的学生寄来的贺信或生日电报，有时是电话……下面，我想再一次抄录一篇学生作文——

盛开在心灵的感情之花

——给老李祝生纪实 杨 嵩

最美好的一定是最真诚的、最自然的。

——题记

公元 1990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一个普通的日子。

下午读报课，李老师照例来给同学们读小说《送你一条红地毯》。他刚走进来，教室里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不，确切地说，是每一位同学用真诚的心所奏响的最悦耳的交响乐。

李老师莫名其妙地盯着大家，竭力想从同学们那神秘、兴奋的笑容中去寻找答案。

看着李老师的窘态，我们感到了这次“突然袭击”的成功。得意之中，掌声更响了！

李老师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讲台，终于看到了放在上面的特制大蛋糕，赫然映入他眼帘的，是生日蛋糕上的“奶油大字”——

祝

李老师生日快乐！

高 90 级（1）班全体同学

掌声渐渐平息下来，教室里一片寂静，只有 60 颗心在兴奋地跳动。足足有好几十秒钟，李老师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那蛋糕，他显然是被感动了。同学们也没有说话。教室里，一种宁静、温馨的氛围正在逐渐形成，并感染着每一个人；一股浸入心灵的暖流使每一个人的身心都在被陶冶、融化。在同学们静静的注视中，李老师慢慢地将目光从生日蛋糕移到了讲桌上的另外两件礼物——一本有每一位同学签名的精美相册和一束灿烂的鲜花。他将那鲜花捧起，深情地小声说道：“这，就够了！”那神态像是在对我们说，又仿佛自言自语。

终于，李老师抬起了头，慈祥地看着同学们，略微有点激动地说：“谢谢……谢谢同学们！今天，并不是我的生日，真的不是！……但从此我将把 5 月 19 日当做我的又一个生日！……我……”李老师好像还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他站在讲台上，深深地、深深地向全班同学鞠了一躬！

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响起……

掌声终于停止了。李老师的情绪好像平静了一些，他抚摸着鲜花一字一句地说：“作为教师，还有什么荣誉比这更高呢？”停了一会儿，他又微含责备地说：“只是，为了这并不是我生日的日子，你们如此兴师动众，还有一个多月大家就要高考了啊！……”

一双双充满感激的眼睛都默默地望着李老师。大家心里都在说：李老师，三年来，您无论多么忙，总是准确地记得我们每一位同学的生日，并按时在我们的生日那天送上一份真诚的礼物。李老师，今天是不是您的生日其实并不重要，我们不过是借“祝生”向您表达三年来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罢了。如果您认为不应该的话，就请原谅我们吧，因为这是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啊！

感情的浪涛激荡着 60 颗心，但教室里仍是静静的，真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此刻，那束鲜花似乎也更加光彩夺目了——它象征着我们在李老师教育下，青春之花开得如此鲜艳；象征着李老师在未来的工作中，事业之花必将更加灿烂！

程桦同学将从家里拿来的菜刀递给了李老师，同学们“轰”地一下子笑了，于是教室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在大家的欢呼声中，李老师将蛋糕切分成 12 份：10 个小组各一份，李老师本人一份，还有一份留给他心爱的两岁女儿。

李老师走下讲台，一把蛋糕送到每个小组。顿时，整个教室一片欢腾，真正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我又一次感到师生之间的心灵是那么贴近，感情是那么融洽。

是啊！我们尊敬李镇西老师，绝不仅仅因为他是一名老师，更在于他是我们的“镇西将军”，是我们的“老李”。我们因为他具有正直、纯朴、勇于进取、敢于创新等实实在在的品质而尊敬他，因为他那杰出的才华而佩服他，因为他那令我们折服的教育思想感

激他，当然，还有他的激情，他的幽默，他的“孩子气”……都让我们感到亲切因而敬重他。但这一切绝不是对他的顶礼膜拜，而是在三年朝夕相处、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朋友般的真挚情意。我们把他当做一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甚至有缺点的人，而不是把他看做一个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的神；我们更多的是把他当做知心朋友，而忘了他是老师。正因为这样，我们将永远拥有一位实实在在的朋友——老李，而不是只在高中三年拥有一个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还有一个多月，我们就要高中毕业了，李镇西老师将不再是我们的“老师”了，但他将永远是我们真诚的朋友！

同学们还在继续欢声笑语地吃蛋糕，李老师还在笑吟吟地望着大家，他手里还捧着那束鲜花——那盛开在我们心灵里最美丽最芬芳的感情之花！

许多学生家长常常真诚地对我说：“您对我们的孩子太好了！”我也真诚地说：“那是因为你们的孩子对我太好了！”

宁玮：祝你一路平安！

矮矮的个头，看起来弱不禁风的身材；一头稀疏的黄黄的头发，让人觉得严重营养不良；一身朴实的衣着，散发着来自农村的气息；然而，比衣着更朴实的，是她苍白脸上一双善良明亮的眼睛。这双眼睛告诉我：这是一个过早就承担着家庭重担（至少经常为家庭重担忧虑）的懂事学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宁玮时的印象和感想。当时，是1987年8月30日，高一新生报名的时候。

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是开学第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从教学楼走过，突然听到楼梯转弯处的角落里传来嚤嚤的哭泣声，循声过去一看，竟是宁玮和几位住校女生在哭！她们看见我，都在黑暗中使劲擦泪。

“为什么哭呀？”我问道。

她们都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一言不发。

“是不是想家啊？”

仍然沉默，不过宁玮使劲点了点头。

于是，我把她们请到我家里，和她们聊了起来。

“想家？可以理解。”我说，“和你们一般大的时候，我也曾‘流’学他乡，也哭过呢！”

说笑中，这几位学生的情绪渐渐开朗起来……

虽然宁玮想家想得流泪，可在同寝室同学的眼里，她却像个老成的大姐姐。赵琼同学在开学不久的作文中这样描写宁玮：

报名那天，寝室里的同学一个个陆续由父母“护送”来了。宁玮最后一个到，穿一件淡绿色短袖上衣，一条白底方格裙，不高，短发，像个听话的小姑娘……床铺、蚊帐整理好后，寝室的地下满是废纸、床草，她立即拿起扫帚扫起地来。下午逛街时，周慧肚子疼了起来，脸色惨白，宁玮万分着急，急忙找到一家药店买来药，端开水给周慧喝了，接着又把周慧扶回了学校。第二天，周慧住进了医院，一放学，宁玮就叫上我赶到医

院去看周慧……我们一致推选她当我们寝室的室长。妈妈送我到学校报到时，只见了宁玮一面，便直夸宁玮懂事，走时还再三叮嘱我要跟宁玮学，有事找宁玮。是的，宁玮是我的榜样。而且，我们班许多同学都和我一样喜欢而且信任宁玮。

宁玮很快以自己的善良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她被选为生活委员。我常常看到她在课间清点着一大把钞票——她替同学们买饭菜票收的钱。

然而，在她每月经手的那么多饭菜票中，属于她自己的却少得可怜。由于家庭困难，她非常节俭。赵琼有一次悄悄对我说：“李老师，宁玮给自己规定，每星期只吃一次肉。”

我听后一惊：连两三角钱一份的肉都吃不起，可见她有多困难。但这怎么办？

在一次晚自习下课后，我把她叫到身边，塞给她五元钱：“拿着。多买些菜票，不注意身体，早晚你会垮的。”

她硬是不接：“谢谢李老师！但我不需要，我早就习惯了。”

我严肃地说：“如果不接，那我明天就通知你父母来把你领回去！”

她只好含泪收下了。

没过多久，赵琼又来找我了：“李老师，你给宁玮的钱，她根本没拿去

买菜票。她对我说，她要把李老师给她的这张人民币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这次，我真的生气了，我把宁玮狠狠批评了一顿：“连老师的话都不听了，算什么好学生！”

这学期期末，宁玮考试成绩名列班上60个同学中的第22名。这个成绩当然不能说很好，但我认为，对宁玮来说，她已经尽力了，因为她所面临的困难是其他同学所没有的。但宁玮很难过，觉得对不起苦苦供自己读书的父母……放假那天，我在校门口碰见她提着一个大包，准备去车站乘车回家。我刚叫了一声“宁玮”，便见她满脸愧色地低下了头，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心里完全明白她如此失礼的原因。望着她那远去的背影，我也很难过：这样好的学生，我对她的关心太少了！于是，寒假中，我特意给她去了一封信：

宁玮同学：

你好！代问你爸爸妈妈好！

回家一切还好吧？

放假已经好几天了，可那天你离校时，为这次没考好而呈现出的黯然神情一直还浮现在我的眼前。其实，你第一次考试就名列班上第22名，还是不错的。因为和班上许多原来就读本校初中的同学比，你对环境、对老师的教法都还有一个熟悉和适应的过程；而且，你还面临许多生活上的困难；同时，你还担负着班上的一些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指望学习上一鸣惊人，显然是不现实的。你学习是很刻苦的，我相信，你会不断进步的。千万不要因这次考试而灰心啊！毕竟这才是高中的第一次考试呀！

宁玮这一期给我和同学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善良、正直、勤奋、懂事。我为有你这样的纯朴学生而感到自豪，同时也为自己对你关心不够而感到内疚。这是我的真心话。作为你的老师和朋友，我这里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学习刻苦当然是应该的，但不注意身体，不注意营养，伤了身体反而会影响学习的。到那时，你想学习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以后你有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习上的还是生活上的，尽管提出来，好吗？

春节快到了，祝你春节快乐！

你的朋友李镇西

1988年2月10日

信寄出去不久，我就收到了她的回信。信中不乏感激之情，也谈到许多她在假期中的所见所闻及所感，而我则通过这封信，对宁玮的正直与善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我想了很多：宁玮的正直善良当然不是我给她的，但从信中看到，在她几个月的高中生活中，我无形中强化了她的这个做人的信念。我一方面为宁玮的纯洁而高兴，同时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担心什么呢？我好像又说不清。

不过，有一点我是坚定的，她的善良应该永远保持！

寒假结束后的一件小事，再次显出了宁玮人格中的亮色。

本来按规定，住校生必须在开学典礼的前一天返校，而宁玮却是在举行开学典礼时匆匆赶到的。我问她为什么迟到，她支吾了很久，才吞吞吐吐地道出了原委——

宁玮的确是头天下午乘上返校的公共汽车的。但途中遇上阻车，等了很久，一直没有通。

天色渐渐晚了，车上的旅客纷纷拿出糕点、水果等当做晚饭吃。宁玮也从提包里拿出了煮鸡蛋。这时，她突然发现一位妇女静静地坐在位子上，手里既没有糕点，也没有水果。宁玮想，可能她没有带吃的吧？

于是，她拿出两个鸡蛋递给那人：“阿姨，你吃鸡蛋吧！”

那人似乎有些惊讶。车上的人看着她，似乎也感到不解。

宁玮把鸡蛋塞进那位妇女的手里：“拿着吧，都是出门人，不用客气！”

那人很感动，接过了鸡蛋，但硬要付钱给宁玮，宁玮坚决不要：“我不要你的钱。这蛋是自家的，不是花钱买的。”

车上的人看着这温馨的一幕，感慨道：“这姑娘的心多好！”“现在这种人真是不多见！”

这时，车上有一人怪声怪气地说：“啊哈！活雷锋，也给我一个嘛！”

宁玮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那位妇女站了起来：“你想干什么？！”

车上的大多数人也对那人吼了起来：“你想干什么？！”

那人不吱声了。

那位妇女和宁玮聊了起来。原来，她也是农村人，是去乐山看亲戚的。

阻塞的公路终于疏通了，但车到乐山已是深夜，那位妇女怕宁玮不安全，一直把她送到乐山一中，但学校大门早已关闭。于是，那位妇女主动把宁玮带到了她亲戚的家里……

讲述完这一切，宁玮自责地说：“我如果前天赶车或者昨天上午赶车，也许就不会迟到了。”

面对她那颗水晶般的心，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以前我们不少教育者谈到教育，总是把学生当做空荡荡的容器，而所谓“教育”就是教师往这些“容器”里面装“高尚的思想”，装“美好的道德”。我在从教多年，和学生深入交往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其实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学生的心灵倒比我们教育者纯洁得多也高尚得多！“学历”、“阅历”、“经历”等使我们“成熟”起来，也冷漠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确应该向学生学习！

那么，教育者真的就没有什么事做了吗？不，在有些时候，面对有些学生，教育的灌输也是必需的；但面对多数学生，特别是像宁玮这样的学生，我们要做的是“保持”、“扶持”与“引导”：让学生保持一颗童心，扶持学生美好道德的萌芽不断健康生长，引导他们面对复杂甚至有时显得比较阴暗的社会现实，让“纯真”更坚强也更机智！

宁玮后来对好友赵琼谈起返校“奇遇”时说道：“我当时一看到那位妇女，就觉得她像我们乡里的长辈。他们朴实善良，真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啊！比起来，我们这一辈人很幸运，我们在城里读书，父母们却在乡下辛劳，用他们的汗水供养我们。真的，我一看到她，就想起了我的父母……”

宁玮朴实无华的言行，感染了她的同学。毕业前夕，赵琼在作文中写道：

宁玮对乡村有一种特殊的挚爱之情。她爱花，爱草，走过一块小小的菜地也要蹲下去仔细瞧瞧那每一根嫩芽。她是那样深深地爱着她的父母姐弟，爱着她的乡村家园！也许是为了把这种感情化为行动，她发奋地学习，认真地工作，真诚地待人。高中三年来，无论是当班干部还是当室长，或者是为学校管理广播室，她都尽心尽力，严格认真。她抓紧每一分钟努力学习，上课积极思考并主动发言。她在课余给同学们带来欢乐：为同学们剪

漂亮的纸花；在晚上以清纯的歌喉为大家唱《洪湖水，浪打浪》；在太阳岛，她俨然像个特级厨师，给大伙儿煮好吃的饭菜……因此，她受到同学们深深的爱戴，也因此连续两年被同学们选为三好学生。

然而高考结果下来了：宁玮落榜！

其实，她就差那么几分，如果她是城市户口，或者她的父母稍微有点“头脑”与“社会活动能力”，或者她家里多少有一点“经济基础”，她是完全可以通过“委培”或“自费”或其它途径踏进大学校门的。事实上，当时同班的不少同学分数比宁玮低得多，最后仍然通过各种门路上了大学——因为他们是“城里人”！

我绝无半点鄙薄这些“城里人”的意思，因为他们毕竟也是我喜爱的学生，我真诚地为他们最后还是如愿以偿而高兴。我之所以把他们与宁玮比较，只是想说明并突出宁玮的“不幸”而已！

宁玮返校看高考分数那些天，她和几位远道而来的农村同学就住在我家。面对她控制不住的眼泪，我虽然一遍遍苍白无力地劝慰她，但在心里再一次升起沉重的负疚感……

当年的10月，我收到宁玮的来信：

李老师：

您好！刚开学一定很忙吧？您新的一批学生听话吗？

几个月来，我如同大病了一场。想起高考，我就觉得自己对不起多年来为我辛劳的父母，对不起老师三年来的培养。

但想到老师您是那么关心我，我还是应该向您谈谈我的心里话和今后的打算。

李老师，通过这次高考失败，我第一次因为自己是乡下人产生了自卑感。我的分数只差那么一点点，如果我有一个城市户口，就完全可以像班上其他同学一样读“委培”。这段时间我不止一次地感叹，命运对我为什么这样不公？请您不要以为我看不起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家乡。不，我从来都不因为自己出身农家而觉得比别人矮一截，而且现在，我对家乡的感情仍然没有变，但对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分数面前却不能完全一视同仁而感到不平。当然，如果我在高考时能够再多考几分，使我的分数上统招线，我就能和其他人一样拥有同等的被录取的权利了。唉，还是怪我自己不争气啊！李老师，我是您最没出息的学生，辜负了您的希望，以后真没脸来见老师了！

李老师，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但三年的高中生活我没有白过。我毕竟在您和其他老师的教育下学到了不少以后有用的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幸运地成了您的学生，并生活在一个充满温暖的班级！我真想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写写我难忘的高中生活，甚至写一部当代的《青春万岁》。李老师，您放心，不管今后怎样，我永远会做一个正直的人，至少不能有愧于自己的良心。

祝李老师工作愉快！

学生 宁玮

1990年10月6日

我很快给她回了信：

宁玮：

你好！

来信收到。

如果我用“正确对待人生挫折”之类的话来安慰你，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但是，你现在确实只有正视现实。我们对生活对未来都有着美好的愿望与憧憬，然而，人与人的生活道路总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还不仅仅是指有的好，有的坏；更多的时候是意味着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独特的。这个世界如同一个大森林：有挺拔的乔木，也有繁茂的灌木；有参天的巨树，也有缠绕的藤蔓；有鲜艳的花朵，也有翠绿的小草……但都在阳光下展示着自己一份独特的勃勃生机。也许，我这样说，抽象了一些，但我真的坚信，宁玮未来的人生道路可能是平凡的，但决不会是黯淡的！

我从来就不认为没考上大学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尤其是对宁玮，我就更不会因为你高考落榜就对你另眼相看。你的朴实、善良与正直，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同学们也是永远忘不了的；而且我相信，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这些可贵的品质也许会给你带来一些烦恼，但更会使你赢得人们的尊敬与信任。当然，社会是复杂的，特别是现在社会风气、社会治安都不太好，你在外奔波一定要多一些心眼，多一份机智，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啊！

我永远是你值得信赖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对我说。

真诚地祝你一路平安！

你的朋友 李镇西

1990年10月15日

从此，在紧张的工作中，我的心灵深处多了一份惦念与忧思。我常常收到许多学生来自大学的书信，每当这时，我总是忍不住想：宁玮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而每每这样想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宁玮刚进高中的第一个周末因想家而流泪的面容……

终于收到她的来信，已是第二年6月了。那时，我已调到了成都玉林中学。信是从北京寄来的，她说她现在在北京西四的一家酒店打工，干得还不错。“老板挺信任我的！”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乐观。随信还寄了一张照片：天安门前的宁玮一脸灿烂的笑容。

这次我没有回她的信，因为我7月份就要去天津讲学，我打算路过北京时去看看她。

那天，我在北京下车时，正好遇上瓢泼大雨，我真想在车站直接乘车去天津算了，但我还是想去看看宁玮，于是，在风雨中，我挤上了公共汽车……

当我出现在宁玮面前时，一向举止娴静的宁玮，居然兴奋得跳了起来：“呀！是李老师！”

接下来是我们滔滔不绝的“龙门阵”。我了解到宁玮确实干得不错，老板的确很信任她，最近特意安排她收钱管账。在这里打工的男女青年都很敬重宁玮，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他们都在远处羡慕地看着宁玮。

她去为我冲茶时，我无意地翻了翻放在桌上的《顾客留言簿》，上面几乎每一页都是对“宁小姐”的夸奖。

一晃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起身告辞，但宁玮硬不让我走：“我已经给厨房说好了，你一定得吃顿便饭！”我看她急得好像要哭了，只好说：“好吧，今天我就吃宁玮一顿！”

一桌丰盛的饭菜，简直让我不敢动筷子：“宁玮，你这……”

“没什么，不费钱的！”她又补了一句，“我们老板对我可好了！”

吃饭时，她提起当年我给她的五元钱，由此又谈到我对她的“关心”“教育”云云，颇有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意思，我却笑了：“那我可赚了呀！”

我又提醒她在保持善良的同时，接物待人也应多长一点心眼儿。她点头称是：“您放心，我会注意的！”好像是为了让我真正放心，她又悄悄对我说：“老师，您看那个小伙子——”她用眼色给我指了指远处正在忙活的一个英俊小伙子，“他正在追求我，可我没同意。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不大实在。”

在送我去赶车的路上，她突然硬塞给我一件东西：“这是我给小晴雁买的连衣裙！”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又拿出一个黑色的皮革小包：“这是我送给万老师的！”连我女儿和爱人她都想到了！

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告别宁玮后，我已不像原来那么担心她的处境了，相反我庆幸她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而且我相信她在酒店会干得更好。

然而我想错了。两个月后，我又收到宁玮的来信，但不是寄自北京，而是寄自她的老家。

李老师：

您好！

自八月中旬后，酒家情况不怎么好，人心浮动，月底酒家只好转租给别人。我的工作也调动了，到了另一个大酒家上班。但过去没几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酒店来了几个顾客吃饭，他们吃着吃着不知为什么就吵了起来，后来竟大打出手。后来，一个喝红了眼睛的男子顺手抓起桌上的一个盘子，向另一个女人砸去！我见状赶忙扑上去拉那个女人，可是，盘子却砸在了我的鼻梁上，顿时血流满面。到医院一看，鼻梁骨折了……

读完信，我百感交集：宁玮啊，宁玮！明知飞旋的盘子会砸伤人，你为什么还要扑上去呢？我又一次为她的善良惶惑了。她的大学梦仍然没有破灭，我是支持她的。而且凭我对她的了解，我觉得只要她经过一年的发奋补习，是很有希望考上大学的。

我本来准备给她回信，鼓励她补习功课准备明年考大学。但想到她“桔子成熟了的时候”就要来看我，一算时间，不过还有个把月。所以，我便没有回她的信。

但是，“桔子成熟了的时候”她并没有来，也没有一封信寄给我。

是她的鼻梁留下了什么终身残疾而不好意思来看我吗？是得什么重病了吗？是她进了补习班，紧张的学习使她无暇给我写信吗？还是发生了什麼我意想不到的其它什么变故呢？……我这样不安地猜测着，同时，也盼望着。

一年过去了，没有消息。

两年过去了，没有消息。

三年、五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

宁玮，你在哪里？

宁玮，你还好吗？

1996年10月，我到长沙出席中国教育学会第十次年会刚回到学校，一位同事告诉我，有一个人曾经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不在，对方便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叫我回来后去个电话。

当时，我根本没有把这个电话和宁玮联系在一起。我拨通电话后，话筒里传来一个声音：“您是李老师吗？我是宁玮啊！”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宁玮”、“林伟”、“凌卫”……同名同姓的很多呀！于是我谨慎地问道：“请问你是哪个ningwei？”

对方急切地说：“李老师，我是你的学生啊！”

我也更加激动地说：“啊，宁玮啊！你现在在哪里？”

“我就在成都。现在在四川省委党校旁边的光华园酒楼。”

……

足足通了半个小时的电话。仿佛一放下电话，宁玮就又会失踪似的，于是不停地追问，不停地回忆，不停地叙说……她说她几年来一直在外奔波，干的都是餐饮；她说她的弟弟终于大学毕业，现在已是一位中学教师；她说她是去年下半年到成都光华园酒楼的；她说她现在就住在成都，而且已经成家，爱人是一个厨师，孩子也快满一岁……

我再次为宁玮而庆幸：好人应该一生平安！

然而，不久后我再去光华园酒楼找她时，她已离开了那家酒店。听说她去了北京。我又一次与她失去了联系……

前不久，我去广汉市参加四川省青年教师语文教学大赛。当我上完课走下讲台时，几位青年老师围了上来，要我签名并请我合影。我欣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照完像，其中一位看起来特别朴实精干的小伙子突然问我：“李老师，您还记得宁玮吗？”

我一惊：在这个地方，居然有人提起“宁玮”！我连忙问他：“你是……”

小伙子有些自豪地说：“我就是宁玮的弟弟！现在在彭山青龙中学工作，和您一样，也教语文。”

“啊！你就是宁玮的弟弟！”我激动得一把抓住他的手，仿佛他就是宁玮。

我问他宁玮的近况，他说：“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姐姐几年来一直是东奔西走。不过，她应该回四川了。”

茫茫人海，宁玮仍在为自己的理想而不停地奔波着……

当我写到这里，又禁不住想：此刻宁玮又在做什么呢？我期待着哪一天，我又会突然收到她的来信；或者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提起话筒，里面会传来宁玮那亲切的声音：

“李老师，您好！我是宁玮。”

爱的升华

我们对学生充满真挚的情感，无疑会使学生亲近我们并乐意接受我们的教育，但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爱的教育，最终目的应该是使学生在感受到老师无私的爱后，再把这种爱自觉地传播给周围的人，进而爱我们的社会，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国家……

从教之初，我就把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作为学生必读的德育教材。我在班上立下规矩：凡是学生病休三天以上，班里必须派人去慰问，病休一周以上，班主任再忙也要亲自去看望。对于那些由于特殊原因，不能经常享受家庭温暖的同学，更应关心。

教初84级（1）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姜茹、王琦、彭霞、杨虹等几个女同学课间神情异常，好像是在密谋着什么。有一次，我正在讲课，突然发现几位学生在课桌下悄悄地传递着一张纸条。我一步跨过去，将纸条截获。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这事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要让李老师知道！”

下课后，我把这几位女生请到了办公室。

“你们说实话，上课为什么传纸条？”我严肃地对她们说。

她们一言不发。

我说：“那好，我请你们的家长来和我一起帮助你们！”

“李老师，我……”许艳刚说了一句，另外几个女生悄悄给她摆手，于是她便把话吞了下去。

其实，我心里明白，“传纸条”与男女同学之间的敏感问题并没联系。我却故意以此来狠狠批评她们：“哼！男女同学上课传纸条，还说什么‘千万不要让李老师知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我知道？你们这种年纪啊，思想就是容易变坏！”

这一句话使让她们急了：“不是，不是……”

姜茹嘀咕了一句：“我们真的不是要干坏事！”

“哦！是好事？”我故意装出不相信的样子，“那你们就说出来呀！说出来，也让李老师和你们一起做嘛！”

沉默了一会儿，她们终于吞吞吐吐道出了原委——

来自农村的伍建同学，最近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父亲不幸病逝，拖了一大笔债，家里除了体弱的母亲，还有一个16岁的姐姐，责任田也缺人种……

前些时候，同学们偶然听说伍建流露出不想读书的念头，决定帮伍建一把，为他捐款，希望他留在我们班上继续学习。于是这几天大家便暗中想办法，并希望班长马庆来组织这次对伍建的捐助活动……

听了几位女生的诉说，我首先感到的是内疚：以前我只知道伍建学习成绩较差，却不知道他竟面临着这么大的困难！

我又问她们：“这的确是件好事啊！为什么怕让我知道呢？”

她们说：“我们想自己做成功一件好事，让您高兴高兴。再说，您太忙了！”

我又给她们开玩笑：“哼，这么好的事就把李老师给忘了，还说喜欢李老师呢！”

她们天真而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们开始商量起来……

伍建平时住校，周末才回到乡下家里。这个星期六下午的班会课前，我

借口伍建回家路途太远（得步行三十多里山路），便叫他提前离校了。然后，我和全班同学一起开了主题班会：“让伍建因为有我而感到温暖”。

在班会上，马庆向大家讲述了伍建家的不幸之后，号召同学们向伍建伸出援助的手。他在发言中说：“李老师最近刚为我们读完《爱的教育》，大家都很有感动。同学们想想，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都知道关心同情别人，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少年更应关心别人，更富有同情心。”

班会的气氛极为热烈，大家一致决定为伍建下学期的学习费用捐款。很快地，讲台上便堆积了一座钞票的小山。经过清点，学生们和我共捐款 37.76 元钱！

这笔钱在现在看来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 80 年代初，这几十元钱却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下学期伍建的学习费用只需八元钱，大家决定把其余的钱拿来为伍建购置生活用品。

韩军说：“为伍建买一个闹钟吧！他家里没有钟，有个星期一早晨，他估计着时间从家里出发，走到学校时大门都还没开，因为天都还没亮。”

张海波说：“还应该给他买一个开水瓶。他平时住校经常喝自来水。”

张春银说：“还应该为他买些学习用品。我看见他的钢笔都坏了，可他还在用。”……

我提醒学生们：“除了生活上、经济上的帮助，伍建还需要什么帮助？”

周涛同学说：“伍建的数学比较差，从下周起，我帮助他学数学！”

王红川说：“我帮助他学英语！”

更多的学生纷纷举手：“我帮助他学语文！”“我帮助他学物理！”……

在这以后直到放寒假的两个星期里，伍建的桌子上、抽屉里经常出现一些物品。老实的伍建每次都要拿来交给我：“李老师，不知谁把新钢笔丢在我桌上了。”“李老师，我在我的抽屉里拾到一个新笔记本。”“李老师，这文具盒不是我的，请您帮查一查是谁掉在我座位上了。”……

我心里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好说明，只好含糊地说：“嗯，我在班上问问。你暂时先用着吧，等找到失主，你再还他。”

两周以后，学校放寒假了。在春节前的一个冬日高照的上午，我和几位学生一起，带着我们为伍建的捐款和许多生活用品，跋涉三十多里山路，来到伍建家所在的小山村。刚拐过一个山坳，就远远看见他在地里劳动。我们悄悄向他走去，他仍在弯腰劳作，竟没有觉察到。

我们在田埂上站成一排，齐声大喊：“伍、建、你、好！”

他猛然抬起头，惊呆了的脸上泪水夺眶而出……

一晃 15 年过去了，当年的伍建和他的同学们也已长大成人。前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伍建的来信。他在信中提起那年春节前夕同学们给他的温暖时，我从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他的激动之情。他在信中还自豪地写道：“李老师，现在我也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了！”

1990 年 1 月，我发现班上一位叫胡国文的农村同学情绪低落，精神不振。一了解，是肠胃病复发了，加之由于学习紧张，又使他患上了失眠症。这使本来就性格内向的他更加郁闷。虽然我找他谈了几次心，安慰他，鼓励他，但他终于没有坚持到期末考试，就回家养病去了。

放假的那一天，我和学生们给胡国文写了一封慰问信。全班每一位同学都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满了温馨而真诚的话语。我们希望，班级的温暖不但能使他过个好年，而且能使他乐观起来，振作起来，战胜疾病，回

到我们这个可爱的集体。

寒假后开学第一天，见到胡国文来报到了，我挺高兴，热情地问他：“病好了没有？”他却不说话，低着头，泪水渐渐从脸上滴到地上！在我的一再安慰和追问下，他才向我诉说了春节期间他家里遭到的不幸——家里失火，房子被烧成一片灰烬！说到最后，一向不善言辞的胡国文说了一句让我感动的话：“最让我心痛的是同学们给我寄来的明信片没抢出来，全被烧了……我本来是要终身珍藏的！”接下来事情的发展究竟怎样？还是让胡国文当年写的一篇作文《谢谢您，亲爱的班集体》来回答吧——

……

第二天下午读报课，我刚走进教室，就觉得气氛不对。抬头看黑板，几个大字映入我的眼帘：“国文兄，我们永远在你身边！”一股暖流闪电般传过全身，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原来同学们正在李老师的主持下，举行安慰我的主题班会。我真没想到同学们这么快就知道了我的困难，也没有想到他们会用如此庄严肃穆的方式来给我以慰藉。不过，这又是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向来就团结、友爱。黑板上，还有何英同学写的一段话：“一份痛苦，两人分担，便只有半份痛苦；一份欢乐，两人共享，便有双倍的欢乐。你只有1/60的痛苦，却拥有60倍的欢乐。”是的，同学们把欢乐给予了我，把痛苦给我驱走，我还有什么痛苦可言呢？王英浩同学还深情地朗诵了一首他专门为我写的诗：“哦，国文/不要悲伤/让我们温馨的友情/在你心间，投下一丝金色的阳光/带给你更多的温暖，更多的坚强……”他的诗，像是给我注射了兴奋剂，让我浑身热血沸腾，充满了力量。接着，团支部书记郑洁同学把60张明信片（包括李老师写的）送给我，她说：“大火烧毁了以前给你写的明信片，但烧不毁我们的真诚友情。今天，我们每人再给你写一张明信片！”我看到每一张明信片上都有一段暖人的话语，带给我一片真诚，让我本来压抑的心轻松起来，又获得了勇气 and 希望。我真正感到这友爱的丰厚崇高了。随后，班长周强又把几百元钱送到我手中。这钱是同学们决定这学期不看电影而捐给我的，这真让我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昨天回到学校时那种伤感和悲痛，这时已烟消云散，我的一颗冰冷的心已被同学们滚烫的真情融化了！

……

需要补充的是，当时我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的杨嵩同学，还在全校师生中发起了为胡国文捐款的活动。

师生之爱，同学之爱，都不应仅仅止于班级内部，而应该有爱的扩展和升华。这种爱的扩展，是对周围其他人的爱——同学、邻居，以及一切素不相识但需要帮助的人；这种爱的升华，是对我们祖国的爱！

这才是爱的教育应该达到的最高境界。

1990年10月，我教高93级（1）班的时候，了解到学校附近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唯一的儿子及儿媳在几年前因车祸双双身亡，现在和她九岁的孙子相依为命。同学们知道后，不但为老太太捐献钱物，还把自己的学习用品和一些书籍送给那个可怜的孩子。学生们还组织起来，每周都派一个小组去帮老太太做家务事……

1983年，在“未来班”的成立大会上，我们收到了一位家长寄来的一笔钱，同学们当即决定，把这笔钱寄往北京圆明园管理处，用于整修圆明园遗址。捐款寄出二十多天后，我们收到了圆明园管理处的回信：“……同学们长大后能到北京读大学或旅游的机会是会有有的，到那时请你们一定来圆明

园。请同学们放心，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将加倍努力，有全国人民的支持，不久的将来一处大型古典园林遗址定会在祖国首都——北京出现。”

1987年5月，大兴安岭火灾的消息传到我们班，不用我动员，同学们就行动起来了。班长程桦、吴涛代表我们班率先在校园贴出了一份《倡议书》，倡议全校师生为扑灭大兴安岭火灾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在那次活动中，我班采取无记名方式捐款，所捐金额居全校第一。

1996年，我任成都玉林中学初98级（5）班和（6）班的班主任，恰逢成都市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拉开序幕。我和学生们积极参与，同学们用节约的零花钱买来珍贵的银杏树和女贞树的树苗，种在府南河边，还成立了“府南河红领巾志愿者中队”，每周星期五下午放学后，都去河边护理我们的小树，一直坚持到现在。……

在我教过的班级中，类似的活动，学生们究竟参加过多少次，现在已很难准确统计了。有时是我有意组织的，有时是学生自发开展的。这是爱心的教育，也是童心的教育。而最能体现爱心和童心和谐统一的，是那一次我班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建造烈士群雕的募捐——

从1982年2月刚参加工作起，我便利用每天中午的休息时间，为学生朗读《红岩》。到了第二学期的11月13日，便读完了《红岩》最后一节。我对学生们说：“明天是11月14日，星期天，同学们将度过愉快的一天。可是大家是否知道，33年前的11月14日，江姐正含笑走向刑场？再过两周，11月27日，是‘中美合作所’最后大屠杀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些先烈，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正在筹建渣滓洞、白公馆《烈士群雕》的塑像。”

“我们为建造《烈士群雕》捐点款吧！”

“对，向先烈表示一点我们的心意！”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说出了我准备提出的建议。我非常高兴，说：“同学们自愿捐款当然很好，可钱从哪儿来呢？回家向爸爸、妈妈要吗？”

“不，我们利用星期天去拾废品卖！”学生提议道。

“好！”我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并补充说：“当然，也可以清理家里的废品——如废书、旧报、牙膏皮等等去卖。总之大家要注意：所交的钱必须是卖废品所得，决不能因此向家里要钱。只有通过自己劳动所得来的钱，才最能表达真诚的心意！”

两个星期过去了，全班大多数学生都陆续交来了自己的捐款。我一一清点着由一分、两分、一角、两角汇集而成的捐款，心中无比欣慰。

不知怎么的，在清点捐款的过程中，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丝怀疑：这些钱都是学生卖废品所得吗？虽然每个学生在交钱的时候，都说是“卖废品换来的”，但凭我对学生的了解，我估计可能有少数学生并没有卖废品。想到这里，我隐隐感到不安：怎样才能使这一笔献给先烈的捐款真正纯洁无瑕呢？

我当然不好为这个想法在班上搞“清查”，但我想至少应通过什么方式提醒或教育一下学生们才好。怎么办呢？

正好，何静红、龚驰群、王薇三个同学来交钱了。我收下钱，照例问道：“卖的是什么废品啊？”

没有回答。

我把询问的目光投向班长何静红，她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们没有去拾废品。”

“那么，这钱是向家里要的喽？”

“不是，这是我们平时积攒的零用钱。”几个人的声音很小，充满了惭愧。

我踌躇了：收不收呢？她们这样做，显然不符合必须是“卖废品所得的钱”的要求，似乎该受批评。然而，他们没有撒谎，这是很可贵的。再说，这钱并非向家里要的，而是她们节约下来的，仍然能代表她们的心意。

于是，我表扬了她们：“你们很诚实！”

上午最后一堂课快下课前，我在班上讲了何静红几位同学捐款的事：“她们没有拾废品，当然不对；但她们有一颗诚实的心！让祖国的新一代具备诚实纯正的品格，正是先烈们的希望。我请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在捐款时撒了谎，这难道仅仅是欺骗了老师吗？不！这是欺骗了先烈。我们不希望这笔捐给先烈的钱里包含有哪怕只是一颗不诚实的心。”

放学后，又有几位学生来交钱，他们都如实地说明这笔钱是自己节省的零花钱。

中午，我到教室去，许艳同学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李老师，那天我交的七角二分钱，并不是卖废铁得来的，而是妈妈给我吃早点的钱，可我在交钱时，却说是……”

“别说了，你今天做得对。你仍然是诚实的孩子！”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不一会儿，有几位同学也来向我承认自己交钱时说了谎。

下午上课前，我又在班上表扬了许艳等同学：“能主动用诚实行动来改正不诚实缺点的同学，仍然无愧于先烈！”

课后，又有两个学生来到我跟前，说他们捐的钱里只有部分是卖废品的钱。……

凝聚着学生们对先烈真诚敬仰之情的捐款寄出去了。在填写汇款单时，我没有写汇款人姓名，只在汇款人附言一栏里写道——“献给先烈的53颗爱心和童心”。

爱心与教育

当我们自然而然地走进“后进生”的心灵，而他们也乐于主动向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的教育之舟便已驶入了成功的港湾。

手记二：与顽童打交道 ——“后进生”的转化

教育呼唤民主、科学与个性！ ——转化“后进生”的指导思想

不客气地说，离开了对“后进生”的关注与研究，“素质教育”不但是虚假的，而且是虚伪的。

理由很简单：素质教育的要义第一是面向全体学生。而对多数学校的多数班级来说，“面向全体”就必然面向为数不少的“后进生”。或者换句话说，只要有哪怕极少数的“后进生”在我们教育者的关注之外，那么，我们所标榜的任何“素质教育”都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素质教育，而只能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的耻辱！

转化“后进生”的途径、方法当然是很多的，但其基本的教育思想应该充满“民主、科学和个性”的精神。

1. 民主：用心灵赢得心灵

爱，是教育的前提；而且这种“爱”应该是真诚的。换句话说，教育者对“后进生”的爱，绝不应是为了追求某种教育效果而故作姿态的“平易近人”，而是教育者真诚的人道主义情怀的自然流露。当我们自然而然地把“后进生”看做朋友时，这些顽皮的“后进生”也会不知不觉地把我们视为“哥儿们”。我喜欢与“后进生”们“吃喝玩乐”：星期天，和他们一起去公园，在草坪上摔跤、斗鸡；假期，和他们一块儿徒步去郊外旅游，在田野追逐；他们有了学习上的进步，我带他们去吃火锅以表庆贺……也许有人会指责我的教育“太庸俗”，但我认为教育能够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不但是无比幸福的，也是无比高尚的！也可能有人敬佩我善于给“后进生”们带去欢乐，我会说：“不！不是我给他们带去了欢乐，而是他们给了我欢乐；或者说在没有师生界限的交往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共同的欢乐！”

当孩子们与教师产生了朋友般的依恋之情后，点燃学生心中“想做好人”的愿望的火花，便是教师实施教育的关键。苏霍姆林斯基多次谆谆告诫教育者：不能让儿童那种“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长期与顽童们打交道的经历告诉我，即使是某些教育者心目中“一无是处”、“不可救药”的学生，其心灵深处或多或少也有着美好道德的萌芽。对“后进生”的转化，与其向他们“灌输”（即使是很巧妙的“灌输”），不如引导他们发现自己身上的善良之处、高尚之处，帮助他们树立“我是一个有缺点的好人”的道德自信。我经常与“后进生”谈心的话题，便是让学生谈“我有什么优点”；如果某一“后进生”因为长期受斥责而丧失了道德自我肯定的勇气和能力，我便让全班学生帮他找优点。教师这样做，绝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技巧，而首先是一种由真诚热爱而产生的真诚信任。

当然，比起其他学生，“后进生”犯错误的时候要多一些，教育者很难做到不对他们发怒，但是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一个好的教师，就是在他责备学生、表现对学生的不满、发泄自己的愤怒（教师也有权发泄他的愤怒，任何一个有涵养的、受过教育的人也在所难免）的时候，他也时刻记着：不能让儿童那种‘成为一个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我想强调的是，在批评教育的问题上，师生同样是平等的：教师当然可以批评学生，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教师如果批评失误，应该尊重学生申辩或解释的权利；如果冤枉了学生，教师应该公开主动认错。有一次上课，我看到一位平时上课爱说闲话的学生又在向周围同学说着什么，我一怒之下声色俱厉地把他痛斥了一顿，当时他红着脸低着头承受着我的批评，可是课后，有学生来告诉我，说那个同学刚才是为同桌念黑板上的板书（同桌眼睛近视而又忘戴眼镜了），并不是有意说话。我顿时惭愧极了，立即回教室当着全班学生向那个学生认错，并决定替他当一天值日生，以表达我的歉意。这事使学生们很感动，我却说：“学生认错，大家习以为常；为什么老师认错，同学们就格外感动呢？错误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

作为真诚的民主教育，用心灵赢得心灵，不只是教育的条件，更是教育本身。当我们自然而然地走进“后进生”的心灵，而他们也乐于主动向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的教育之舟便已驶入了成功的港湾。

2. 科学：把教育主动权交给学生

前面谈到的学生心灵深处美好道德的萌芽，是学生自我教育的内在依据。但是，对“后进生”而言，这些“萌芽”往往被各种缺点的“杂草”掩盖着。教育者的明智和机智，在于引导“后进生”经常进行“灵魂的搏斗”——不但善于发现自己的可贵之处，更勇于用“高尚的我”战胜“卑下的我”。

要求“后进生”在一个早晨就根绝所有坏习惯，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让他们通过自我控制而逐步减少犯错次数。有一位“后进生”上课特别爱唱歌（虽然有时候只是小声哼哼），他知道同学们对他这个坏习惯很反感，自己也很想改正，但缺乏信心。我对他说：“你现在是每堂课都要唱歌，影响同学们学习。这样吧，你先试试尽量争取每天有一堂课不唱歌。如果没做到，我暂时不批评你；如果哪一天做到了，你就来给我报个喜，好吗？”第一天，他没来报喜；第二天他来报喜了，而且特别兴奋；第三天和第四天他没来报喜，我知道他未能战胜自己，但仍然耐心期待着；第五天，他又来报喜了。尽管一周之内他只有两天报喜，我仍然给他以热情的鼓励。就这样，他犯这个错误的频率逐渐减少，半期过后，他基本上改正了这个坏习惯。在表扬他的时候，我向全班强调的是，他有“战胜自己”的勇气和毅力。

引导学生自我教育，也包括利用学生集体的健康舆论对集体中某个或某些“后进生”施予积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要善于巧妙地把自己对学生的表扬或批评转化为集体舆论的褒贬，让集体的每一个成员（不只是“后进生”）都意识到：自己有了进步，是全班的光荣；自己犯了错误，是全班的耻辱。我多次在新学期的第一天开始在几个“后进生”中进行“看谁进步大”的比赛，半期语文考试时，让全班学生对《××进步大》的作文进行投票——由于学生们的作文只能写一位同学，这就使参加比赛的“后进生”之间有了竞争，而且这种竞争随时是在学生集体的监督之中；由于学

生的“选票”是考试作文，他们自然会认真对待，而这种“认真”必须体现为平时对那几个“后进生”的细心关注。这种教育技巧，我在历届学生中都运用过，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其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其中蕴含着一条朴素的教育科学规律：“真正的教育自我教育。”（苏霍姆林斯基）

但是，必须指出，“后进生”的“自我教育”很难一劳永逸，相反，这是一个充满反复的长期教育过程。教育者期望通过一次谈心、家访、班会或听英模报告，便使“后进生”从此成为一名优秀生，无疑是把教育想得太简单了。“犯错——认错——改错——又犯错——又认错……”这是“后进生”普遍存在的规律。教师因此斥责学生“屡教不改”、“光说不做”、“本性难移”等等，是极不公正的。教育者应该容忍“后进生”的一次次“旧病复发”，继续充满热情和信心鼓励学生一次次战胜自己，并引导学生从自己“犯错周期”的逐步延长或者错误程度的逐渐减轻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点点滴滴的进步，体验进步的快乐，进而增强继续进步的信心。我从来不对“后进生”提下不为例之类他不可能做到的要求，相反，我专门印制了“报喜单”，如果某位“后进生”觉得自己在某一周犯错误的次数减少了甚至没有犯错误，就可以主动到我这儿来领一张“报喜单”，拿回去向爸爸妈妈报喜。

实践证明，把教育主动权教给“后进生”，让他们在自我教育的同时又接受集体的监督，既允许其反复，又鼓励其进步，这最能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科学。

3. 个性：不以分数论英雄

苏霍姆林斯基告诉教育者：“不要让上课、评分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唯一的、吞没一切的活动领域。如果一个人只是在分数上表现自己，那么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等于根本没有表现自己，而我们的教育者，在人的这种片面表现的情况下，就根本算不得是教育者——我们只看到一片花瓣，而没有看到整个花朵。”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后进生”看做思想品德坏、学习成绩差的群体，而应该视为一个一个具有自己丰富而独特精神世界的“个体”。没有健康愉快的精神生活的人，是不幸者，而我们眼里的“后进生”，几乎都是这样的不幸者！由于在智力水平、行为习惯、知识基础、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后进生”很难在短时间内与班集体同步，于是心灵的悲剧便发生了：自卑自贱但表面上满不在乎，上课无法听懂又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坐在教室里，作业往往完不成只好胡乱应付，因此常被各科老师斥骂，受尽了同学们的白眼，于是处处与集体作对……

“尊敬的教育者们，请时刻都不要忘记：有一样东西是任何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任何教学方式都没有作出规定的，这就是儿童的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苏霍姆林斯基）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在同一时间内，达到思想道德、文化学习的统一标准，这是许多“后进生”根本没有“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转化“后进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还他们以本来应该拥有的“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这，又必须从每一位“后进生”独特的精神需要入手。平时上课老坐不住的陈元兵，有一次偷偷地在抽屉里“研制”炸药，结果引燃了书包，差点儿造成恶性事故。我严肃批评教育他后，主动给他介绍一位化学老师，让陈元兵“好好从基础学起”，结果他不但在课堂上“老实”多了，而且逐渐迷上了化学。伍锐在课堂上耍蛇，吓得全班同学不敢进教室，我介绍他与生物老师交朋友，后来生物老师

叫他当科代表，还让他参加了生物课外兴趣小组。文建国上课从来不听讲，说是“听不懂”，但他对小制作特别入迷，零花钱几乎都用来买车模零配件，我便专门找到物理老师，请他指导文建国搞各种小制作，参加各种小制作比赛。万同一上课便睡觉，看不出他有啥兴趣爱好，我给他推荐既有教育意义又有精彩情节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叫他在课堂上抄这部小说；两年过去了，他已抄了11本作文本……

曾有同事对我的这些做法不理解：“这些学生的学习本来就够差的了，你还如此迁就他们，毕业考试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我不这样做，他们仍然毕不了业；而根据他们的个性，发展其爱好，这不但能使他们或多或少学点知识，而且还能引导他们学习做人之道。”后来这些学生的表现和发展，不但证明了这些尝试是成功的，也进一步印证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这段精辟论述：“我在学校里对儿童、少年和青年的几十年工作，使我得到一条深刻的信念：人的天赋、可能性、能力和爱好确实是无可限量的，而每一个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又都是独一无二的。自然界里没有一个人这样的人，我们有权利说他是‘无论干什么都不行’的人。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界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

把更多的关注投向他们

——我对“后进生”的认识及转化

多年的教育实践告诉我，出现“后进生”的主要原因有：

1. 家庭方面的原因

教育方法不当：要么是溺爱，让孩子从小就在百依百顺的环境中娇生惯养；要么是粗暴，使孩子在呵斥和棍棒中仇视一切“教育”；要么就是放任，孩子在“自由”中疏远了棍棒也疏远了感情，养成了懒惰也养成了散漫。

家长行为不正：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但为数不少的“家长”却不知不觉地以自身并不美好的言行，如胸无大志、工作懒散、趣味低级、生活平庸、言谈粗俗、热衷赌博、沉迷色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

家庭离异：真诚和睦的家庭，不但是孩子生活的温馨港湾，而且从教育的角度看，更是他们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好环境。相反，夫妻经常打架、吵架，无疑会在孩子心中投下生活的阴影，扭曲他们的道德是非观念。由父母离异而造成的家庭破裂，使一些子女失去了应有的家庭温暖和教育，心灵的创伤、感情的失落、畸形的教育，使不少孩子渐渐成为学校中的“后进生”。

2. 学校方面的原因

教师的歧视：这是我在一次对“后进生”的问卷调查中获得的“惊人”发现。相当多的“后进生”诉说，他们从小学起就被老师冷落、辱骂，甚至体罚。这种歧视，不一定是教师的自觉行为，但后果却是使这些学生丧失了自信和自尊，更严重的是在他们心中播下了对教师乃至对教育的敌意的种子。

教学的失误：这主要表现在教师教学上的“一刀切”。“因材施教”是古已有之的教学优良传统，但一些教师在教学中总习惯于让所有学生“齐步走”，必然出现并不断积累的学习成绩差异，使越来越多的学生沦为“后进”。

多次尝试失败：人们常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但对相当多的“后进生”而言，失败是失败之母！面对他们第一次“失败”，教育者并未予以应有的心灵抚慰和学习帮助，以致使沉重的自卑感成了第二次失败的前奏。如此恶性循环，使本来可以学得不错的学生，成了教师眼中的“瘟猪仔”！

3. 个人方面的原因

街头结交：交友不当，因而染上社会恶习，是一些孩子成为“后进生”的重要原因。

身体状况：体质较弱或身体某些方面的疾病，自然会导致孩子的学习成绩不佳，以致成为“后进生”。

智力状况：个别学生反应迟钝、接受能力较弱，也是他们学习落后的原因。

以上只是粗略地将“后进生”的成因作了个大致的划分。我认为，在家庭、学校和个人三者中，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原因是主要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首推家庭。但作为教育者，我们在研究“后进生”时，应该也必须把着眼点放在学校教育方面。

就班主任工作而言，在转化“后进生”时，必须把他们放在整个集体

教育中来考虑。根据我多年工作的体会，转化“后进生”务必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感情倾斜。教师对“后进生”真诚的爱，是转化他们的第一剂良药。“后进生”们几乎从受教育起就伴随着呵斥、嘲笑、辱骂甚至体罚，因此，教师应怀着强烈的爱心给他们以心灵的呵护，帮助他们树立起人的尊严。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首先这种“爱”不是特殊的“偏爱”，而是自然而然的和其他学生一样平等的爱。不然，“后进生”仍然会觉得老师对他是一种形式的“另眼相看”。其次，这种“爱”不应该仅仅来自老师，还应来自学生集体，要让“后进生”感到不但老师没有歧视他，而且同学们也在真诚地尊重他，进而唤起他对集体的热爱之情，并把这种感情转化为上进心。

第二，唤起向上信心。苏霍姆林斯基有句名言：“真正的教育自我教育。”我想，这对“后进生”同样适用。每当感到学生不听我的话时，我就问自己：“我的这些话，是否点燃了他心灵深处向上的愿望和信心？”无数事实证明，只有当学生自己有强烈的上进愿望和信心时，他的进步才会出现并得以持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转化后进生”，更多的时候就是不断唤起他向上的信心。

第三，引导集体舆论。每当读到或听到某一位班主任如何长期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帮助某一“后进生”时，我总是纳闷：怎么帮助“后进生”成了教师一人的孤军奋战呢？集体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事实上，比起教师单枪匹马的操心，学生集体的健康舆论更有利于“后进生”的转化。教师要善于把自己对某一学生的批评、表扬、鼓励、关心、帮助变成集体对这个学生的批评、表扬、鼓励、关心、帮助。

第四，讲究有效方法。我这里没有说“科学方法”而说“有效方法”，当然不是不讲“科学”，而是更强调“有效”：“有效”的方法往往包含有“科学”的因素，但有时“科学”未必“有效”（比如：缺乏可操作性、缺乏具体针对性等等）；另外，这里的“有效”，还包含有“艺术”的意思（方法更新颖而使学生易于接受）。总之，转化“后进生”除了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还必须有“十八般武艺”的行为引导、规范甚至必要的制约。

在我与“后进生”长期磨合的过程中，我采用过的比较有效的具体方法有：

写“家校联系本”。让“后进生”为自己确定一个“帮助人”，让这个“帮助人”每天将“后进生”的表现（纪律、作业、进步、问题等）写在《家校联系本》上，然后让“后进生”带回去给家长看。

填“报喜单”。每当新学期开始，我便印制好一叠“学生进步报喜单”，每个周末发给本周进步明显的“后进生”，让他们带回去向家长报喜。

游玩。我常常利用节假日，邀约班上的“后进生”和他们的“帮助人”一起去公园或野外游玩，有时把这样的活动当做对进步学生的奖励。当学生忘记了我是他们的老师而和我一起摸爬滚打时，我的教育已成功了一半。

集体评议。不定期由全班学生评选“最需要帮助的同学”，让班长当场公布结果，并对有关同学提出希望；过一段时间，再在班上评选“最近进步最大的同学”，仍由班长当场公布结果，并对进步大的同学发奖或“报喜单”。根据我的经验，这样前后两次评选活动的当选者往往是同一学生。

写“每日九问”。引导“后进生”养成每天“自省”的习惯：一问今

天影响同学学习没有？二问今天上课开小差没有？三问今天学习上提出什么问题没有？四问今天的功课复习预习没有？五问今天做过什么不文明的事没有？六问今天说过脏话没有？七问今天战胜弱点没有？八问今天有进步没有？九问今天有什么遗憾没有？

写“灵魂的搏斗”。引导“后进生”自己战胜自己并体验其中的乐趣。某一“后进生”做了一件他以前不容易做到的事之后，请他写“灵魂的搏斗”记述“战胜自我”的经过，然后在班上朗读，以激励更多的学生。

安排当干部。为了让“后进生”也有体现自己尊严和才能的机会，我有时鼓动同学选他们当班干部，或者给他们安排一个“助理”、“干事”之类的“职务”。他们一旦有较好的工作成绩，即让全班同学给他们以褒扬和鼓励。

对手竞赛。让每一个“后进生”都找一个与自己各方面情况接近的同学作为竞争对手，在纪律、学习等方面展开比赛，并定期让全班评比。

学生作文表扬。向学生布置写《××同学进步大》的作文，并在班上朗读或张贴，以形成一个催人向上的集体舆论氛围。

推荐好书。有针对性地给学生推荐有益读物，并定期和他们一起讨论阅读体会，引导他们形成健康的精神生活。

下面，我想以我和一位名叫万同的“后进生”打交道的经历，来展示一下我在做转变“后进生”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我和万同的故事

我当了一回“福尔摩斯”

下午，学生们正在上体育课时，游贤来向我报案：“李老师，我的‘随身听’被人偷了。”

我问：“怎么回事儿？说具体些。”

“今天，我背着家里把‘随身听’带到学校来。上体育课前，我把它放在我的课桌抽屉里。刚才我回教室拿乒乓球拍，发现‘随身听’不见了。”

我又问：“你想想，有谁知道你带了‘随身听’到学校来？”

他说：“好些同学都知道。”停了一下，他又说：“李老师，我的‘随身听’可能是社会上的人偷了。”

“为什么呢？”我感到有些不解。

“万同说，他刚才看见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我们教室外面游逛，可能是那几个人偷了。”

“现在万同在哪儿？”

“他说他去帮我追那几个人去了。”

我想起来了，上体育课不久，万同就来向我请假，说他病了，要提前回去打针，我便同意了。

“他怎么追得上？”我又对游贤说，“你看，这怎么好清查呢？记住，以后不许把贵重的东西带到学校里来！”

这是学生进初中第一天发生的事。游贤在这第一天便损失了一部价值千元的“随身听”；我在这第一天，便遇上了这么一桩“大案”。

第二天早晨，游贤又来向我报告：“今天万同一到学校便叫我把‘随身听’的使用说明书送他。他说他奶奶也给他买了一个‘随身听’，但说明书弄丢了。”

我一下来了兴趣：“万同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反正你的‘随身听’都被人偷了，说明书也没用了，干脆就送我算了。”

我猛然茅塞顿开！遂当机立断：“你马上把万同叫来。”

一分钟之后，万同坐在了我的面前。我便仔细打量起万同来：蓬乱的头发，似乎从来没有梳理过；黑黑的脸庞，左脸颊上隐隐约约有一块疤痕；由于下嘴唇比上嘴唇突出，所以给人一种赌气的感觉；眼睛不大，闪烁着与他年龄不大相称的老练。此刻，这双老练的眼睛正坦然地迎着我对他审视的目光，也审视着我。

“今天，公安局的人到学校来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万同，严肃而缓缓地说出了第一句话。

他的眼中顿时闪现出一丝惊慌，但仍然死死地与我的目光对视。

我继续不紧不慢地对他说：“昨天，游贤的家长去报了案。公安局的人来学校后，先到政教处……”

万同的眼睛仍死死地盯着我，但眼光已是一片呆滞，仿佛他已没有了知觉。

他的眼睛已完全告诉了我他此刻的内心。我接着说：“公安局的人说，破这个案子不过是小菜一碟。”

他终于垂下眼帘，说：“我……是与游贤……开玩笑的。”

我顺着他的话说：“就是嘛，我也在想，这里面肯定有些误会。所以，我才对公安局的人说，先让我来处理这件事。”

他于是急忙申辩：“我的确不是想偷，我真的是和他开玩笑！”

“我也想，万同是不会做那种事的。”我语气更加缓和了，“但是，你这个玩笑可开大了，把公安局都惊动了。这样吧，我去向公安局的人澄清这个误会。你呢，下午记着把游贤的‘随身听’带来交给我，由我还给他。好吗？”

他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

下午，我把“随身听”还给游贤时对他说：“万同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应该原谅他。而且，你一定不要对班上任何同学讲这件事，以免万同背思想包袱。”

游贤拿着失而复得的“随身听”高高兴兴地走出了办公室。

我找出了万同的家庭情况登记表，仔细研究起来：在父母情况的“备注”一栏中，写着“父母已离异，现随母”一行字。

“哦！万同是离异家庭的孩子。这种家庭，一般不会有太好的教育环境……”我不禁若有所思。

唉！“随身听”——“案”倒是火速“破获”了，可我与万同的“较量”才刚刚拉开序幕啊！放下万同的家庭情况登记表，我不由得重重地叹了口气。

“新官”未能烧到“三把火”

然而，开学第一周的周末，万同却让我刮目相看。

在第一次班会课上，我让学生们评一评：在第一周，谁为我们这个新的班集体做的好事最多？

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不少学生都提到万同——

有的说：“每天下午放学后，万同都主动留下来和值日生一起打扫教室。”

有的说：“每天早晨，万同来得最早，来了以后便做早扫除。”

还有的说：“有一次，万同从家里拿来钉锤修理班上的椅子。”

……

学生们当然不知道“随身听”的“案子”，但他们说的也是事实。所以，万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表彰。

多年养成的教育敏感使我意识到，教育良机来了。于是，放学后，我把万同留下来谈心。

我先问万同：“还记得李老师和你们第一次见面时，送你们的第一句话吗？”

“好像，好像是——”他回忆着，“是‘让人们……幸福’吧？”

“是‘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我对他说，“请重复一遍。”

他一字一顿地认真重复道：“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

“很好。但别再忘记了。”我又问他：“懂这句话的意思吗？”

“懂，但是说不出来。”他憨厚地笑了笑，显出了几分难得的天真。

“比方说，”我努力用他能理解的语言解释说，“这个星期，你多次主动打扫教室，同学们就因你的存在感到了班集体的温暖；又比方说，你主动帮同学修理坏了的椅子，那位同学就因班上有了你而感到了幸福！”

听了我的话，万同的脸上泛出了感动而又有些不好意思的红晕。

“可是——”我把话题一转，“那天，你把游贤的‘随身听’拿了，他就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痛苦，甚至可能对我们班级也产生了不好的印象。你说是不是啊？”

万同低着头轻轻地点了一下。

“所以，李老师希望你永远做一个能让别人感到幸福的人！”我双手拍着他的两肩，郑重地说。

他抬眼望着我，又重重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班里选举临时班委时，万同把手举得很高很高——他迫切要求当清洁委员。全班同学鼓掌通过。

万同就任清洁委员的第二天，便遇上“创卫”迎检大扫除。他不但“身先士卒”——为了擦干净黑板上方的积尘，他竟叠桌架椅地“高空作业”；打扫完本班教室后，还邀约几位同学去帮别班同学搞卫生。

当天，我班的卫生得了个年级最高分！

然而，“新官”上任还未能烧到“三把火”，就引燃了许多同学对他的愤怒之火——

他课堂纪律实在太糟糕：不是与同学说话，就是趴在桌上唱歌，甚至还与后面的同学打闹，总之，几乎没有一分钟的安稳，真让人怀疑他凳子上是否有钉子或者他屁股上是否长有疮。

第一次语文单元测验，他仅得了17分！

自然，在正式班委选举时，尽管他仍然高举要求“连任”的手臂，但是全班绝大多数人没有把选票投给他。

“哼！有啥了不起？老子本来就不想当这个狗屁干部！”一下班会课，他又恢复了一脸的“痞气”。

未曾料到的“知名度”

我决定对万同进行一次家访。

于是，一天下午放学后，我揣上学生花名册骑车出了校门。

他在花名册上填的家庭住址是“华西街52号16幢三单元六楼”，可是，我在华西街来回骑了几转仍然晕头转向：因为有“华西上街”、“华西中街”、“华西下街”，而这三条街的每一个52号都没有“16幢”！

我只好从华西上街开始向居民打听。华西上街52号是一家抄手（注：馄饨）铺，我先问一位老板模样的汉子附近有没有“16幢”。他反问我找哪条街啥门牌号哪个人。我只好又把“华西街52号”重复了一遍，并照着花名册上说了万同填的其母姓名“田翠芬”。他摇摇头：“不认识。她住华西上街、中街还是下街嘛？”

我当然也说不出。这时，店堂里面一位刚吃完抄手的老太婆放下碗，转过脸来，用“分析敌情”的眼光打量我：“你是她的啥子人嘛？”

我一下笑了起来：“我是她儿子的班主任，是来家访的。”说着，我把手中的花名册递给她看。

老太婆拿过花名册，贴着鼻子尖“研究”起来，大概是在鉴定其真伪吧。然而，当她抬起头来时，脸上却堆满了感动：“哦，当真是来家访的嗦？这年头，家访的老师还真难找。”接着，她又道歉般解释道：“严打期间，不能不警惕点。”然后，好像是为了弥补什么似的，她竟主动帮我分析起来：“田翠芬，田翠芬……这个名字我倒没听到过。哎，她的娃儿叫啥子名字？”

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但实在不忍拒绝老太婆的热情，便说：“万同。”

“哎呀！万同？”她惊叫了一声，“你说的就是同娃儿嗦！”

老板扛了一袋面粉过来，重重地放在案桌上，也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唉，你不早点说是找万同……”

我似乎绝处逢生：“你们认识万同？”

老太婆好像很奇怪我提这个问题：“这附近几条街的人哪个不晓得同娃儿？”

老板一边和面一边说：“老师，这同娃儿烦人得很哟！年纪不大，却常跟街头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经常打架斗殴，染了一身匪气……”

“不过话又说回来，”老太婆截断老板的话说，“这娃儿也造孽（注：可怜）！几岁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他先是跟着他爸，后来他爸又结了婚，后妈对他不好，他就回到亲妈这儿来。但是他妈也结了婚，后爸不愿认他这个儿，他只好去找爷爷。不久，他爷爷死了，于是他又回来找他妈……唉！造孽，造孽！有好长一段时间，他还没有人管，孤儿一样……”

听到这里，我更急于想找到万同家了，便问老太婆：“他就住在这条街吗？”

“哪儿是这条街哟！”她摆了摆手，又给我比划着说，“他住在华西后街。诺，从这儿往前走，一直走完华西下街，然后往左拐进一个小巷，走大概100米，再……唉，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你到那一片去问，只要说‘万同’，多半都晓得。”

小小万同在这一带居然如此“家喻户晓”！看来在这之前我还真是小看了他。虽然他在填家庭住址时，少写了一个关键的“后”字，害得我在“华西街”上东奔西跑，但此刻我觉得一点都不冤枉！

果然，凭着万同的“知名度”，我很顺利地叩开了他的家门。

门是虚掩着的，敲了几声没人应，我干脆推开门进去了。里面光线很昏暗，屋内的生活用品破损陈旧，摆放凌乱：我疑心自己走进了一家废旧物品收购站。在昏暗的光线里，一中年妇女半躺在床上，未经梳理的头发遮住了她半张脸。这大概就是万同的母亲了。她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便对正在阳台上摆弄汽车模型的万同吼道：

“狗日同娃儿瓜娃子，还不给你们李老师倒杯开水！”

然后，她拢了拢头发，欠起身子抱歉道：“不好意思，李老师！我前几天把脚杆摔坏了……”接着，她又着急地问我：“同娃儿在外头又摆了啥子摊子哇（注：摆摊子是四川方言，即惹是生非的意思）？”

“没有，没有。”我接过万同端来的水杯，让他坐在我身边，“我是来作一般性家访的。”

“哎呀，同娃儿小学读了六年，从来都没有老师来家访过。我倒是三天两头被老师叫去学校挨训——都是因为他不给老子争气！”

说着说着，她向我倒起了一肚子的“苦水”：前夫在外面“乱搞”，两口子经常打架，然后离婚，另结婚，后来的这个男人很讨厌同娃儿，又喜欢赌钱，输了便醉酒，醉了酒便打她，目前，正在闹离婚……

“其实，我不敢和他离，”她很响地擤了一把鼻涕，并熟练地揩在床单上，继续说道，“因为离了后，我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了。我是前几年‘农转非’的，没有工作，身体又不好……”

话题转到万同上，她就开始骂了。其神态之凶神恶煞，使我怀疑她是否

是万同的亲妈；其语言之不堪入耳，让我脸红耳热。我生怕坐在一旁的万同跳将起来和她对骂——然而，万同居然神情自若，俨然受辱不惊！……

出了万同的家，已是万家灯火。仰望夜空，圆月如轮——我一下子想起来：

哦，今天是中秋节！

他给自己找了个“帮助人”

我几乎每天都要接到对万同的“举报”——

“李老师，万同一上课就摇我的桌子。”

“李老师，万同把撮箕、扫帚搁在教室门上面，同学一进教室便挨砸。”

“李老师，万同抢我的钢笔，我叫他还我，他就说要放我的血。”

“李老师，万同今天自习课上拿出一张女同学的照片，向我们炫耀说是他的女朋友。”

……

我班第一次试行无人监督考试，全班绝大多数同学经受了考验，就万同一人偷偷翻书作弊。气得我当即上报政教处，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

看来，是得采取措施了！这天，我打算下午放学后，把万同留下来，狠狠批评一顿，然后在班上给他指定一名“帮助人”，督促其每天在校遵守纪律。

但是，在去教室的路上，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个教育措施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来实施呢？

我决定试试。

走进教室，我对学生们说：“这段时间，一些同学表现得不好，为班上抹了黑。当然，也许这些同学已经感到惭愧了。今天我准备留下一些同学谈心。这样吧，凡是觉得自己最近表现不好，而又愿意接受李老师帮助的同学，请举手。”

几个比较调皮的学生陆陆续续举起了手，我看了看万同，他没有举手，但他有一只手扶着脑袋，好像欲举又止。

我知道他此刻的心理状态，便有意问大家：“还有没有啊？”

学生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射向万同。万同埋着头，迟疑了一下，终于把手举了起来！

“好，这些同学主动请求李老师的帮助，他们是高尚的！”我对全班学生说道，“让我们用掌声鼓励他们的勇敢！”

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说：“李老师将满足每一个举手同学的愿望，尽量帮助他们。今天，我就先留万同同学谈心。”

万同在我办公室温顺地坐下了。此刻，在我的眼中，他不是被我当着全班同学“揪”出来的“后进生”，而是主动请求我帮助的渴求上进的学生。

我和蔼地问道：“你是不是表现不好啊？”

“就是。”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怎么样的不好呢？”我仍然很和蔼地问。

“我上课老坐不住……还爱欺侮同学……还，还骂人。还有，还有……”他很认真地边想边回答。

“你是不是进中学才这样的啊？”我又问。

“不是。我小学就一直是这样。”

“你说说，小学时你犯了错误，老师怎么教育你呢？”

“扇耳光！”他不假思索地说道，“还有吃粉笔，还有用透明胶布把嘴贴上，或者把我撵出教室……”

我心里一惊：居然有这样的手段！不过，由此也可看出小学的万同是何等地让老师伤透了心。

我问万同：“那么，你希不希望李老师也这样体罚你呢？”

“当然不希望啦！”

“好，李老师向你保证，无论你今后犯了多大的错误，我也决不会打你，也不会用不文明的语言骂你。”

他抬起了头，很感动地看着我。

“可是——”我话题一转，“为什么从小学到现在，你老是改正不了自己的缺点呢？请继续说实话。”

“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真的。”他眼里闪烁着真诚的苦恼，“有时我提醒自己，一定要管好自己，可过一会儿又忍不住动了起来——我真恨自己！”

无论是课堂上的“声东击西”，还是课间的霸气十足，那个万同无疑是真实的；而这时候，满脸纯真说“我真恨自己”的万同也是真实的。如果教育者否定学生的两重性甚至认为学生的真诚不过是在演戏，那么，教育者不但低估了教育的复杂性，而且还会伤害学生心灵中渴望做“好人”的道德萌芽。

——我决心尽最大努力扶持万同心灵中这棵弱小的萌芽！

“好吧，我们现在一起来想想办法，怎样才能使你控制住自己？”我说。

万同想了想，说：“李老师，您和我一起上几堂课吧！随时提醒我。”

我笑了，反问道：“那我还备不备课，改不改作业呢？”

他也笑了，又说：“这样吧，您在教室后门上掏个小洞，这样可以悄悄地在外面看我的表现。”

“我不想当特务。”我说。

“那您说怎么办？我听您的。”他用期待的眼睛看着我——此刻的万同真是可爱极了！透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善良的星星之火正在他心灵深处燃烧。

“我给你找了两位老师，让这两位老师随时提醒你别违反纪律。”我严肃而诚恳地对他说，“一位就是你自己——每个人的上进心和意志都是自己最严厉的老师；另一位呢？是你的同学——我打算给你安排一位‘帮助人’，由这位同学随时注意你的表现并提醒你改正。之所以叫‘帮助人’，就是说，这位同学是出于对你的爱护而帮助你进步的。你不是想叫李老师和你一起上课吗？你的‘帮助人’就相当于李老师。”

万同很高兴，连忙问我：“李老师，你快说，我的‘帮助人’是谁？”

看着他那急切的样子，我脑子里又转了个弯：与其由我给他指定“帮助人”，不如让他自己给自己找“帮助人”，这样他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动性更强，效果可能会更好些。于是，我说：“这个‘帮助人’，由你自己在班上找。条件是：第一，你最信任的人；第二，他比你表现得好；第三，他又坐在你附近。”

他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就请我的同桌同学袁夏，行不行？”

“你自己觉得行就行。”我又告诫他说，“不过，袁夏是个女同学，你

可不能欺负她呀！”

“保证不会！”

我又说：“袁夏怎么‘帮助’你呢？她每次上课时要提醒你好好学习，不要违纪；每天下午放学时，在‘家校联系本’上向你的妈妈写上你当天在校的表现。”

“啊？”他十分不愿意“帮助人”写“家校联系本”，因为他担心自己表现不好而被家长知道。

我耐心地对他说：“前不久，我七岁的女儿因腿病住进了医院。医生说，为了治好她的腿，必须做‘牵引’，就是把腿固定起来，一动不动。这是很痛苦的。我女儿哭着求医生别做‘牵引’，但为了疗效，医生非这样做不可。一周以后，我女儿的腿病大有好转，现在已经出院了。你想想，假如我当初因为心疼女儿而不同意给她的腿做‘牵引’，那么，也许我女儿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哭呢！”

万同懂了我的意思，说：“写就写嘛。”语气中还是有一点不情愿。

我又说：“其实，你不要把‘联系本’想象成‘告状本’。你的进步和其他好表现，‘帮助人’也应通过‘联系本’向你妈妈汇报。”

万同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见，爽快地说：“好吧！就从明天开始，我让袁夏随时监督、帮助我。”

最后我说：“今天，是你自己要求李老师帮助你，又是你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位‘帮助人’。我相信，从明天起，你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袁夏同学在万同的‘家校联系本’上这样写道——

阿姨：

万同请我做他的“帮助人”，督促他遵守纪律。以后我每天都会给您汇报万同的在校表现。万同今天大有进步，语文课还主动举手发了一次言，受到李老师表扬。但他地理课表现不太好，用钢笔在前面同学的背上乱画。希望他改正。

《烈火金刚》手抄本的诞生

“帮助人”使万同的纪律明显好转，连续两周班里评比“进步最大的同学”，万同都名列榜首。

不仅仅是纪律有进步，而且他又恢复了对班级事务的热情。为迎接上级检查，学校要求各班美化教室，我便请学生去买几幅科学家的肖像贴在教室墙上。万同非常积极，中午放学后连饭也不回家吃，便骑车直奔新华书店。下午上学时，他气喘吁吁地给我一张斯大林的画像：“李老师，这是我买的科学家像挂图。书店只剩这一种了。”

虽然我哭笑不得，但还是在班上表扬了他关心集体。

然而，好景不常——

这天，袁夏交给我一张糖纸：“李老师，您看——这是万同上英语课时偷偷贴在我背上的！”

紧接着，英语老师也告诉我：“这个万同，上课从来不听讲，这段时间虽然很少影响其他人了，但上课他总在搞小动作。”

看着袁夏留下的这张糖纸，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万同学习成绩太差，必然对学习感到痛苦，最后，他的所有兴趣就只能集中在这些小动作上了！换句话说，如果不让他在学习上产生愉悦感，那么，仅仅靠意志来维持良好的纪律，是不可能持久的。

星期日，我约上万同等一群调皮学生去杜甫草堂游玩，万同高兴得脸上绽出了平时在校园里很难看得到的天真笑容。在湖边，他硬要拉我与她一起划船，还主动去把船票买了。于是，我和他跳上了晃悠悠的小船。

“万同，你上课为什么老要搞小动作呢？”柳荫小桥下，我一边划船一边和他聊了起来。

“我听不懂。”他回答得很干脆，一点没有我想象的“苦恼”。

“有没有能听懂的课？”

他想了一下，说：“语文和英语能听懂。”

我感到吃惊：“你真的能听懂英语？”

他点点头：“嗯，反正跟着老师读就是了嘛！”

原来如此——他认为只要跟着读，就算听懂了。

我又问他：“哪些课你最听不懂？”

“数学，还有地理……其他课我都听不懂。”停了一会儿，他又说：“确实听不懂。”

我顿时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听不懂课而又必须坐在教室里，而且还不许做其它事，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啊！可万同却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地在忍受着这种痛苦。

“这样好不好，万同——”我认真地对他说，“我给你一本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烈火金刚》。以后只要能听懂课，你就认真听，遇到听不懂的时候，你就看《烈火金刚》，好吗？”

“您同意我上课看小说？”万同望着我，好像不相信我的话。

“是的！如果你真的听不懂的话。”

万同竟高兴得跳了起来，小船随之一倾斜，他没立稳的身子眼看就要落水，我一下把他拉住了。

离开杜甫草堂时，万同不住地问我：“李老师，您什么时候把《烈火金刚》给我呢？”

“明天就给你！”看到他愿意读书，我也有点兴奋了。

果然，以后好几天，万同在课堂上不再捣蛋了：别人听课，他读小说，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然而，似乎只是昙花一现，过了不久，学生们又来向我反映万同上课“坐不住”了。

我把万同找来：“怎么？老毛病又犯了？”

“我不想看《烈火金刚》了。因为好多字我都不认识。”万同说。

哦，原来是这样。确实，以万同的语文基础，他看《烈火金刚》这样的“大部头”的确有些困难。于是，我又与他商量：“这样好不好？你抄《烈火金刚》吧！在抄的过程中，如果有不认识的字，你就写在一张纸条上，拿来问我。好吗？”

“好吧！”万同立刻去学校小卖部买了一本作文本。

这以后，万同不时到办公室来请教生字；我呢，在教他认生字的同时又检查他手抄的《烈火金刚》。他写的字不算好，但一笔一画都十分认真。

有的老师知道了，不无担心地对我说：“你让万同抄《烈火金刚》，他怎么能够通过初中毕业考试呢？”

我说：“他不抄《烈火金刚》，也很难初中毕业，而且上课还要去干扰别人，很可能使更多的人不能初中毕业。让他抄抄小说，他脑子里多少可以

装些抗日英雄的形象，何况还可以练练字，并多认几个字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听到有人来告万同的“状”，因为他上课有事做了呀——别人在思考几何难题或做物理题的时候，他却正在奋笔疾书，沉浸在半个世纪以前冀中平原的抗日烽火之中……

“未娶媳妇就想不认娘”

“李老师，同娃儿出走了！”电话里，万同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一惊：今天下午放学时，万同还拿了一本新作文本请我写封面。当时，他高高兴兴地告诉我，他第一个作文本的《烈火金刚》已抄完了。怎么一回家就出走了呢？

我忙问他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大概八点左右。”

我一看表，此刻是九点过四分。放下电话，我马上赶往万同家。

据他母亲说，下午，她收拾万同的桌子抽屉时，发现了一封信，是万同小学时一位叫司婷婷的女同学写来的。晚饭时，她便问万同怎么回事，并叫万同不要和这位女同学来往。万同当即就大耍脾气，说“你少管！”吃完饭后，他母亲出去理发，回来便不见万同。桌上留有一张纸条，说他找司婷婷去了。

我拿起那张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的条子看了起来——

12年来，你很少关（管）我，你和爸立（离）昏（婚）时，你们两个都不要我，我像古（孤）儿一样。还是司婷婷对我好，我就是要和她好，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我不要你关（管）我们的事。

我走了，去我（找）司婷婷。

我又看了看司婷婷的来信，上面写满了从言情小说里抄来的爱情词语，赤裸裸地希望和万同“生不同寝（寝）死同穴（穴）”。

万同母亲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她的同娃儿如何“媳妇都还没有娶就想不认娘了”，又说她怎么怎么“命苦”……

我劝道：“好了，好了，先找人要紧。——司婷婷住在哪里？”

她含糊其辞地说了好几个地址，最后又补一句：“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

我按着这几个“不太清楚”的地址，骑车穿行于大街小巷，直到深夜十一点过，仍一无所获。

当晚我躺在床上，老想着万同这件事，久久不能入眠。后来迷迷糊糊地在梦中把万同找到了——他在一个建筑工地的砖堆上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半，我刚上完课，办公室的老师便告诉我，刚才距本市三十几里外的一物资仓库打来电话，说我校初一年级一个叫“万同”的学生，昨夜游荡到那里，被治安联防队员收留，请学校速去领人。

我随即打电话给万同的母亲通报了这种情况，然后叫了辆出租车，二十几分钟便赶到了那个仓库。

接回万同，他却怎么也不肯回家。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我只好先带他走进一家餐馆。

“你不是说去找司婷婷吗？怎么朝外地跑，而且是一个人呢？——我希望你对我说实话。”饭桌上，我严肃地问他。

“我没找到司婷婷，又不愿回家……我便想去乡下找我奶奶。走着走着……我就找不着路了……”他一边大口大口地吞咽，一边回答我。

“你为什么这么恨你妈呢？”

“听我奶奶说，原来我爸我妈离婚时，他们都不要我。”说着说着，他眼圈有些红了，赶紧埋头扒饭。过一会儿，他又接着说：“现在，她又经常出去或邀约一伙人来搓麻将，常常闹个通宵。有时输了又交不出钱，就被人家打，她挨了打就回来骂我出气……”

听了他的话，我很长时间一言未发。

从餐厅出来，我对他说：“你必须回家。不管怎样，她还是你的母亲，而且，她现在还与你相依为命。昨天，给我打电话时，你妈都哭了，可见她从心里还是很爱你的。这样，我先给你妈打个电话，劝劝她。”

在电话里，我严肃地对万同母亲说：“万同找回来了，但我不能保证他以后不会再次出走。当然，我会继续教育他。我希望你不要再赌钱了，至少不要在家中搓麻将，更不要拿万同出气。”

“我没有拿他出气啊……”她支支吾吾地说，“搓搓麻将有什么关系嘛！”

我继续说：“我无意干涉你的生活方式，但万同不仅是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学生，我有责任为他争取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我舒缓了一下语气：“我也是真心诚意为你好。”

“好吧，我以后注意点。”她总算答应了我，虽然不是十分情愿。

在送万同回家的路上，我提到司婷婷：“大道理我不多讲。如果你信任李老师的话，咱们另外抽个时间好好聊聊。现在，我只希望你至少做到也必须做到，暂时别和她来往，好吗？”

他想了想，终于点了点头。

目送着他的身影走进他家的单元楼时，我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说实话，虽然司婷婷向万同表白“爱情”，万同也扬言“就是要和她好”，但我并不认为小小万同真会与那个司婷婷“早恋”，更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爱情”；然而，这事却提醒我：万同是一个精神和感情的双重孤独者！——从小就没有什么亲情之爱，读小学起便生活在集体舆论的对立面，成绩太差使他很难从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干涸的心田，渴望真情的雨露，可是，谁来满足万同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精神需要和感情企盼？

而离开了对学生心灵的尊重，还有什么“教育”可言？

“我们才是你真正的哥儿们！”

万同在社会上曾有许多哥儿们：有的是他原来小学的辍学同学，有的是他流浪时的“患难之交”，还有一些是街头斗殴时“不打不相识”、“越打越亲热”而结拜的“师兄师弟”。

刚进初中时，这些“师兄师弟”还不时来找他。经我多次教育，万同与他们的往来渐渐稀少。这天，万同放学回家，被他昔日的“兄弟伙”暴打了一顿。

消息是游贤打电话告诉我的。放下电话，我立刻赶往现场——西南民族学院。

原来，这一段时间，这伙人天天都在万同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西南民族学院侧门守候万同，约他去“玩”。万同都以“没时间”推辞了。今天，万同和游贤回家走到这里，他们又围着万同，硬要拉他一起去打台球；万同不肯，这伙人便要他“缴纳管理费”！结果发生摩擦，最后，四五个人用拳头、木棍把万同“教训”了一顿。游贤吓得直奔电话亭，拨通了我的电话。

我赶到时，万同正在路边蜷成一团蹲着，一些过路群众已经抓住三个十五六岁的打手。知道我是被打者的班主任后，纷纷向我诉说刚才的惨状：

“这些二流子简直没有人性，把他围住拳打脚踢！”

“我们大家都吼起来了，这一伙人赶紧跑了。我们抓到了其中的三个。”

我把万同扶起来，他的前胸衣服被撕破了，面部流着血，左眼肿得像个桃子，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说他背上火辣辣的，我撩起他后背的衣服，只见他背上青一块紫一块。

我叫了一辆三轮车，请游贤把万同送回家；然后，在几位热心群众的协助下，将那三个少年歹徒押到了派出所……

万同睡在家里，不能来上学。他被打的消息震动了全班，我决意通过全班同学声援和慰问万同的活动在班上营造一种正气、一种温暖，让万同感受到来自整个班集体的真诚关怀。

我对学生们说：“也许在不少同学的眼里，万同是个坏学生。是的，他的确有不少不良的社会习气。但是，作为他的同学，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想一想：我为万同的进步能做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

我向学生们介绍了万同的家庭和他令人同情的经历，然后又说：“万同本是真心要与过去一刀两断，可那些社会上的二流子却总要来纠缠他，他不依从，便被打成这样！现在，万同面临这严峻的选择：要么回到那个坏人圈子里，从此真正堕落下去；要么回到我们的集体，努力做一个好人。作为他的同学，我们应该给他以向上的勇气，鼓励他不向邪恶屈服，并帮助他勇敢地告别过去，走向正直！我们班应该是一个充满正气和温暖的集体，生活在这集体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应感受到向上的动力，而不应该让这个集体的任何一位同学受到冷落，成为精神上感情上的孤立无援者！”

学生们的心，显然被我的一番话打动了。于是，我郑重发出号召：“请每一位同学都给养伤的万同写几句慰问、鼓励的话。今天放学后，我和班干部将代表全班同学去看望万同。”

学生们的纸条很快便交上来了——

“万同，别怕！正义永远和你在一起！”

“斩断恶习，总是要付出痛苦的代价。有我们，你千万不要后退！”

“不要在乎这次挫折，难过的时候，哼哼这首歌：‘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我已经习惯每天给你写‘家校联系本’了，你没来上学，我还真不习惯呢！祝你早日养好伤！”

“说实话，我讨厌过你，但你没来，我却老想着你为班上做过的好事！你早点回来吧！”

“我们才是你真正的哥儿们！”……

当我把这一张张纸条交给躺在床上的万同时，他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好想回学校上课啊！”

第二天，游贤送来万同写给全班同学的信——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

我爱（挨）打以后，你们很关心我。我飞（非）常感动。我没来上学，做课间抄（操），我班少了一个人就要口（扣）一分。我这里只能说声对不起。我以后决不根（跟）坏人完（玩），一定要好好学习，更加进步。报大（答）李老师，报大（答）同学们！

一周之后，万同回到班上时，迎接他的，是全班同学雷鸣般的掌声……

我替万同回绝了一封“情书”

万同重新上学后，各方面的表现明显比过去好了。为了防止那伙人报复他，我组织了班里几个大个子每天护送他回家。

我心里一直还装着那封司婷婷的信。现在，我觉得时机成熟了，便把万同叫到了办公室。

我从班里同学对他的关心谈起，问他：“你觉得班上同学们怎么样？”

“很好！”他说，“比我小学的班不知好多少倍。”

“为什么？”

“上小学的时候，我成绩不好，老师经常骂我，有时还打我，同学们也看不起我。”

“那，你小学的班上就一个好朋友也没有吗？”

“不，也有一个，”他迟疑地看了看我，“就是，就是……司婷婷。”

我心里暗自高兴：这么自然就把谈话引入了主题！

但我表面上却不露声色，顺着他的话继续问道：“你怎么会和她好呢？”

“她的成绩也很不好，老师和同学也看不起她。”

“哦！”我理解地点点头，又问：“最近，司婷婷来找过你没有？”

他犹豫了一下，说：“前几天，她又给我写了一封信来，问我为什么一直不答复她。我还没有回她的信。因为……因为，你对我说过，叫我不理她。”

我很感动，忍不住解释说：“我真的是为你好。”

“但是，”万同鼓了鼓勇气说，“我还是想回她的信，她也是真心对我好。再说，如果我不回信，她就要不停地给我写信。”

我耐心而温和地对他说：“你的学习不好，她的学习也不好。你们保持这样联系，会使你们的成绩更差的。另外，你们真的还太小，什么都还不懂啊！”

于是，我又给他讲起了我中学时代的一段经历：

我读中学时，班上有一位女同学老爱找我聊天。那时，我们普遍还分男女界限，她每次找我都是有借口的，比如借我的课堂笔记呀，问我数学题呀等等。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每次发了新的作业本，她总是拿来请我为她写封面上的科目、班级、姓名，说是我的字‘好看’，其实，我的字写得并不好。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对她也是颇有好感的，虽然我们并没有真正谈情说爱，但我心中的确有过不平静的波澜。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极细心的老年女老师，姓邵。也许她觉察到了什么，也许她什么也不知道，反正她找我去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至今我记得，她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人生的路很长很长，但要紧的只有那么几步。她说这是一个叫柳青的作家说的。她希望我走好自己的每一步。从此，我专心致志于学习，考上了大学。

我娓娓诉说着，万同静静听着。

最后，我把话题拉回来：“我一般不对学生讲我个人的这些事。但是，今天我把你当做朋友，便坦率地说了这么多。不知对你有没有启发。我真诚希望你能对自己负责，也是真正对司婷婷负责，结束你们这种危险的关系。”

好吗？”他低下头，没说话。“或者这样吧，你如果觉得和她一刀两断感情上受不了，就暂时做到不要继续发展这种关系，减少交往书信联系，让它冷却凝固一段时间。过几年你们长大了，更成熟了，再考虑两人的关系。怎么样？”万同抬起头，出乎意料地对我说：“李老师，您帮我给司婷婷写封回信吧！就按您刚才的意思写。”我忍不住感动地抱住他的两肩：“谢谢你对李老师的信任！”第二天，我把写给司婷婷的信给他看。信的全文如下——

司婷婷同学：

你好！

你这两次写给万同的信，万同都给我看了。他很苦恼，因为他想在现阶段集中精力把学习搞好，不愿受其他任何干扰。我是万同的班主任，也是他非常信任的朋友，他请我为他排忧解难，并请我给你写这封信。

我长期生活在中学生中间，对你的这种感情和举动完全能够理解。听万同说，你是一位善良的女孩。但是你不应该陷于这种感情之中。你这样既影响万同的学习，也影响你自己的学习。愿你把握好自己，莫负青春年华，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好吗？

万同仍然珍惜你和他的友谊，但他希望你不要再打扰他，因为他有更高远的追求——学习。

好，不多写了。真诚祝你早日成熟！

未曾谋面的大朋友 李镇西

我问万同：“这样写可以吗？”

他说：“可以。不过，请您再加一句：‘万同说，他仍然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当即就把万同这句话加上去了。

再次作弊以后

又一个新学期开始了。

星期四上午，我班地理测验照例实行“无监督考试”。可考试刚一结束，就有同学向我反映万同在考试中作弊。当时我一听就火了：万同上学期就因为考试作弊挨了处分，这处分刚撤消他又旧病复发。看来，还得给他更严厉的处分！

可是，我冷静一想：处分又有什么用呢？万同故技重演，不就充分说明处分并未真正触动他的思想吗？再给他“更严厉的处分”也未必能使他从此不再作弊。我由此反思在他第一次作弊后对他的处分是否妥当。显然，万同在受到处分后，并未意识到不但自己的品德蒙上了污点，而且还给班级抹了黑，也许他只认为是李老师个人与他过不去；同时，班上其他同学也未必因万同作弊而感到一种集体的耻辱，也许他们只认为不过是万同一个人犯了错误而已。因此，给万同的第一次处分并未达到既教育万同本人又教育全班学生的目的。那么对这次万同作弊，便不能再简单地以处分了之，而应把这件事作为引导学生自我教育的契机，让全班学生能从个人言行与班级荣辱的关系上来思考万同的作弊，使包括万同在内的每一位学生都受到一次真正深入心灵的集体主义教育。

事有凑巧，就在同一天，万同课间出教室的时候因太拥挤，迫不及待地 从桌椅上跨过去，结果摔了一跤，把脚摔成骨折。这对他本人来说是不幸的，但这却是难得的“良机”——使我和同学在帮助万同的时候，将“动之以情”

的关心与“晓之以理”的教育融为一体。

当天下午，学校组织看话剧《托起明天的太阳》。万同母亲打电话来说，打算请个三轮车送万同去看话剧，我对她说：“你可千万要把这个机会留给万同的同学”。

中午放学前，我对全班学生说：“大家已经知道，万同同学的左脚不慎摔成了骨折，这将给他的学习和生活带来许多不便。谁愿意在万同养伤期间为他提供帮助呀？”

话音刚落，几乎全班同学都把手举了起来。我点了几位同学，说道：“你们几位组成‘帮助万同小组’，下午去看话剧，就由你们想办法把万同送到剧场。另外，万同平时所遇到的困难，比如上楼进教室呀、课间上厕所呀、放学回家呀，也全包给你们了。当然，其他同学也可以寻找机会随时向万同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万同呢，也趁此好好体会并享受一下班集体的温暖。”

学生们都笑了起来。我接着说道：“大家还应该知道，万同今天是‘双重受伤’。他不仅左脚摔成了骨折，而且心灵染上了污点，考试作弊使他的一颗童心黯然失色。更严重的是，我们初一（5）班这个一向以考风纯正而令全校称道的班集体也因此蒙受了耻辱！他已不是第一次作弊了，所以必须给予更严厉的处分。只是鉴于他现在的特殊情况，处分下一步再说。同学们在生活上关心他的同时，还应该在思想上帮助他。今天回去以后，每一位同学都给万同写一封信，谈谈对他这次作弊的看法。”

下午第二节课后，几位同学用自行车把万同送进了剧场。

第二天，同学们交上了他们写给万同的信。

游贤写道：“万同同学，或许你至今不知道是谁揭发了你的作弊行为。告诉你，那个人就是我。你现在也许会在心里大骂我。的确，作为好朋友，我也觉得我有些对不起你。但是，也正因为是好朋友，我请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你没有在地理考试时作弊的话，咱们初一（5）班将能自豪地说：‘在无人监督的考场上，我们班每一个人都做到了绝对的诚实！我们是值得老师信任的，因为我们这个班集体是纯洁的！’但是，由于你，我们班失去了这份骄傲和荣誉，也对不起李老师对我们的信任。我真心希望你能战胜自我，赶上集体前进的步伐。也愿你的脚伤早日康复！”

袁夏写道：“万同同学，一道题做不起，是知识上的欠缺，好好地复习是不难补上的，可是作弊是心灵上的污点，是很难擦去的。你实在对不起全班同学！你想想，当天李老师问同学们谁愿帮助你时，有多少同学举起了手？有那么多同学关心你，你生活在初一（5）班是多么地荣幸！就凭这一点，你应该不辜负同学们对你的期望。请永远记住李老师常对我们说的话：‘诚实比100分更宝贵！’”

班长程实写道：“万同同学，我猜想，你现在一定有比腿伤更痛的东西刺着你，对吧？这东西就是你童心上的污点。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把你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人，而是与我们一样好学上进的学生，因此当李老师批评你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瞧不起你，而是产生一种想帮助你的愿望。你没有察觉出来吗？我想你一定没有尝到过虚假分数给你带来的真正的快乐。因为它是骗人的——骗老师，骗家长，更骗自己！这种欺骗，不仅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大家，更害了我们初一（5）班。作为班长，我真不希望有人，哪怕是一个，毁坏了我们班的好名声。不过，如果你改正了，大家一定会原谅你，一定会像往常一样和你并肩前进的。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你已经感到了温暖，不是吗？”

……

我把所有的信交给万同：“希望你认真看一看这些信，把每封信中最能感动你的话勾划出来，然后给全班同学写一封回信。”几天后，万同交上了他写的回信：

进（敬）爱的李老师、同学们：你们好！

我的脚受伤后大家很关心我。我很感谢大家。在那天上午地理考试的时候，我好（毫）无复习，做不起体（题），很召（着）急，就作了比（弊）。后来，李老师批评了我，同学们都给我写信，我把所有信都看万（完）了。我向同学们保证，要改正却（缺）点，要让初一（5）班（因为）有我而美好！

反正我在（再）也不作比（弊）了！

万同

我在班上念了万同的信，同学们对万同的真诚报以热烈的掌声。时间不停地流逝。同学们仍然关心着行动不便的万同——他上楼下楼，总有同学搀扶着他；课间他饿了，会有同学主动给他买面包；班里做清洁，同学们把他的一份也做了……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照顾，还有思想上的帮助。有一次生物单元测验前，坐在万同旁边的袁夏便提醒他：“你可要管住自己，千万别再作弊了啊！”万同呢，也果真以自己的进步回报同学们的关心与帮助——课堂上调皮的时候少多了，体育课他留在教室为同学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有一次他甚至不顾自己的脚伤去拉开正在打架的两位同学……

一个月以后，我又在一次班会上提到了万同作弊的事：“在同学们的关心和照顾下，万同的脚伤已基本好了。现在，我们该来讨论一下对万同作弊的处分了。我还是原来的意见，万同不是初犯，因此必须严惩。当然，这个班集体不是李老师我一个人的，而是全班同学的，像这样的大事也应该由全班同学做主。所以，请同学们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吧！”

第一位发言的是帅伟华同学：“我认为应该再原谅万同一次，因为他这段时间的确进步很大。在课堂上，老师批评他的时候比过去少多了；在他受伤期间，同学们给他许多帮助，让他感受到了班级的温暖。我想，他一定会为了班级的荣誉而继续进步的。”

甘尧同学说：“或许是受了李老师的教育，或许是得到同学们信件的鼓舞，或许是他自己要改过自新，总之这段时间万同同学表现得不错。最近几次单元测验都不曾发现他犯老毛病。我想，他确实变好了，是在以自己的行动来向同学、向老师表明自己的决心。一个人要改正缺点，不光要看他口头上的承诺，更重要的是言行一致。万同同学这点做得很好。所以，我也认为可以再原谅万同同学一次。希望李老师不要经常把他的过错挂在口头，以免他自卑。同学们应该继续给他以关心和帮助，使他不断进步。”

马翔同学说：“万同同学以前还爱乱翻别人的东西，特别爱看别人的日记，现在也改掉了这个坏习惯。这很好，希望他能保持。”……

同学们发言非常积极。他们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万同的进步，也诚恳地指出了他还存在的一些不足。绝大多数同学都希望我再原谅万同一次，不再给他处分——这正是我期待并相信一定会出现的集体舆论。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万同一直红着脸低着头，不是因为惭愧和难堪，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激动——这也是我从一开始便追求的教育效果。那一时刻，我也由衷地感动

和激动，为我的学生，也为我的教育！

最后，我总结道：“本来，我的确是要给万同同学以处分的。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觉得同学们说得很有道理。我决定听从同学们的建议，不再对万同进行处分。同学们在万同再次作弊后真诚地帮助他，他的脚受伤后又给他以无微不至的关心，现在当他有了进步时又向老师求情别给他处分……这一切，说明我们这个集体的确是充满正气和温暖的！相信万同同学会继续进步，以报答集体的关怀。我也相信，每一位同学都会为生活在我们这个集体而感到自豪，并以自己的一言一行维护她的纯洁！”

没有掌声，整个教室一片肃静。我透过学生们一双双庄严凝视着我的眼睛，看到了他们心中正翻腾着集体主义情感的波澜！

语文考试得了 76 分

万同的这次作弊，使我进一步反思我和其他任课教师的教学。

万同作弊当然是可耻的，但细想一下其中也有可以理解甚至可贵的一面，这就是希望得到好成绩的良好愿望。他的错在于达到目的的方式不对，而他的良好愿望，却应该受到尊重。这种愿望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好的上进心。任何学生都希望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功，但由于种种原因，万同从来就没有体验过这种成功感。不及格的分数、老师的斥责、同学的讥笑、家长的斥骂……伴随他度过了这么多年的学习生活，而他还在这样生活着。失败和屈辱，是我们的教育给他的唯一“馈赠”！

——想到这里，我不禁又一次产生了对万同深深的同情。

从上学期我叫他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起，到现在他已抄完了五个作文本。这对抑制他课堂上的好动行为，的确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如果不让他在课内知识的学习上学有所得，以致使他在考试分数上继续是个位数，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在集体中树立起自己的尊严。作为充满民主、科学、个性的社会主义教育，没有任何理由不帮助一位学生树立起人的尊严！

苏霍姆林斯基曾大声呼吁：“让每一位孩子抬起头来！”

……

经过好几天的思考，我向各位任课教师谈了我的想法，大家都赞同我的观点。这样，我们统一了认识，决定尝试“降低要求，增强信心，逐步提高，帮助成功”的教学方法，对万同进行学习“扶贫”。

我又把万同找来，对他提出了学习上的新要求：“我和其他老师都想专门帮助你提高学习成绩。但你的学习基础和班里大多数同学已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我们打算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对你作特殊要求：第一，每次上课，各科老师都会给你提出基本目标，达到这个目标，你就算学懂了。第二，每天的作业，老师们也会单独给你出题，你必须认真完成，不懂的第二天一定要问老师。第三，单元测验和期末考试，我们也将为你单独命题，只要你平时按老师们的要求尽全力去学，就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成绩。”

“那《烈火金刚》我还抄不抄呢？”他认真地问我。

“暂时就别抄了。从现在起，你的学习将有一个新的开端。——你可千万别让老师们失望啊！”

他没有说话，但望着我的眼睛分明闪烁着希望的火花。

这天的语文课，是学《桃花源记》。课前，我对万同的要求是：第一，能够读完全文；第二，会读会写三个以前不认识的字。

课堂上，我一直注意万同的表现，他果然比以前用心。抽读课文时，他第一次举手要求朗读。我很为难，怕他读不好丢丑，便装着没有看见他举手。可他竟然自己站了起来，急切地大声说：“李老师，我的手都举酸了！”

同学们哄堂大笑。我只好说：“好，我们请万同同学读第一自然段。”

“晋太元中……”刚读一句，他的声音就被同学的笑声淹没了。——他把“晋太元中”读成了“普太元中”！

然而，万同竟然不理睬大家的哄笑，径直一字一顿大声地往下读：“……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

也许是被他的勇气所感动或震慑，同学们渐渐不笑了，静静地听他“吼读”。教室里，只有万同那莽直的声音撞击着大家的耳膜，直到“渔、人、甚、异、之”！——说也奇怪，他居然再没有读错一个字！

他涨红着脸坐下了，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下课后，他向我汇报，他认识并会写“晋”、“缘”、“溪”三个字！

我给他布置作业：抄写课文第二自然段。

第一次单元测验时，我单独为他出了一套题，基本上都是平时给他布置的作业。测验前，为他单独辅导，有意偷偷漏些题。

这次单元测验，他得了49分。他高兴得跳了起来——要知道，他以前的分数从来都在20分以下啊！

作文课时，我叫他抄有关课文，要求是“字迹清楚，没有错字”，达到这个标准就得“优”，结果，他大多数时候的作文都是“优”！他自然又兴奋不已。

过了一段时间，我给他提出了稍微高一些的学习要求。比如作文，就要他给我写信，说心里话，只要书写清楚，内容真实就行。

这是他的一次作文——

李老师：您好！

我现在喜欢上语文可（课）了。每天的作业，我都很认真。那天考了49分，我好高兴呀！我要正（争）去（取）下次得55分。但是，英语可（课）和数学可（课）我十（实）在十（是）听不动（懂）。李老师你说怎么办？

学生：万同

英语和数学老师也反映，虽然对万同降低了要求，可他还是学不懂，因为他的基础实在太差了。“他简直好像根本没有读过小学一样！”

我便和他们商定，再降低要求——上英语课和数学课时，让万同抄该节课所学的教材内容。

“期末考试怎么办？”两位老师异口同声地问我。

“仍然可以根据他的抄写来判分。”我说。

这样，每当上英语课和数学课时，万同都有事可做了。……

初一学年结束时，万同的语文考试得了76分！

“纠察员”成了偷盗者

看到万同对学习有了一定信心，我真是高兴极了。进入初二时，我准备与各科老师配合，让他进一步提高学习兴趣。鉴于万同家庭的经济困难，我主动代他提出申请，请求学校免去了他的学杂费。

可开学不久，他又犯了一个把校长气得发抖的错误——

一场大雨之后，学校刚刚改造过的田径场积满了雨水。课间十分钟，万同等人便在田径场追逐打闹，原先平整的跑道被几个顽童的脚丫子烙上了深深浅浅的脚印！

这一切，被楼上办公室里的校长透过玻璃窗看得清清楚楚。校长推开窗子大声呵斥，但玩得正痛快的万同们哪里听得见？依然在田径场上“大闹天宫”。

直到发现校长怒气冲冲地向他们走来时，一群人才如梦初醒，宛若惊弓之鸟，四下逃散。但“不幸”的是，万同在奔逃中脚下一滑摔了一跤，成了校长惟一的“俘虏”！

经过校长的亲自教育之后，一身泥泞、满脸泪痕的万同被带到我的办公室。

我又是一番苦口婆心的开导。然后，我给他出了个改正错误的主意：“由你们几个爱课间打闹的同学，组成一个维护学校文明秩序的‘纠察小分队’——如果发现一些同学在校园内有不文明行为，你们就批评、制止他们，严重的你们就把他送到校长办公室。你就担任这个‘纠察小分队’的队长，好不好？”

万同说：“好是好，可是其他同学能听我们的吗？”

“怎么不会听你们的呢？”我说，“首先你们要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另外，你们去请校长给做一个供‘纠察员’佩戴的标志，这就有了威慑力。”

果然，校长非常支持他们，不但发给他们“纠察员”标志，而且还专门在每一个标志上面盖上校长办公室的大印，并对他们说：“你们这个‘纠察小分队’直接归我管，只要抓到违反校规的就送到我这儿来！”

于是，每天课间，校园里便多了一群神气十足又认真负责的“纠察员”！

万同他们课间十分钟有事可做，自然不会狂打了，相反，他们频频立功——学校不准午休时间踢球，他们中午便把守在操场边；学校规定不许乱扔纸屑，他们便在各层教学楼道巡视；学校规定校园内不能骑车，一放学他们就守在停车棚，看有无违规者……

这样一来，校长办公室“报案”不断，校长有些应接不暇了，便把这支队伍“下放”给学校政教处。

政教处又给万同等人加了一些任务：检查校园卫生保持情况，检查各班桌椅、门窗的损坏情况，并及时督促维修。

这一来，万同们更加神气了！常常是下课铃一响，万同便站了起来，向他的“部下”一挥手：“走！”于是，几个以前的调皮大王便威风凛凛地鱼贯而出——“执行任务”去了！

毕竟是还不成熟的娃娃，盖有校长办公室大印的“纠察员”标志，使万同在维护学校秩序的同时，也渐渐产生了一种盛气凌人的“官味”；他把社会上的霸气用于批评违纪同学，甚至有时还借机恃强凌弱，欺负小同学。

这天下午放学后，万同巡视到初一（2）班的教室外面，他也不顾人家还没放学，就径直走了进去，喝道：“该搞卫生了！”正在讲台上讲事情的班主任老师吃了一惊，教室里坐得整整齐齐的学生也不禁一愣，齐刷刷的眼光一齐射在万同的身上。大概万同有些不好意思，便退了出来，他看见教室门裂了一道口子，竟用手“嘭嘭”地拍打着门，大声训斥道：“门破成这样，怎么也不修一修！”

该班老师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下勃然大怒：“你算什么东西！到这儿来耀武扬威！滚！”

万同只好悻悻而去。路过另一个班的时候，看见两个搞卫生的初一小同学正拿着扫把在打闹，他冲过去就踢了他们几脚，还煞有介事地吼道：“扫把是用来打闹的嗦？”

万同们直接听命于政教处，所以我对这些恶劣行径，很长时间不知道，直到后来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我才意识到作为“纠察员”的万同已经变味——

万同在初一（2）班碰壁后，一直耿耿于怀。

第二天恰好是星期六，学校没有上课，他一人溜进学校，直奔初一年级办公室。他四下看了看没人，便一脚把门踢开，进去以后，在初一（2）班班主任老师的办公桌抽屉里乱翻，把几本书撕碎了，把墨水瓶砸碎了……最后，拿上一支圆珠笔、两瓶没吃完的咖啡和三袋土豆片，扬长而去！

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但他吃完土豆片后扔在我班教室纸篓里的包装袋，却使他星期一——来到学校，便被政教处作为“重大嫌疑人”而请到了校长办公室。经过一番不太艰难的“审问”，万同便“供认不讳”了！

几天后，一张校告贴了出来：“为严肃校纪，现决定对万同予以严重警告处分。”

——一时间，万同“名扬”全校。

我和全班同学的心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集体目光的关注下

作为学生，没有比较纪处分更为严厉的心灵惩罚了。

在处分万同前，我去找过校领导，请求最好不要给万同处分：“比起过去，他已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当然也有反复，但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我担心，这一张处分校告会让他在全校无地自容，甚至摧毁他的上进心。”

校领导的话也不无道理：“他已不是第一次违反学校纪律了，再说，处分他一个人，可以教育全校所有学生。”

我只好服从。万同也只好当一回被“杀”的“鸡”给全校的“猴”们看。

那几天，我没有找万同谈心，因为我心里也很难受，脑子里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教育思路。但是，看到失魂落魄的万同，我就一遍遍地问自己：难道一年多来所有的努力，就这么付诸东流了吗？

我似乎有些黔驴技穷了……

然而，我仍苦苦思索着——

由万同的这第二次纪律处分，我自然想到了他的第一次处分。那次是因为测验作弊，后来他又作过一次弊，我并没有再给他处分，他至今也没有再作弊。为什么？是因为有全班同学的关心与帮助。而这次他任“纠察员”期间所犯的一些错误，恰恰是脱离了集体舆论的监督！

想到这里，我心里豁然一亮——要让万同重新树立向上的勇气和信心，还是只能依靠班集体的力量。

当天下午，我把垂头丧气的万同请到办公室，照例让他坐下。

“我知道你很难受，但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不过，”我话题一转，“如果你想改变这一切，还是只有靠你自己！”

他慢慢抬起了头，有些疑惑地望着我。

我继续说：“是的，只有靠你自己！靠你的什么呢？那就是你的上进心。当然，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这种上进心？”

他小声吐出一个字：“有。”

“这就好。当然，我们班集体也会帮助你的。”我对他解释说，“现在，除了袁夏继续做你的‘帮助人’，每天给你写‘家校联系本’以外，我打算请全班同学都关心你的进步。你愿不愿意啊？”

他仍然小声说：“愿意。”

又是一节语文课开始了。我对全班同学宣布道：“虽然还有两个月才半期考试，但我今天就公布语文半期考试的作文题。”

同学们感到非常惊讶，不由得小声议论起来。

我接着说：“一道是《我为万同的进步而高兴》，一道是《我为万同的退步而痛心》。同学们从现在起开始观察万同的表现，两个月后半期考试时，同学们便根据自己的观察情况，选其中一道题来写。”

下课以后，万同找到我：“李老师，半期考试时我写什么作文呢？”

我还真把他给忘了！我稍稍想了一下，说：“到时候，你就写《我感谢同学们对我的帮助》。”

通过提前公布半期考试作文题，我试图一箭双雕：既把万同置于全班的监督之下，又让每一位同学有意识地关注万同的表现。就这样，小小的作文题，将万同个人的上进心激励与全班学生的集体主义自我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我又想，最好避免万同只是被动地接受同学们的监督，而应让他主动地在参与班级建设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进步。于是，我特意为万同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职务：专门维护自习课纪律的“特别班委”。

果然，我所期待的教育效果神奇地出现了——

半期考试的作文中，全班绝大多数同学选写的题目是《我为万同的进步而高兴》。他们以亲眼见到的真实事例，饱含真情地描述着万同的进步。讲评试卷时，我选了几篇有代表性的作文，让作者在班上朗读。其中，万同的“帮助人”袁夏同学的作文最有代表性——

我为万同的进步而高兴

过去，只要一提起我班的万同呀，同学们都会摇头：“唉，他真是‘差生’！”

的确，同学们也许还记得——初一的时候，课堂上怪叫的，有万同；课间狂打的，有万同；欺负同学的，有万同；考试作弊，也有万同……更令人气愤的是，这学期刚一开学，万同就多次违反校规，最后因到老师办公室偷东西，而被学校处分。

我们的班集体，也因为他而蒙受了耻辱。

但是，就像以前万同每次犯了错误一样，老师和同学并没有看不起万同，更没有放弃对他的鼓励；万同同学也没有自报（暴）自弃，而是在班集体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地在进步：在课堂上，万同不但很少违反纪律，而且还开始主动争取发言了；原来很少交作业的他，现在基本上能交作业了；万同过去一直都很热爱劳动，现在他比过去更积极地打扫教室卫生……

最令我感到惊喜的是，万同非常认真负责地管理自习课纪律。每次到了自习课的时候，万同便拿着书本站在讲台上，一边学习，一边维护我班的自习课纪律。只要有谁在下边说话或者不认真学习，万同就会走到那位同学跟前批评他。由于万同的认真负责，我班的自习课纪律还获得了“纪律流动红旗”。我们的班集体因为万同同学而赢得了荣誉。

作为万同的“帮助人”，我真为万同的进步而高兴。不过，以前万同也有过进步，却没能坚持多久，所以，我真心希望万同这次的进步能长久地保持下去。

袁夏朗读完她的这篇作文后，同学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我又请万同走上讲台朗读他的考试作文——

我感谢同学们对我的帮助

李老师和同学们：

我不正（争）气，多次反（犯）错误，被校长处分，是应该的，是我自己造成的。李老师和同学们没有气（歧）死（视）我，而是热情地帮助我。我很感动，我很感谢。袁夏同学天天提醒我不要（上课）说话，帅伟华同学今（经）常给我讲（我）不动（懂）的作业，还有好多好多同学都帮助过我，我也说不完。我要好好学习，更加进步。

谢谢李老师和同学们！

万同的作文在文字表达上显然远远不及袁夏的作文，却赢得了同学们更热烈的掌声！

我统计了一下，全班除万同外的62位学生中，写《我为万同的进步而高兴》的有48人，写《我为万同的退步而痛心》的有14人。

下午放学的时候，我把万同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你把这些作文全都拿回去，念给你妈妈听，让你妈妈也分享一下你进步的快乐。另外，这十几本写你‘退步’的作文，你也要好好看看，同学们如果说得对，你应提醒自己进一步改正。”

几天后，万同把作文抱来还我的时候，给我一封他妈妈写的信——

李老师：

我这里非常地谢谢你和全班同学对万同的关心和爱护。万同今天能德（得）到这样的对待，这全靠李老师来（耐）心的教育，这是李老师的攻（功）劳，也是同学们的攻（功）劳。李老师，你心（辛）苦了。你为了同娃儿你操岁（碎）了心。李老师，自从同娃儿刚一塌（踏）进中学，一分到你班上，是你老师对他的教育是很大的。我在（再）说一声李老师你心（辛）苦了，谢谢你李老师。

万同的妈 田翠芬

不久，万同对我说：“李老师，反正我每天早晨来得最早，您就把教室早扫除的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每天都把教室卫生搞得干干净净！”

国旗下的讲演者

半期考试过后，我考虑到万同容易反复的特点，又想出了一个新的舆论监督措施，即采用“报喜单”的办法来不断激励他巩固自己的进步，并取得新的进步。具体做法是：每周周末班会课时，我都请全班同学对万同进行评议，如果大多数同学都认为万同这一周表现不错，我就给他写一张“报喜单”，让他带回去给妈妈看。

这样，每天有“帮助人”，每周有“报喜单”，就使万同随时都处于班集体的关注之中。在下半期，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能得到一张“报喜单”。

一天早晨，我来到学校，副校长专门找到我说：“你班的万同……”话刚开个头，他就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看样子，副校长感冒了。

一听副校长说“万同”，我的头就“嗡”地炸了，我连忙急切地问：“万

同又犯什么错误了？”

“你别急嘛，我话都还没说完呢！”副校长舒了一口气，笑了起来，“你班的万同应该好好表扬表扬！”

“表扬？”

“对。”副校长继续说道，“刚才早读课前，我在校门口值周，看到花园旁边垃圾筒附近有一个破饮料瓶子。当时过往的学生很多，我就想，我倒要暗中观察一下，看有没有学生能够自觉地把这个饮料瓶子捡起来扔到垃圾筒里去。结果，不少学生——包括一些经常得表扬的优秀学生——路过时都视而不见，有的甚至还有意无意地踢一下。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万同端着装满垃圾的撮箕走过来了，他看了看那个饮料瓶子，并没有停下，仍往前走，但是，当他把满满一撮箕垃圾倒进垃圾筒后，又专门过去把那个饮料瓶子捡起来，丢进了垃圾筒。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他做得非常自然。当时他并没有看见我。我非常感动，一个挨了处分的‘差生’，竟然有这样良好的习惯！不简单啊，不简单！你一定要在班上好好表扬他！”

副校长的话，真的让我也非常感动——不仅仅是因为万同拾了一个饮料瓶子，更因为他是没人监督的情况下做了一件许多人未必能做到的小事！

语文课时，我挤出几分钟的时间转述了副校长的话。我有意用“我班的一位同学”代替了万同的名字，然后，请同学们猜一猜：这位为班集体赢得荣誉的同学是谁？

“当然是万同啦！”学生们竟这么容易就猜出来了！

我也反应过来了：因为早晨我班只有万同搞教室卫生。

这次，我并没有要求学生们写什么表扬万同的作文，但是，在第二周交来的周记里面，学生们都不约而同地对万同这件事发表了评论。

袁夏写道：“万同在捡那个瓶子的时候，一定没想过得表扬，可能他只是觉得干净的校园不应该有这么一个乱扔的瓶子。看起来事情很小，却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比如我，可能就做不到。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我和万同之间的差距。作为万同的‘帮助人’，这次是万同帮助了我，以后遇到这样的小事我一定会去做。不光这样的小事应该做到，许多不起眼的小事都应该做到。李老师不是常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吗？不是为了得表扬，而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程实写道：“对比万同，我很羞愧。在这里我向李老师承认两个错误：也是在上一周，我在校内骑过一次车，虽然没有被值周校长发现，但也违反了学校规定；另外，那天早晨我进校后，也路过了那个地方并看到了那个瓶子，但我并没有捡它，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应该去捡。如果在平时，要问我和万同谁是好学生？我想班上大多数同学可能都会说：‘当然是程实啦！’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比万同好得多，也从来没有违反过课堂纪律，初一时我还担任过班长。但是，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不如万同。我和万同仿佛是在进行道德赛跑，原来我跑在前面，可是摔倒了；而万同不但追了上来，而且正在向前冲刺。我要爬起来，奋力追赶万同。我相信，我一定会追上并超过他的！”

马翔写道：“一个人的品质到底是高尚还是低下，如果仅仅用学习分数去衡量，那就太片面了。我班有这样一位同学，成绩并不太好，虽然有了一些提高，但名次仍然在班上倒数第一。有些人便因此联想到其品质，觉得他一定不怎么样，尤其是这位同学过去曾犯过不少错误，有人就更断定他简直是一个坏学生。但是，恰恰是这位同学做了一件极小极小的好事，却为我班赢得了荣誉！这件事小得似乎不值一提，但那么多人没做到，惟有这位成绩不怎么好的同学做到了。真是难能可贵，也发人深思！这位同学的名字是：

万同！‘万同，好样的！’——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咱初二（5）班全体同学对他的真诚敬意！我们每个同学今后都应该在学习上再帮他一把，让万同的学习成绩有更大的提高。”

……

周记讲评课上，我通过读一篇篇感情真挚的文章，让万同也来对班集体进行一次教育——这些周记在表扬万同的同时，也撞击着全班学生的灵魂……

再过一周，就该我班派代表在学校升旗仪式上进行“国旗下的讲演”了。在众多主动争取讲演的同学中，大家一致推选了万同。

这当然是一种荣誉，但对万同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讲演稿要自己写，对他来说实在太困难了；而平时他在班里的讲台上，说话都不太流畅，现在要当着全校一千七百多名师生讲话，他能行吗？

但我和同学们决意要让万同成功——这也将是我们班集体的教育的成功。于是，我和同学们就写讲演稿一事给万同出谋划策和辅导修改。万同认真地连写了三稿，毕竟他语文基础太差，还达不到要求。我抓住他原稿中“班级的爱就是祖国的爱”这一句闪光的话，结合文中的素材，重新给他写了一篇讲演稿。然后，我们又特意利用一节自习课，对万同进行讲演训练。那几天下午放学后，万同都在我办公室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

这是一个霞光满天的清晨。学校操场上，全校师生凝望着映着朝阳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唱起了庄严的国歌。之后，身着新装，戴着红领巾的万同神情庄重地站在国旗下，开始了他的讲演——

老师们，同学们：

我叫万同，今天，我站在五星国旗下，代表初二（5）班作国旗下的讲演。我讲演的题目是《班级的爱就是祖国的爱》。

老师常常对我们说，爱国不是一句空话，爱国应该从爱周围的人做起，包括爱自己的同学、老师和班级。对此，我很有体会。我刚进初中时，很不热爱班集体，犯了很多错误，多次违反学校纪律，学习成绩也很不好，给我们初二（5）班抹了黑。那时候，老师和同学们一提起我万同的名字就头疼，都为我的表现感到痛心和气愤。但是，他们没有看不起我，反而耐心地帮助我，热情地关心我。有一次，我被社会上的小流氓打了，在家养伤。班上每一位同学都给我写了一封短信，安慰我，鼓励我。当来看我的李老师把同学们的信交给我时，我很激动，心里想：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进步，不再给班上丢脸。后来，我回到了班上，许多同学还为我补习功课。现在，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我有了很大很大的进步，老师经常表扬我，同学们还选我为“进步最大的同学”。但我要说，这是因为我在初二（5）班这个温暖的大家庭。老师给了我爱，同学给了我爱，班级给了我爱——对我来说，这一切，就是祖国给我的爱！

我还有许多缺点，但我会继续努力改正；我要争取让初二（5）班因为有了我万同而更加温暖，更加美好。我决心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成为我们学校最优秀的学生，成为祖国母亲最优秀的儿子！

万同响亮的声音从他心灵深处迸发出来，通过扩音器回荡在校园上空，在晨风中传得很远很远，直至融入那辽阔纯净的蓝天！

烛光里的泪花

上午最后一节政治课刚开始不久，我便在办公室听见了赵老师那近乎咆哮的呵斥：“这节课没法上了！你们究竟要干什么？！……”我不禁诧异：赵老师一向对学生温柔，今天怎么会这样？

我正要去教室看看，万同垂头丧气地来到办公室：“李老师，赵老师把我撵出来了……”

我压抑着怒气问：“怎么回事儿？”

“同学们听说您不当我们的班主任了，心情特别烦躁，都没心思上课……”

“简直是胡来！”我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你们真是在给我丢——”我没能把“脸”字说出来，因为我看见了万同的双眼已噙满了泪水！……

下午上课前，赵老师找到我，歉然地说：“看来我上午不应该对学生发那么大的火。当时，我走进教室只觉得班上气氛不对，课堂上总不安静。我批评了几句，有的学生——比如万同——居然与我顶撞起来，还扬言‘要罢课抗议’！气得我发抖。但是，刚才万同主动给我交来一份检查，看了以后我觉得，当时如果理解了学生的心情，我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开导他们。”

万同的“检查”是这样写的——

赵老师，同学们上午没好好上课，我们错了。我定（顶）嘴，更是对您的不礼貌。

我向您说一声“对不起”！但是，这几天同学们的心里真的很难爱（受）啊！大家都希望李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都不满意（意）学校（的安排）。想用这种方法来刘（留）住我们的李老师。我们也知道这种方法是于（愚）蠢（蠢）的，可我们没法空（控）制自己啊！赵老师，您体（替）我们求求学校领导吧，不要换走李老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担任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学校为减轻我的工作负担而减去我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我是能够理解并深深地感谢领导的关怀的。但读了这段与其说是“检查”不如说是“请求”的文字，我被学生纯真的情感打动了！

放学前，我来到班上，迎接我的是一片辉煌的烛光和烛光中点点晶莹的泪花！我伫立讲台许久许久，一句话都说不出，眼前闪现出一幅又一幅过去的画面：秋天，我和学生们一起欢度他们进中学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冬天，我和学生们顶着凛冽的寒风驰骋在足球场上；春天，我和学生们冒着细雨在野外菜花地的泥泞小路上追逐；夏天，我和学生们在公园草坪上摔跤、斗鸡……

63位学生默默地注视着我，也和我一起沉默着，沉默着，任感情的潮水在胸中激荡澎湃，又化作冲决眼眶的泪水无声地流着，流着……窗外，北风呼呼，寒流滚滚；室内，寸寸洁白的蜡烛也在无声地流泪，它那金黄色的烛光却温暖着每一个人纯真的心灵！

“……同学们的心情，我理解……”我终于吃力地说话了，“但大家的做法，实在是不应该啊！”

学生们终于忍不住了，无声的流泪变成了伏案啜泣。呜咽之声在教室里回荡，也撞击着我的感情的堤坝：童心可鉴，泪眼作证——有了一批又一批心心相印的学生，我便成了情感富翁和精神巨人。作为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还有比自己人格的丰碑铸在学生心目中更崇高的荣誉吗？

“我永远记住……同学们对我的感情！”说完这句话，我迅速转身走出了教室……

因为，我已泪如泉涌！

爱心与教育

激励“优生”在日常一点一滴的小事中战胜自我：让他们在一次次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的过程中体验到“人生的乐趣与辉煌正是从战胜自我到超越自我”。

手记三：锻造卓越人格 ——“优秀学生”的培养

对“优生”培养的思考

“优生”当然应该是指品学兼优的学生，但在不少教师、家长的眼中，所谓“优生”更多的是指学习成绩拔尖的学生（也被称为“尖子生”）。因此，这里有必要对“优生”作个大致的界定——我这里所说的“优生”，是指品德、学习和各方面能力都优于同龄人的学生。

培养“优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素质教育”并非是“一刀切”的教育，而是既面向全体学生，又针对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点的教育。尽可能挖掘并发展每一个学生的潜力，让尽可能多的学生在各方面都获得理想的发展，成为教育者所期望的“优生”，最终成为对民族对国家有用的高素质人才，应该说这也是“素质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优生”的感情几乎是不需要培养的，因为教师对“优生”的爱几乎是天生的——比如在学校组建新班时，几乎每个教师都希望自己班上的“优生”多一些。但我们对“优生”的认识却未必正确、全面。

当我们从“新生报名册”上与“优生”初次“见面”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他们能成为“优生”，是学生家长和小学老师共同教育的结果。现在进入初中，要成为“优生”，同样需要从零开始的教育。尤其要看到这些“优生”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们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学习成绩以及各种能力比一般学生相对（注意：只是相对）要好一些；另一方面，他们除了仍然存在着一般学生在这个年龄容易出现的毛病外，也存在着他们作为老师的“好学生”、家长的“好孩子”所特有的一些毛病。

具体说来，“优生”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 思想比较纯正，行为举止较文明，自我控制的能力比较强，一般没有重大的违纪现象。

2. 求知欲较旺盛，知识接受能力也较强，学习态度较端正，学习方法较科学，成绩较好。

3. 长期担任学生干部，演说能力、组织能力以及其它工作能力都较强，在同学中容易形成威信。

4. 课外涉猎比较广泛，爱好全面，知识面较广。

5. 由于智力状况比较好，课内学习较为轻松，因而容易自满，不求上进。

6. 长期处于学生尖子的位置，比较自傲自负，容易产生虚荣心。

7. 在畸形的“升学率”压力下，有的“优生”之间容易产生互相嫉妒、钩心斗角的狭隘情绪和学习上的不正当竞争。

8. 从小就处在受表扬、获荣誉、被羡慕的顺境之中，因而对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远不及一般普通学生。

以上几点，只是就一般“优生”的共性而言，当然不一定每一个“优生”

都是如此。根据我的教育实践，多数“优生”基本如此，只是有的侧重于某些方面，有的偏重于另外的特点而已。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一些教育者只注重“优生”的学习分数，“一好遮百丑”，把他们的优点有意无意地夸大；而把他们所独有的思想、行为缺陷忽视了。

我仅举一个关于三好生的事例，可能会让读者的心灵受到震动。

几年前，某直辖市有关部门对该市16名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进行了一次特殊考试——“特殊”之处在于这次考试有些设计是隐性的。在考室门口放有一把倒置的扫帚，进教室时，16名学生无一人弯腰把扫帚扶起来；考试前需要削铅笔，削完铅笔后主动把铅笔屑打扫干净的仅有三人！考试完毕，主持人对学生说：“今天的考试结束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你们都未通过今天的考试，因为你们在考试过程中的言行已经给自己的文明习惯打了个不及格的分数！”

是的，上面这个例子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正因为是小事，才说明其普遍性，更何况，这些应试者都是中小學生中的佼佼者啊！

至于近几年来，不少因承受不了各种“打击”而自杀的中学生，其中绝大多数是我们教育者眼中的“优生”，这也早就不是“新闻”了。

——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

当我们第一次走进教室，面对众多“优生”而深感“幸运”时，切不可认为“优生”教育只是“维持”教育，而应该明确意识到：“优生”教育的艰巨性、复杂性，绝不亚于对其他学生的教育。

根据我的体会，在培养“优生”的问题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引导“优生”树立志向。

一般说来，“优生”智商较高，即使不那么刻苦，他们的学习也会在班上名列前茅，高中毕业也能考上大学。这就往往使一些“优生”不求上进。当然，从“应试教育”的角度看，这类学生固然是“上线生”；但如果仅以考上大学为目标，那么我们国家不过是又多了一名大学生而已。因此，要让这些学生真正发挥出自己的潜力，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教育应从引导他们树立理想，明确志向，真正做到“志存高远”抓起。要让“优生”意识到，成绩比别人好，就意味着将来比别人多一份责任，从现在起就应比别人多一份努力。引导学生立志，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给他们推荐伟人、名人的传记读物，让“优生”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空间和时代背景中认识自己的使命。

第二，帮助“优生”认识自己。

一般说来，“优生”有较强的自信心，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应该予以保护和发展。但同时，有些“优生”对自己的不足往往认识不够，对自己的人格修养、知识框架、能力结构等综合素质缺乏科学的分析与评价，还有些“优生”对自己某些方面的发展潜力认识不足……如此等等，都妨碍着他们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妨碍着他们发展自己应有的才华，最终阻碍他们成长为教育者所期待的高素质人才。所以，我们应该帮助“优生”超越具体的考试分数和名次，通过与其他杰出的少年英才比较，通过对自己求学过程中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的冷静分析，通过各种具体的课内外实践活动，正确全面地认识自己，进而有针对性地发展自己。

第三，教育“优生”保持童心。

少年儿童，就其天性来讲，具有纯朴善良的本质。“优生”经过老师和家长的精心教育，他们的思想品德一般还是比较好的。因此，我们对“优生”的所谓“思想品德教育”，固然包括随着他们年龄增长而注入一些新的思想品德养料，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教育他们保持自己的一颗纯洁童心。以下情况应该说不是个别现象：一些“优生”随着荣誉的增多，虚荣、自私、骄傲自大、心胸狭隘等等心灵的毒瘤也开始滋长；由于他们在同学中往往有较高的威信，因而这些毛病产生的消极影响也较大。怎样使他们保持一颗童心呢？让他们通过与班上的同学平等相处，感受同学们身上值得自己学习的优良品德，让他们在为同学服务的过程中体验一种奉献的幸福，让他们面对分数和荣誉学会淡然处之互相谦让，以培养自己豁达而淡泊的心境。适当淡化这类学生的“优生”意识，帮助他们去掉自我陶醉的“光环”，恢复他们作为普通同学的感觉，是使他们保持一颗纯朴童心的有效方式之一。

第四，激励“优生”超越自我。

我常常对“优生”说：“本来可以得100分，却只得了99分；本来可以考上名牌大学，却只考上了普通院校；本来可以成就一番辉煌的事业，却只是找到了一个谋生的饭碗……造成这种种遗憾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重要的原因则是本人不具有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勇气、毅力和能力。在未来人生的道路上，千万不要自己埋没了自己！”如果我们对所有学生都这样说，显然不妥，因为我们的社会既需要像陈章良那样的杰出科学家，也需要像李素丽那样的普通劳动者。但是，对少数具有出类拔萃潜质的“优生”，我们则应理直气壮地向他们提出“追求卓越”的希望。激励“优生”超越自我的要点，一是尽可能多地让他们在各个方面实践，以发现并发展自己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潜质；二是鼓励他们在日常一点一滴的小事中战胜自我；甚至教育者可以有意识设置一些难题去“折磨”他们，让他们在一次次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的过程中，体验到“人生的乐趣与辉煌正是从战胜自我到超越自我”。

第五，训练“优生”受挫心理。

长期处在“金字塔尖”的“优生”们，很少品尝失败和被冷落的滋味，这就使他们对受挫的心理承受力相对较弱，一旦遇到各种“打击”，往往情绪低落、悲观失望，个别学生甚至对前途失去信心。因此，优化“优生”的心理素质特别是受挫的心理承受力，是“优生”培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训练并强化“优生”的受挫心理，首先不可将“优生”在班上特殊化，而应与其他学生一视同仁。“优生”平时就和一般同学一样，也就避免了某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失落感”；其次，“优生”担任学生干部不宜搞“终身制”，而应合理轮换，使“优生”适应“能上能下”的机制；另外，对“优生”犯错误切不可迁就，而应该严肃批评，让他们习惯于挨批评，包括严厉的批评甚至处分；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要多给“优生”创设一些品尝失败的机会——这当然不是说要有意让“优生”不断失败，而是引导“优生”尽可能多地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摸索、尝试，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有失利，而当“优生”对此习以为常的时候，他们就学会了坦然面对人生路上的失败、挫折和各种意想不到的打击。

第六，培养“优生”创造能力。

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般来说，“优生”的学习成绩是拔尖的，但在“应试教育”的束缚下，“高分低能”的现象却不是个别的。未来社会对人才的能力特别是创造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决不能

满足于“优生”名列前茅的考试分数，而应有意识地培养其创造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首先是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要教育“优生”敢于“让思想冲破牢笼”——即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大前提下，培养学生追求科学、崇尚真理的理性精神，让学生大胆地冲破迷信权威的思想牢笼，冲破盲从书本的思想牢笼，冲破膜拜师长的思想牢笼，冲破固执己见的思想牢笼。总之，让他们养成善于质疑、勇于否定、独立思考、积极创新的治学方法和人生态度。从解题时的独特方法到作文时的新颖构思，从独当一面地开展班干部工作到积极参与各类课余科技活动……只要学生具备了创造性思维的习惯，其创造能力锻炼的机会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

程桦：让思想飞翔

1985年春天，我班上转学来了一个男生，名叫程桦。

也许是刚到一个新的环境还不太适应，程桦给我和同学们的印象是不太爱说话，性格似乎有些内向，但他的学习却十分优秀。他交来的第一次作业《翻译 愚公移山》就让我刮目相看：且不说那准确生动的文笔让人不相信这是出自一位初一学生之手，单是看那印刷体一般美观的书写就使人赏心悦目！

“那位新同学写的字就像钢笔字帖一样！”班上的同学议论纷纷。

随着时间的推移，程桦各方面的才能逐渐显露了出来：绘画、书法、作文、朗诵、表演……其中最让人羡慕的，是他拉得一手漂亮的小提琴。

现在的中小学生，擅长一两样乐器，当然不算什么稀罕。但在80年代中期，像程桦这样有“艺术特长”的学生的确少见。不但本班同学十分敬佩他，甚至在外班，程桦都颇有些“知名度”。

其实，程桦的家庭是很普通的：父母都是长期在边远山区工作的中学教师，程桦随父母长期生活在那里。后来，他父母深感当地的教育不能满足程桦的成长需求，于是依靠程桦姑姑在我校工作的关系，便把他转到了这所省重点中学。

于是，12岁的程桦便开始了自己半独立的生活。平时他寄住于姑姑在学校分的一间简陋的小木板房，日常生活当然有姑姑照顾；但有时姑姑要回自己的家——乐山师专，这样程桦就得自己照顾自己。

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每天傍晚，在学校那间小木房里，总是准时飘出悠扬的小提琴声——那是程桦在练琴。

我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位学生的喜爱，这种喜爱并非宠爱，而是一种精心雕琢的欲望。这种欲望使我细心观察并认真分析了程桦的优势和不足：他天赋较高，反应很敏捷，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很强；比起同龄人，他有着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而且他身上保持着十分纯朴的本色，没有一般优秀学生的矜持和傲气。但是，他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可能是由于长期生活在边远落后的地区，他的思维不够开阔，知识面相对较窄，比起他扎实的知识基础，他的能力特别是创造能力明显较弱。显然，仅就学习成绩特别是分数而言，程桦当然是一个“尖子生”，然而作为未来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程桦无疑具备成长为高素质人才的潜质。作为他的老师，我应该让他今后的发展出类拔萃。我也有这个信心。

我从谈心入手。在学校操场的环形跑道上，我常常和他一圈又一圈地散步。我们交谈的内容十分广泛：学习、生活、我的学生时代甚至童年趣事、他的志趣和理想，也包括当时国内外的热门话题，比如中曾根访华、“挑战者”号失事、夏时制的利弊、步鑫生的沉浮……在这一次次平等愉悦的谈心过程中，我不知不觉走进了他的心灵，他也由衷地把我当做最尊敬也最信赖的师长。

我并没有直接向他大谈“志向”、“能力”、“责任感”之类的字眼，我是努力通过我们之间的心灵交流，把他的视野引向广阔的空间。

除了谈心，我还给他推荐书籍。程桦特别爱看书。几年间，他陆续从我的书架上借走了《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周恩来传略》、《徐悲鸿一生》、

《历史在这里沉思》、《傅雷家书》、《超越自我》、《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次浪潮》……

渐渐地，他对集体活动和班级事务热心起来，并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他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我班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 50 周年而举办的“思想节”上。程桦扮演马克思，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你们好！”

虽然是模拟讲演，但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再加上他的表演才能，因此一出场便吸引了同学们。

“马克思”谈到了对中国的敬仰：“我终于来到了中国，这是我一百多年前就向往、关注的东方文明古国。”谈到马克思少年时代的立志：“17 岁时，我曾在一篇作文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被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恨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接着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丰富发展了我的学说，在中国这块多灾多难而又充满光荣的土地上建立了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政权。而在最近几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为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更蓬勃的生机！”最后，“马克思”以一段气势磅礴的话结束了演说：“当然，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路上，也许还会有曲折和困难，但不管怎样，我仍然坚信：共产主义革命必将胜利。在这场革命中，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也许从讲演技巧的角度看，这段演说还略显幼稚和生硬，但如果我们知道程桦此刻还只是个 13 岁的初二学生，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了。作为他的班主任，我更赞赏他在准备时的认真态度：仅仅为了这段不太长的演说，他硬是半懂不懂地读了好几遍《共产党宣言》和《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无疑，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程桦所得到的能力锻炼和思想提高是相当大的。

又一届班委改选了。我鼓励程桦竞争班长。结果在四位竞选者中，程桦当选班长。

为了进一步锻炼他的能力，同时也为了调动全班同学参与班级建设的积极性，我决定在班上搞一次“做班级主人”的主题班会，让程桦发表“就职演说”，并主持“模拟记者招待会”。

班会之前，我对他进行了一些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的指导，特别告诫他不要紧张，面对各种问题，怎么想就怎么答。实在回答不出也不要紧，说声“很抱歉，请允许我以后回答你”就行了。反正都是自己的同学。

于是，这次班会就以程桦别开生面的“就职演说”拉开了序幕——

“我既然自荐当班长，就一定能尽力当好。请同学们相信我，并拥护我！”在程桦自信地作完“就职演说”之后，他紧接着宣布道：“现在，由我主持‘记者招待会’，在座的同学都是‘记者’。欢迎大家就班级事务广泛提问，我将尽力答复。”

第一个“记者”问道：“我是《未来日报》的记者。首先祝贺你就任班长。请问，你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程桦答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既不是督促大家学习，也不是批评不守纪律的同学，而是设法发挥全班每位同学关心集体的积极性。比如，我准

备在班上搞一次评选‘全班之最’的活动：选‘最真诚的同学’、‘最热情的同学’、‘劳动最踏实的同学’、‘做值日最负责的同学’等等。通过评选，让每位同学发现自己的长处，激发同学们关心班集体的热情。”

一位女同学问：“你对同学们有什么希望吗？”

程桦答：“希望同学们多给我提意见和建议！”

同学们的掌声刚落，一位男同学站了起来：“对你自荐当班长的精神，我极为钦佩。请问：将来你有没有胆量自荐当国家主席？”

程桦显然对这个问题没有思想准备，但他略加思考，便朗声回答：“我有这个胆量！不过，仅有胆量是不行的。照我现在的样子，若当上国家主席，一定会把国家搞糟。”同学们发出一阵笑声。“但是，只要以后我的思想、知识、能力达到了国家主席的水平，而又有这么一个机会，我想我一定敢自荐当国家主席！”

又一个同学发问了：“请问，你的家长支持你自荐当班长吗？”

“我的父母不在乐山市，”程桦回答，“但我相信他们知道此事后一定会支持我的。因为我爸爸、妈妈一向教育我不仅要勤奋学习，而且要关心集体，培养能力。”

教室里又响起了一阵掌声。

“记者招待会”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同学们的提问越来越多，程桦也越来越从容自如。教室里不断响起朗朗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在半小时之内，三十多位同学提出了四十多个问题。下课铃响了，我想给程桦出个难题，试试他的应变能力：

“作为你的班主任，请允许我也问一个问题，你自荐当班长，有没有名利思想？请说实话。”

十几秒钟的沉默之后，程桦从容回答：“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不存在任何名利思想的，因为我只想为大家服务。但是，既然是为集体服务，我就应通过自己的工作‘争’集体之名，‘图’集体之利。——这就是我的‘名利思想’。”

“哗！……”程桦的妙语激起了空前热烈的掌声。

日本市川市市长高桥国雄一行将到乐山一中参观访问的消息，使学校开始了紧张的迎宾准备工作。我却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找到程桦和几个同学：“你们能不能在高桥国雄来访时，主动采访采访他？一来可以锻炼一下自己，二来能让日本人看看我们中国中学生的形象。”

程桦等同学当即答应，还兴奋得跳了起来。

到了采访那天，小“记者”们友好而勇敢地向高桥市长频频发问：“请问高桥先生，对我们学校印象如何？”“请问，贵国中学开了哪些课程？”

“贵国中学生最感兴趣的是什么？”“请问，贵国是怎样对中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高桥先生看来对孩子们的采访很感兴趣，从容而风趣地回答着各种提问。

规定时间到了。程桦鼓起勇气提了一个事先对“上级审查”隐瞒了的问题：“请问高桥先生，贵国是怎样对你们的中学生讲日本侵华战争的？”

高桥国雄稍稍顿了一下，随即坦率地答道：“我们一般还没对中学生讲这些。不过，我们总是教育我们的青少年学生要热爱世界和平、维护日中友谊。”市长还笑吟吟地拍了拍程桦的肩膀，显然不认为这是一个“不友好”

甚至“影响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提问。

程桦又向高桥国雄提出：“请市长先生回国后代中国中学生向贵国政府建议，教育日本青少年全面地正确认识历史，珍视中日友好关系。”

应该说，程桦的采访是相当成功的。

临近初三毕业之际，程桦代表学校参加了乐山市中学生现场作文比赛。

这次作文比赛的题目是临场抽签决定的。初中的题目有三个：《笑后的思索》、《生活中美丽的一瞬》和《从夏时制说起》。程桦抽中了《从夏时制说起》，题目要求写议论文，重在“说起”，即展开联想，通过发散性思维发表议论。这对初中学生来说是比较困难的。程桦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调动自己的思想积累和表达能力，写了一篇令评卷老师拍案叫好的佳作。

文章以驳论的方式一开始就展示出对“夏时制”持不同意见者的种种言论（“现在简直什么都跟外国学！”“中国有中国的时间，外国有外国的时间，为什么连时间都要跟着别人学？”），接着对这些概念不清、观点糊涂的言论进行分析论辩：

“诚然，这‘夏时制’确实为‘外国引进’，但这时间怎么分‘中国的’‘外国的’？正如天上的月亮，中国境内人说是中国的，外国境内的人又说是他们的。然而不管怎样，那天上却只有这么一轮月亮。时间也如此，不管怎么争，时间，却也是地球上的时间，大家都在过的时间，从何谈起‘中国的’‘外国的’？”

接下来，程桦紧扣“引进”二字大做文章：

“中国和外国，都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天底下。为了生活得更好，各自想了些好主意。有时中国有的，外国没有；有时外国有的，中国没有。如指南针、火药，外国不是稳稳当地学去了吗？那么，外国好的，我们为什么又不能学呢？”

文章进而剖析这种盲目排外的历史根源：这是一种自鸦片战争以后因中国人吃够了外国人的亏而引起的变态心理的反映：

“从什么时候开始由这种怕‘外国的’而产生盲目排外的思想？大概是从那‘鸦片战争’开始的吧！外国人说的是让我们享受‘西方文明’，却让我们享受了鸦片、炮火、军队的滋味。大概从那时起，我们民族有个普遍心理现象：啊呀呀，不得了，那是外国的！‘外国的’是瘟疫！”

最后程桦站在清醒中国人的立场论述道：

“我们是中国人，因而也要有自己的脑袋，要用它来辨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中国的东西有好有坏，外国的东西也有好有坏，我们都要分出好坏，然后留下好的，去掉坏的。这留下的，也就势必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我们都应该充分占有和利用。特别是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神速，倘若坚持‘外国的不用’，恐怕哪年又要被别人、被我们蔑视的‘外国人’欺侮了！”

这篇文章一举夺得那次作文大赛一等奖的第一名。

我这里不厌其烦地评述程桦的获奖作文，并不是因为我也是那次作文比赛的优秀指导奖的获得者，而是这篇作文反映出程桦在我的影响下，思维已比较敏锐活跃，思考比较严密周到，思想也开始犀利深刻起来。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两年之后，已是高一学生的程桦受学校委托主办了一期纪念国庆38周年的专栏，又在全校引起了反响。

一位高三学生说：“这期板报内容别具一格，不落俗套，很有新意！”

一位语文老师说：“这是我任教二十多年来看到的最好的一期学生板报！”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非难：“国庆板报怎么能这样办呢？”“这些学生的思想太片面、太偏激！”

所谓“国庆板报怎么能这样办呢”？是因为这期板报没有像以前的“庆祝专栏”一样，摘抄几句“从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到天安门城楼上的盏盏红灯”之类的诗歌，或摘登几条建设成就，而是以“热爱祖国风华正茂，关心改革激扬文字”为通栏标题，登出了一组论国事、话改革的议论文章。程桦还特意在《写在前面》中告诉读者：“对共和国母亲生日的庆贺，莫过于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和对改革事业的关心。”

所谓思想“太片面、太偏激”，主要是针对程桦《血泪国耻不能忘》一文而言。程桦在文章中对“我国领导人邀请 3000 名日本青年访华，而日本方面仅邀请 500 名中国青年访日”、“东芝事件”以及“日本企图做政治大国”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日友好不能忘记历史”、“越是在共和国生日的时候，越要居安思危，想一想我们母亲所遭受过的耻辱”。应该说，作者善于独立思考，勇于说真话，热爱祖国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板报仅存在了 10 天，就被强行擦掉了。

又是一个黄昏，我和程桦漫步校园。我对他说：“不要灰心，你肯定没错。你应该豁达些，表现出男子汉应有的气度。”并告诉他应该怎样对待复杂的社会，勉励他在成长的道路上一定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期待着程桦走向成熟。

然而，他毕竟是个孩子，考上高中时也不过 14 岁。他当然也有着这个年龄的男孩子顽皮、活泼甚至倔强、任性的特点。

高一时，我继续担任他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开学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让我和他的父母头疼的事。

他的父母已在一年前调到乐山一中。在一个星期六的夜里，大概已经十一二点了吧，她的母亲焦急万分地叩开了我的寝室门：“李老师，程桦他……他……出走了！”

我一惊，连忙随她赶到她家。原来，这天傍晚在饭桌上，他母亲不停地告诫他“要专心学习”、“不要分散精力”、“特别要注意和女同学的交往”等等，说得程桦心烦，总觉得母亲不信任自己，就和母亲顶了起来，父亲见状，便骂了他几句。程桦一气之下，丢下饭碗，便冲出了家门。

已是深夜了，程桦还没回来，他父母心急如焚。

我寻思，程桦是个有头脑的人，又是男孩子，估计不会出什么大事。便安慰他父母，并同他们聊了起来。我问程桦最近在家里的表现，他父母告诉我，最近一段时间，程桦脾气特别犟，逆反心理很重，不像原来那么温顺听话了。

我问：“你们嘱咐他要特别注意和女同学的交往，是不是发现他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好的迹象？”

“不是。”他母亲说，“我们纯粹是一种担心。现在社会复杂，我们是怕他在外面学坏了啊！”

我说：“这样说，他肯定感到委屈。程桦现在这个年龄正是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既不可能脱离父母，又处处想独立自主；既渴望找到知心朋友，又对大人们处处防范；自我意识特别强，自尊心也特别重，受不得半点冤枉

和委屈……因此我们以后对程桦的教育应更加细致耐心才是。”

程桦一直没回来，于是我和他父母一起出去找——虽然明知不一定能找到。我们先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呼喊，后来又进入教学大楼，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地搜寻。结果，在一间教室的门背后把程桦找到了……

第二天，我与程桦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的心。虽然他口头上承认自己错了，并答应向父母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出走，但我感觉得到，他是出于对我的尊重或者说怕伤了我和他的感情才这样表态的，而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想通。

从程桦在班上的表现来看，他的成长也的确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上课特别爱说话，常常被老师批评；下课更是无比活跃，有一次在教学区内踢足球，竟把教室玻璃窗砸碎了（事后他主动来找我认错）；学习也不如以前抓得那么紧了，作业也开始有敷衍的时候；最让我着急的是，不管他自己意识到没有，客观上他开始给人一种骄傲的印象。

我感到程桦不如过去那么“纯”，甚至有点“油”了。

本来，就程桦的智力、能力来说，他似乎有骄傲的“资本”：从小到大几乎都是在老师的赞扬和同学的羡慕中成长，可谓“一路顺风”；即使他保持目前的状况，以他的学习基础而言，两年后也可以考上一所重点大学。但那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大学生而已，绝不是程桦发展的最佳境界。

正在我和他的父母担心的时候，程桦的半期考试一下跌落到了班上第24名——要知道，从我教他以来，他的学习成绩从来都是班上乃至年级前三名啊！

半期考试后的一次全校集会，我班的纪律不错，可程桦居然在座位上又说又笑；我给他递了好几次眼色，不知是他没看见还是看见了不理睬，依然谈笑风生。我一怒之下，大喝一声：

“程桦！站起来！”

他一愣，随即狡辩道：“我又没有违反纪律！”

我更加怒火中烧：“我叫你站起来！”

他不吱声了，可一动不动，丝毫没有要站起来的意思。

我一气之下，走到他的旁边，一把把他拖了出去，让他站在过道上！

于是，在全校一千多师生的众目睽睽之下，程桦以这种方式被“亮相”了。

曾被人誉为“神童”的程桦，什么时候受过如此“奇耻大辱”？果然，全校集会一结束，我正准备和他谈一谈的时候，他便和我大吵大闹起来：什么“我并没有违反纪律”呀，什么“你冤枉了我”呀，什么“你成心让我出丑”呀，等等。

见他情绪激动，我知道是谈不出什么结果的，便对他说过几天再谈。他却倔强地说：“没什么好谈的！”

那几天，我冷静地反思我对他的教育。说实话，就一般教育原则来讲，我强硬地把他拉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示众”，的确有些过火。但对程桦这样的“尖子生”，这正是一种“歪打正着”的“受挫教育”。试想一下，如果程桦在成长过程中，连一点委屈都不曾受过，连一次“打击”都不曾有过，他将会形成怎样脆弱的心理素质和畸形的人格形象？那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呢！

我决定利用这次冲突，和他进行一次认认真真的心灵交流。几天后，我把他请到我的家里……

当时谈心的具体细节我已记不清了，但基本的谈话要点，我至今没忘。

我和他谈起了我的中学时代。我读高中时，成绩很好，尤其是写作拔尖，因此深得老师们的喜爱，我的班主任张老师对我甚至可以说是“偏爱”：不但在学习上对我很关心，连生活上对我也特别关照（那时我住校，她甚至还帮我缝被子）。也许是听表扬听多了，也许我真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总之我渐渐得意忘形起来——有一次我借口开玩笑，嘲笑班上一个年龄较大、成绩不好的农村同学，当面对他说：“你反正都学不好，还是回家去安度晚年吧！”结果在班会课上，我被张老师骂得“狗血喷头”：“李镇西！你简直被我惯坏了！你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你有什么资格嘲笑自己的同学？你不就是有个城镇户口吗？你不就是考试成绩多那么几分吗？……”当时我感到无地自容，觉得张老师太绝情。但现在想起来，那是张老师对我的真正关心与帮助，因为从那以后，我随时都提醒自己不要自我感觉太好。

我还给他算了一笔账：在全国，并不是所有适龄儿童都能读上书，换句话说，小学毕业的人也只是同龄人中的一部分（虽然是大部分）；而在这一部分人中，并非人人都能够读上初中，也就是说，读上初中的也只是一部分人；再看，现在全国远远还未普及高中，那么，能够读上高中的人，在同龄人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而能够读上像乐山一中这样的省级重点高中的人更是少数；在已经读上重点高中的同学中，像程桦这样的拔尖学生也是极少数——这样一算，程桦这样的学生，无疑是处在同龄人的金字塔尖！在比同龄人享受更多荣誉的同时，肩负有更沉重的使命！如果我们国家的这少数学生，都没有理想或对自己要求不高，那我们的民族真的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我记得当时说到这里，我很激动，程桦的表情也十分真诚严肃）由此看来，包括老师和家长在内的教育者，对你们这些同学的要求高一些严一些，不是很自然很应该的吗？为什么得不到理解呢？

我和他谈得最多的，是“超越自我”这个话题。我列举了许多杰出人物的事迹后说，古今中外一切有作为的人，无一不是在青少年时代便比同龄人更加成熟。这个“成熟”，一方面是指目光远大，富有理想；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在能够同自己的弱点作痛苦而顽强的斗争，所谓“战胜自我”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意思是身处逆境，能够锻造一个人的巨人品格，能够造就一个时代英雄。但是处于丰衣足食的和平时期，青少年哪里去找“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的机会呢？我认为，这就只有靠在“战胜自我”中超越自我！如果“顺其天性”，放纵一下，懈怠一下，甚至“潇洒走一回”、“游戏人生”，这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但是——程桦，你应随时提醒自己，别人可以这样，我不可以，因为我今后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人！这是李老师对你的希望，也是你父母对你的希望，更是我们的国家对像你这样的学生的希望啊！”

这以后，程桦的发展当然也有过反复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良好的。特别让我欣慰的是，程桦的思想之翼在重新起飞后，变得更加矫健，他富有个性的思想在继续飞翔：《血的证言和泪的反思》、《读 神圣忧思录 有感》、《对教育投资的担忧》、《做平凡岗位上的伟人》……一篇篇文章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令我和同学们赞赏。

他又参加了一次作文大赛，这次的题目是《写在郭沫若的故乡》。面对题目，程桦再一次让自己的思想展翅飞翔——

“郭沫若无疑是我们故乡的骄傲，但是，作为他的家乡人和后辈，一味拜倒在郭沫若的脚下而仰视巨人，是没有出息的。一个只有勇于超越前人的民族才是有活力也有希望的民族。因此，今天我们对郭沫若最好的纪念，莫过于以郭沫若不迷信权威的创造精神，超越郭沫若！”

听说评奖时，这篇文章引起了争议：多数评委对程桦的思想观点极为赞赏，但个别人却认为：“这娃儿太狂了！”总之，在我的印象中，最后我好像没有得到程桦获奖的消息。

然而，令我欣喜的是，程桦仍然执着地以“超越郭沫若”的精神奋然前行——

从高一下期起，他的学习成绩再次名列年级前茅；到了高二，他担任了班上的学习委员；到了高二下期，他当选为学校团委副书记，并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最后，到了高三毕业的1990年，他因品学兼优而被北京大学免试录取。四年后大学本科毕业时，他又因发展全面、成绩优异而被保送读本校研究生，专攻“美国经济”。今年春节，程桦携女友来看我，送我一本书：《微软的秘密》。我翻开扉页，上面赫然印着：“翻译 程化等人”。——当年的“程桦”现已更名“程化”了。

〔附〕程桦 来信

说明：本文写好我寄给程桦，请他看看，以核实一下事实。很快，我便接到他的回信。

亲爱的李老师：

您好！

我是在三天前收到您的来信的。由于这几天忙于找工作，所以回信晚了一些。

关于我当前的一些情况后面再说吧。首先我想感谢李老师多年来对我的教育，您对我的那些教育和培养将使我受益终身。我看了您寄来的稿子，仿佛又回到了中学时代，一切都仿佛发生在昨天，使人感叹光阴的飞逝。

稿子中有几个地方不太准确：

一、我转学到乐山一中的时间是1985年秋（1985·9）。

二、《写在郭沫若的故乡》一文最终还是获得了“乐山市沫若杯中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第一名，当时《乐山日报》登出过获奖名单，而不是“没有获奖”。

三、高二下期，我当选为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兼团委宣传部部长，而非“团委副书记”。

不太确切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么几处。

另外，我觉得您对我影响很大的几件小事，您并没有写出来：

一、刚转学时，第一次的作业本上您写了“欢迎您，程桦同学！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这让我感到了很大的温暖和鼓舞。可以说，以后对您的尊敬都是从作业本上这个句子开始的。

二、有一次班上写作文，好像是可以缩写课文《奇特的激光》，也可以写幻想激光在未来的用途。我写了缩写课文这个题目，得分不低。但是，您后来找到我，告诉我说，全班除了我，所有的同学都选的是写幻想的题目，并告诉我应该加强对自己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从此我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创造力。

三、我当了文学社社长之后，大概是初三前的那个夏天，我一篇作品也没有写。其实我是想写的，就是拖拖拉拉的坏习惯使我迟迟动不了笔。您知道后批评了我，并且告诫我应该养成雷厉风行的作风。直到现在，当我想偷懒时，我都会想到这件事情。从那以后，

我一直在努力做到办事不拖拉。我很高兴的是，现在我办事已经完全不拖拉了。不过有一点不好的是，事情似乎有点过头了——我现在是班上较有名的急性子之一。

我想说的是，也许李老师没有特别意识到这几件小事对我的影响，也许您已经忘了它们，但是，它们对我的影响确实是深刻的。

至于我现在的情况，我想有那么几点可以证明李老师当年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并没有白费工夫：

一、我研究生期间成绩是班上第一名。

二、研究生期间，我担任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并主持开办了“知识女性”、“中国企业家精神”等讲座，效果不错。

三、我已入党，本月中旬即将转正。

现在，我正在找工作。我找工作的目标当然首先是想留在北京。在北京这几年，我深深感到了首都作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我未来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由于我今后的目标是要在信息行业中图发展，所以，占据这个地利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找工作刚刚开始不久，因此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消息。以后如果有了，我一定会告诉您。另外，您对我的择业有什么建议和想法，我也非常愿意听。

就写到这儿吧！

代问万老师和晴雁好！晴雁一定长得更漂亮了！

顺祝李老师全家新年快乐！

学生：程化

1997年12月11日

杨嵩：在顺境中不断战胜自我

杨嵩与程桦是高中同班同学，但是，当程桦在市初中作文大赛上“激扬文字”时，杨嵩还只是本校同年级另一个班的不太懂事的“小调皮蛋”。

“小调皮蛋”的确是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本来初中我并没教他，初三快毕业时，教他们班的语文老师病了，于是学校便派我去给杨嵩他们班代了两个星期的课。在上课时，班上的同学都很专注，毕竟毕业考试已迫在眉睫了。但我发现最前排有一个年龄、个头看起来都和班上其他学生差一截的小男孩，表现很特别——他很少说话或干扰别人学习，但总是不停地搞小动作：不是在草稿本上画画，就是折纸飞机之类的玩艺儿，或者把钢笔、圆珠笔拆了修了拆……总之，一到上课，他就忙个不停，似乎他总有做不完的事。

我和我的班主任谈起这个小男孩。班主任说：“你说的肯定是杨嵩！这个学生脑子特别聪明，九岁就读初中。他是从上一年级因病休学后到我班上来的，现在才12岁半！他性格比较内向，不是很爱说话，就是‘阴倒费’（方言，‘暗中调皮’之意）。有时，甚至上课都悄悄溜出教室玩！唉，娃儿是很精灵，但我怀疑他有‘多动症’……”

我当时想，幸好我只是代他几天课，要是我班上也摊上这么一个“阴倒费”，那才够我操心啊！

然而，几个月后，我接任高一一个新生班班主任，在我的新生名单上，“触目惊心”地印着两个字：杨嵩。

据我校一位与他同住一个院子的老师讲，杨嵩是“哭死哭活”要到我班上来的：初三毕业前夕给他们班上了几堂课，我对他印象不太好；他却对我产生了崇拜之情，说我的课讲得好，特别适合他的口味……于是，暑假里，当他得知我将担任高一班主任，而他又没有分在我班上时，他便在家一次次哭闹着纠缠其父母，要他们到学校“做工作”，希望能把他调入我班。经过其父母的一番口舌努力，他总算如愿以偿。

我有些哭笑不得：“唉！杨嵩啊，杨嵩……”

但有一点我是懂的，那就是杨嵩及其父母对我真诚的信任。我当时真的很感动，并在心中发誓：我一定要对得起这分沉甸甸的信任！

刚进高一的杨嵩确实太调皮了：贪玩，好动，酷爱打乒乓球——每当下课铃响起，他就迫不及待地紧握球拍跃出教室向操场边的乒乓球桌冲刺。上课（至少是上我的课）也不太认真，很少参与课堂活动，从不发言，只是坐在自己位子上忙自己的“活路”。

不过，每次考试，他的分数总不会太低，毕竟他很聪明。

像这样的学生，我还真拿他没办法！

不久，在我的一堂语文课上，杨嵩终于让我看到了希望。

那堂语文课，我给学生读《文汇报》上的一篇报告文学《16岁，在金字塔尖》。这篇报告文学写的是复旦大学少年班的事迹：年仅十二三岁的少年班孩子们，在同龄人还只知道在妈妈怀里撒娇时，他们已经把目光对准了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因而以常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贪玩欲望，顽强地在求知的山路上攀登着。

当时，我一边读，一边联系我班学生的实际评论。整个教室十分安静，我感受到全班学生的心灵都受到震动。其中，杨嵩的神情我至今不忘：他身子前倾着，情不自禁伸直了脖子，一动不动，两只眼睛一直凝视着我，眼里

闪烁出激动的光泽……

当天放学时，平时很少主动和我说话的杨嵩找到了我：“李老师……”

“什么事？”我和蔼地问。

“能不能……能不能……把，把您今天……”他欲言又止。

“哎呀！爽快些嘛！”我拍拍他的肩膀，“都是小伙子了，有什么尽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的。”

他的话终于连贯了起来：“李老师，能不能把您今天读的那篇报告文学，借给我拿回去再看一看？”

我很乐意地把那本《文汇月刊》借给了他。

过了几天，他还书时，还给了我一份他写的读后感《战胜自我》：“李老师，这是我写的一篇读后感，请您帮我看看。”

一向不喜欢作文的他，居然主动写了一篇“读后感”，而且写得很真诚：

“听李老师为我们读《16岁，在金字塔尖》时，我的心灵的确受到了震撼。李老师把书借给我后，我又把这篇作品复印了一份。反复阅读，我感到的是惭愧。

我四岁即读小学，以后不断听人说我很聪明，我也很得意，觉得自己不怎么刻苦学习，可每次考试成绩还可以。现在比比少年班的学生，我简直脸红！要说聪明，他们才是真正的神童，可他们没有一个有半点骄傲自满。我呢，总以为自己学得很轻松，不愿深入地刻苦地钻研，贪玩，特别迷恋乒乓球。我有时也下决心控制住自己，可就是缺乏毅力。现在我总算找到学习的榜样了！……”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杨嵩还主动为自己出了一个“难题”：

“以前，我每天中午都是在乒乓球台前度过的，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我决定，以后每天中午打乒乓球不得超过一点钟，到了一点钟必须进教室学习。当然，我一开始不一定能做到，请李老师提醒我、监督我，发现我中午一点钟过后还在玩乒乓球，就叫我回教室。”

我丝毫不怀疑杨嵩这个决心的真诚，但我确实担心他这是一时冲动。然而他很快就以自己的行动消除了我的担心。

有一天吃了午饭后，我在校园散步，走过操场时远远地看见杨嵩正在乒乓球台前厮杀。我一看表：刚好一点正。于是，我高声呼喊他：“杨——嵩——”

他回头看着我，好像在问：“什么事？”

我对着他扬了扬左手腕，并用右手指了指表，意思是“已经一点钟了”。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有些犹豫地收起了乒乓球拍，正要离开球台时，又高声问了我一句：“李老师——是已经过了一点呢，还是刚到一点，或者是还差几分钟到一点？”

我也高声对他说：“刚、好、一、点、正——”

于是，他立即大步向教学楼走去……

为了促使他不断战胜自己并体验战胜自己的感觉，我给他出了不少作文题：《两个自我》、《一次战胜自我的经过》、《灵魂的搏斗》、《做自己意志的主人》等等。在我那次提醒他“刚好一点正”不久，他在一篇《灵魂的搏斗》的文章中，真实细腻地描写了那次他从乒乓球台走向教室的心理过

程：

“当时，我是多么希望李老师回答‘还差几分钟到一点’啊！那样的话，我还可以多玩一会儿，因为当时我正赢着。但时间毕竟是无情的，我只好向教室走去。也许在李老师和同学们看来，当时我走得很爽快很坚决。可是，对我来讲，从操场到教室不过百米的路程，却是那么遥远，走起来又是那么艰难：我的脚很沉重，简直可以说是一步一步地挪动！当时，我是多么想回头看一看乒乓球台啊！然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千万不能回头啊！如果一回头，你可能就控制不住自己而弹回乒乓球台旁去了！不能回头，一定不能回头！’我终于走进了教室。这是一段十分痛苦的路程，却又实实在在令我无比自豪！因为我又一次战胜了自己！”

当我在班上朗读这篇文章时，全班同学都被杨嵩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毅力感动了！杨嵩高中毕业已经八年了，可是他十一年前写的这篇作文，我至今还保存着，并经常给我后来一届又一届学生念。

如果说，“克制打乒乓球”是杨嵩在我的引导下自己为自己出的一道“难题”的话，那么，我决定借助他这个良好的开头，继续给他出“难题”——让他在越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潜力，进而“超越自我”。

杨嵩的本性其实是比较活泼开朗的，但由于他年龄小，因而在班上显得很幼稚而且胆小。比如，他很难在课堂上发言，更不要说在班上当众讲演了。比起程桦来，他各方面的能力是比较弱的。我准备就从能力培养入手，“折磨”一下他。

一天放学后，我把他请到我的家里，在高度赞扬了他最近在战胜自我方面的进步后，又同他聊起了“志向”的话题。

我说：“看来，你很佩服复旦大学少年班的同学。我认为，他们值得你学的，首先是他们都有明确的志向，即一生的奋斗目标。你想没想过自己这一生的志向呢？”

杨嵩回答：“我想过。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建筑大师。”

把“志向”理解为具体的职业，确实表现出杨嵩特有的幼稚和纯真。不过我仍然满腔热情地表示赞赏：“很好！”

我进一步引导他：“当然，你是否真能成为一名建筑大师，除了取决于你本身的努力外，还受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不管今后你是不是真的成了一名建筑大师，或者阴差阳错干了别的什么行当，你这一辈子不打算过得很平庸，而希望干一番事业，是吧？”

“是的！”他很真诚地使劲点了点头，脸上呈现出与他这个年龄不相称的庄严。

“那么，你现在就应该仔细检查一下自己：为着将来大干一番事业，自己目前还缺些什么？”

我和他一起分析起来。论学习成绩，他是没多大问题的；论品格意志，他已经开始磨炼自己了；最后，说到能力，他感到惭愧了：“我就是不好意思做抛头露面的事，怕做不好，被同学们笑话。”

我说：“我不是给你讲过吗，对不喜欢做的事，强迫自己努力去做并且要做好，这正是战胜自己啊！”

“可是，我从哪儿入手培养自己的能力呢？”

我给他出主意：“最近正好要改选班委。你主动争取竞选，怎么样？”

“可以是可以，但是……”他有些踌躇，“我从没当过班干部，如果同学们不选我，怎么办？”

我鼓励道：“即使你没被选上，对你来说也是胜利！因为你又一次在‘面子’上战胜了自己，而且经受了一次难得的受挫锻炼。”

我又说：“当然，你应该尽量争取获胜！这样吧，在同学们投票前，你发表一下演说，谈谈你为什么竞选班干部，你打算怎么为同学们服务，并请同学们给你一次机会。我想，同学们会被你的真诚感动的！”

他说：“哎呀！我是最不敢上台讲话的，一说话我的腿就发抖。”

“不要紧的。”我笑着对他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今天晚上回去写一篇讲演稿，明天拿给我，我帮你改一改，然后，你再回家把稿子背下来——你的记性不是特别好吗？同学们又不知道你是背稿子，听到你有条有理的讲演，一定会佩服你的口才。”

“好吧！”他同意了。临离去的时候，他又想起一个问题：“李老师，你说我竞选什么班干部好呢？”

我说：“这就是你自己考虑的问题了。不过，我提醒你，哪一项班委职务最能锻炼你的能力，你就考虑竞选哪一项职务。”

第二天，他果真交给我一篇写得很认真的“竞选演说”，他打算竞选体育委员。我问他原因时，他说：“体育委员经常要组织同学们集会，每天都要组织课间操。我觉得事情多，更能锻炼自己；而且，这些事情都是抛头露面的，正好让我的脸皮‘厚’起来，变得大方些！”

在几天后的班会上，杨嵩以自己诚恳的态度和大方的演说，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他如愿以偿被选为体育委员。

当上班干部，杨嵩就忙了起来：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刚下课，他就大声催促着同学们：“快点，快点！出去做操了！”每当体育课时，他总是站在全班队伍前，煞有介事地指挥道：“立正！稍息！”虽然口令喊得还不是那么熟练，但观其神情，俨然是一位将军。

但是天天如此，杨嵩好像感到了一种乏味，倒不是他不愿为同学们服务，而是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一种简单重复，缺乏新鲜感。

从他这个“不满足”中，我看到了杨嵩一种可贵的思想品质：希望创新。

是的，对杨嵩来讲，争当班干部，并不仅仅是锻炼胆量，当天天喊“立正”“稍息”因而日渐大方起来后，他就渴望一种工作的创造性。而作为教育者，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与其手把手地训练，不如想方设法为学生提供机会：让学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我又给他出主意了：“1988年元旦即将来临，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搞一次活动，既有迎新内容，又与体育竞赛有关，而且要让同学们耳目一新？”

我和他一起探讨了多种方案，最后杨嵩决定举行一次“迎新室内田径运动会”。

“室内田径运动会”？这名称岂止是新颖，简直是令人费解！

然而，杨嵩毕竟是杨嵩。在1987年最后一天，我班的“迎新室内田径运动会”不但在教室里如期举行，而且大获成功。关于这次别开生面的活动，任何文字描绘都不足以表现出当时的热烈气氛。还是借我保存的一篇当年杨嵩写的作文《小小空间任驰骋》中的有关内容，向读者介绍一下，在这“小小空间”，杨嵩是怎样组织同学们“驰骋”的：

“本届运动会设有标枪、铅球、短跑、跳高、跳远等项目。不知情的人也许会疑惑：教室里怎么能投掷跑跳？嘿，这正是鄙人的发明！其实，所谓‘标枪’，就是50厘米长的竹签，‘掷标枪’就是立定掷竹签；所谓‘铅球’，就是氢气球，‘掷铅球’也就是掷氢气球；所谓‘短跑’是跑100厘米，当然，得把双腿捆住……尽管如此，比赛场面仍然十分激烈精彩。你看掷‘标枪’的同学，虽然只是一根细细的竹签，但比赛规则是肩膀不能动，只能小臂运动，所以有的男子汉虽有鲁智深一般的力量，却仍然哀叹英雄无用武之地。相反以细心灵巧著称的女同胞可就大显身手了。别看她们平时斯斯文文，可此刻她们细细的手指捏着细细的‘标枪’，轻轻一扔，就超过许多男同学。不过在铅球比赛中，身材矮小毫无运动员应有的强壮体魄的尹德君，却以自己的灵巧为男同学赢得了一项冠军……比赛项目都很‘袖珍’，但气氛却不亚于奥运会：喝彩声、加油声、欢呼声，还有差一点就夺冠的叹息声以及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捶胸顿足声汇成一片，组成了我班迎接1988年的迎新曲！”

刚进入1988年，他又迎来了一次机会，从事情后来的发展看，毋宁说这是一次考验——

华中某大学少年班的招生简章传到我校，我首先就想到杨嵩，不仅仅因为班上只有他的年龄符合条件，也不仅仅因为他的成绩拔尖，更主要的是我希望给他一次在更大范围内冲刺的机会，让他经受一次锻炼。

杨嵩的父母得知少年班招生的消息，也很想让杨嵩报考；杨嵩本人更是跃跃欲试。

杨嵩真的要报名了，我却有些犹豫了：他面临的功课负担实在太重了——他不过才学完高一上学期的课程，可是半年之后却要通过六门功课的高考。如果他在这几个月时间内，不能很扎实地掌握有关课程的知识，那么不但考不上少年班，而且还会影响他以后的学习。

但是，杨嵩的态度很坚决：“李老师，让我试试吧！即使考不上，我也可以检验一下自己的自学能力啊！你不是经常要我‘战胜自我’吗？”

就这样，在高一下期的四个月里，杨嵩一个人在家开始了艰难而顽强的跋涉。其间他所遇到的困难和他所表现出的毅力，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不过，对此读者一定也不难想象。

当年参加高考，杨嵩以西南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获准赴华中某大学复试。

一路过关斩将，复试也非常顺利。但是，就在杨嵩几乎就要跨进大学少年班门槛的时刻，却因招生过程中的某些原因，他被人为地拒之于少年班的门外！

在出征之前，杨嵩曾想到过失败的可能性，但那不过是文化考试的失利；现在以这种原因而使理想成为梦想，不但杨嵩而且连他的父母和我都是不曾想到的。因而，对小小杨嵩来说，这个打击不但是沉重的，更是残酷的。

不过，从某种角度看，我又觉得对他这样一直很顺的学生来讲，这件事并非没有一点积极意义。关键是我怎样充分挖掘这次“挫折”所潜在的教育因素。

自然又是一次震撼心灵的谈话：从“天降大任”到“好事多磨”，从韩信的“胯下之辱”到爱因斯坦的“第三个小板凳”，从信心、勇气、毅力到人格、胸襟与心理素质，从“这次应考至少让你看到了以前连你也不相信的智力、能力和潜力”到“当若干年后，你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之时，再回头看

今天的挫折，你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人生长河中一个小小的漩涡而已……”

最后的结论是：“你应该感谢命运给了你这次打击，你应该把它当做一个新的起点！”

新学期开始了。高二年级按文、理科分班。我班已被拆散：读理科的学生转入其他班，读文科的学生留下。分班学生名单是上期期末确定的，因为当时杨嵩正参加高考，学校便根据他的学科优势，将他分在了理科班。我也认为根据他的兴趣爱好、学习状况和智力特点，读理科是理所应当。

开学第一天，杨嵩却找到我，要求留在我班读文科。我无比惊讶，他的解释却让我既感动又感激：“我不想离开你，希望一直跟你到高中毕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在文科方面加强一下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经过这近半年的自学，我已经把高中的数理化功课学完了，但我深感自己的文科素质还比较弱。你不是常常对我们说，未来需要的人才应该是知识广博、能力全面的吗？”

于是，在同学和老师不解的目光中，杨嵩留在了文科班。

接着，杨嵩又一次让大家看到了他确实没有半点受挫后的颓唐之气：他要求在新学年班委改选之际竞选班长！这里，引用当年杨嵩的同班同学郑洁的作文《新班长诞生记》，再现一下当时杨嵩的风采——

班长竞选人为潘芳奕和杨嵩，两位都是班上富有个性的人物，他们之间激烈、精彩的竞选在同学们的掌声中开始了。

……………

潘芳奕演说完毕，杨嵩便踏着如潮的掌声神采飞扬地走上了讲台。杨嵩年龄在班上最小，上课虽总不老实，但学习成绩却总是第一。他有时如小孩一般为一点小事而天真地大笑，但办起正经事来，又一脸成熟凝重，常使人觉得他是否太出老相了。今天，他满脸纯真的笑容，侃侃而谈，再不是过去那个不好意思发言的小弟弟了。他说：“我当班长嘛，大部分是想为集体为同学们做一点事，但我也毫无掩饰地说，我也有一点个人目的，就是想通过当班长来锻炼自己的能力！”话音未落，掌声便响起了。显然，我们正是需要这样真诚坦率的班长。面对同学们的掌声，他格外冷静，似乎受宠不惊，继续热情地发表着自己的宏篇大论。他的话，给人一种活力，一种积极向上、勇于进取的活力。

下面是答辩了。面对种种提问，两位同学胸有成竹，从容对答。

“假如你们在上面讲话，下面的同学不听，怎么办？”一位同学问道。

潘芳奕说：“反正有纪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杨嵩却说：“若大家不听，就说明我们的讲话没有切合同学们的心愿，我们就应该改变说话方式和内容，让大家感兴趣！”

又是一阵掌声！

李老师发问了：“假如我出差不在班上，你们怎么办？”

这次杨嵩迅速接过话题，笑眯眯地答道：“你要走，就放心地走。有了我这个班长，你这个班主任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了。”

全班哄堂大笑！笑声中，同学们的敬佩信赖之情油然而生。

最后，经过同学们投票，杨嵩当选为班长，潘芳奕任“第二把手”。然而，对他们来说，新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以后的事实证明，杨嵩在竞选时的自信是不无道理的。有他这个班长，我这个班主任虽不能说是“可有可无的”，但确实轻松多了。仅仅是一年的

时间，我和同学们明显地感受到杨嵩各方面的进步。

他的进步还在继续——到了高二下期，他当上了校学生会主席；到了高三，他被选为乐山市学联副主席……

他可没有把“学生官”当成“荣誉称号”，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出一种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就任学生会主席不久，他就干了一件算得上是轰轰烈烈的“大事”。

当时，乐山一中外面一条叫“致江路”的街道，坑坑洼洼，又脏又烂，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这样一条严重影响周围居民生活，更影响全校学生上下学的街道，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得不到整治。

杨嵩经过深入调查，决定代表全校师生投书报社。他先写了一份《关于请求整治致江路的呼吁书》，请我修改后寄到《乐山报》社。然而过了很久没有回音。他并不泄气，准备写第二封《呼吁书》。我提醒他：“何不直接给市长写信呢？”

他问：“这妥当吗？”

我说：“市长是市民的公仆，市民有困难找公仆怎么会不妥当？”

于是，他真的写了一封《致市长的公开信》，说明致江路早已变成了“制浆路”，并严重影响了周围市民生活特别是学生的学习，恳请市长督促一下有关部门，尽快整治该路段。

信写好以后，杨嵩突发奇想，来了个全校征集签名。于是，这封公开信后面便有了长长的签名。

怎么才能让市长亲自收到信呢？总不能又投寄报社吧？杨嵩又犯愁了。

“简单得很！”我又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你亲自给市长送去！”

“这……”毕竟没经历过类似的事，杨嵩有点犹豫。

我说：“怕什么怕？主人见仆人，居然还要怕？”

杨嵩终于鼓起了勇气。

一天晚上，杨嵩费了不小的周折找到了市长的家。

开门的是市长夫人：“你找谁？”

“我找市长。”虽然心怦怦直跳，可杨嵩还是故作镇定。

看着眼前这个似乎乳臭未干的孩子，夫人有些惊讶：“找市长？什么事呀？”

“我代表乐山一中的师生向市长反映情况，请求整治致江路。”杨嵩的心已经平静多了。

但是，杨嵩未能见到市长。

几天后，我班代表学校到市里参加“五·四”歌咏比赛，市长出席了这次歌咏会。比赛前，我见市长端坐在主席台中央，便对杨嵩使了个眼色：“上！”

据杨嵩后来对我说，市长接过他的信，知道内容后，和蔼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很好！我一定尽快过问此事。谢谢同学们！”

一个月以后，致江路焕然一新。

当杨嵩后来捧回“乐山市优秀学生干部”的荣誉证书时，我想起当初那个喜欢“阴倒费”的小男孩，不禁感慨：对社会而言，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但对学生而言，没有教育却是万万不能的啊！

高中毕业，杨嵩被保送就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那年，他只有16岁。

黄金涛：日记中的心路历程

黄金涛是我在成都玉林中学高90级(1)班所教的一个男生。高中毕业，他以优异成绩考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但在高一时，他并不是班上出类拔萃的学习尖子。他自控能力较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课堂上常常忍不住说小话，过后又后悔不迭；二是课余学习（特别是在家学习）往往容易受外界影响——比如电视的诱惑——而分心。在高一高二时，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中等状态。但从一开始，我就是把黄金涛作为一名优秀学生看待的。因为他思想纯正，忠厚朴实，而且有着强烈的上进心。特别令我欣慰的是，他十分尊敬我，甚至可以说非常崇拜我，这使我对他的教育始终建立在一种彼此高度信任的感情基础之上。在和他三年的交往中，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冲突。直到最近我因要写这本书，约他来聊一聊的时候，他还真诚地对我说：“在我眼里，您极富个人魅力，使我一直很喜欢您，很信任您。”我对黄金涛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战胜自我”的教育。当然，如果说与对程桦、杨嵩等优生的教育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教育手段上，我有意发挥了日记的作用。“日记”是我的教育载体，也是黄金涛“人格长跑”的记分牌。这次，黄金涛在谈到我对他的影响时，特意带来了他保存完好的高中生活日记，他说：“在我高中三年的思想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您，而发挥主要作用的，是这一本本日记。”

下面，我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日记，加以适当的评注，以此展示我对黄金涛心灵的影响。

1992年9月1日

开学第一天，我有幸分在高一(1)班。说是“有幸”，主要是因为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是李镇西老师。在我读初三时，他曾代了我们一学期的课，他给我和同学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同学真诚的爱和富有个性的教学方法，都让我们敬佩不已。现在，我又幸运地成了他的学生，将和李老师一起度过三年的高中时代，我想，我一定会在他的教育下，成为一名优秀学生的！

今天，李老师对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每天坚持写日记。

他说日记是道德长跑、意志长跑、人格长跑的记分牌，要我们通过写日记，养成每天“自省”的好习惯。我现在不敢保证自己能一直坚持把日记写下去，但是我将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地在“人格长跑”的跑道上跑远一些。

评注：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的魅力就是教育者对学生的吸引力。当学生对教育者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甚至崇拜之情时，我们的教育便露出了希望的曙光。我当时要求学生写日记，固然有磨炼人格的意图，但更多的是从语文练笔的角度提出来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学生通过日记所获得的教育——主要是自我教育——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黄金涛是其中突出的代表。直到现在，已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的黄金涛仍然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

1992年10月7日

今天上课时自己显得过分活跃，虽不太严重，但不可放松警惕。其活跃表现为上课总忍不住说话，虽然自认为很小声，但也是违纪之行为，其动机无非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所谓“幽默感”——荒唐！望明日节制。

今天也有值得自我表扬的事：一是历史课上，我主动发言，勇气令我自豪；二是我

终于把教室里的一盏灯修好了，虽然花了不少时间，但毕竟还是修好了，心中无限欣喜，并颇感自慰。

评注：黄金涛上课爱说小话的毛病一直伴随他到高二。为此，我没少找他谈心。他并不是有意违反课堂纪律，每次违纪后他都自责不已。我与他谈心，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战胜自己”。他一方面爱说小话，一方面课堂举手发言又很紧张，于是，我要求他把说小话的能量转移到举手发言上，鼓励的要点仍然是“战胜自己”！黄金涛最大的优点，是乐于干公务，常常主动关心集体。“修灯”小事，可见一斑。

1992年11月13日

今天李老师总结开学以来的情况，要求凡是最近课堂纪律不佳的同学自己承认错误。于是，我给李老师写了一张纸条，承认了自己课堂说小话的毛病。我为我以前的行为感到羞耻，也为我的诚实和改错之决心而倍感欣慰。这恐怕也是战胜自我吧！

评注：记得当时我在班上表扬了黄金涛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虽然以后的事实证明，他并未彻底改正自己的缺点，然而我认为，学生老毛病重犯，不一定就是“说话不算数”。改正多年养成的坏习惯需要一个过程，教育者对学生应该有信心，更应该有耐心。

1992年12月5日

开学以来，李老师找我谈心得最多的，就是“战胜自己”四个字。是啊，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毅力，有意志。谁不想成为有作为的人呢？谁天生就是坏蛋呢？但能否战胜自己，便成了一个人高尚与卑下的界限。

今天下午扫地时，心里一直想去打球，但仍然克制住了，扫地时一丝不苟，真正做到了“认真”二字。这当然是一件小事，但我很高兴自己能就这一点小事做到“认真”。我想，这也应该算是“战胜自己”吧！

评注：尽管黄金涛现在还谈不上在各方面战胜了自己，但他有意识地对自己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并开始在一些小事上磨炼自己，我想，这就是他走向成熟的起点，也是我教育成功的起点。

1993年2月27日

今天下午，李老师就我的弱点再次与我谈心。他充分肯定了我的优点，他说他很赞赏我的正直与朴实；同时又诚恳指出了我的致命缺点：自控能力较差，有上进心却毅力不够。在谈心的过程中，李老师没有一句严厉的话，而是亲切地和我聊天，他兄长般的真诚，使我很感动，觉得李老师够“哥儿们”。将心比心，我也反省了自己过去的表现，尤其是老师多次批评过的课堂纪律。

我是理解李老师的！

评注：黄金涛所说的这次谈心，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了。但读这篇日记，我却很感动——为自己被学生理解而感动。教育离不开谈心，而让学生觉得“够哥儿们”的谈心最能打动学生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的艺术有时就是谈心的艺术。

1993年3月18日

今天听李老师念了他以前一位名叫杨嵩的优秀学生的一篇作文，这篇作文写了杨嵩

怎样以顽强的毅力战胜自己。我很受震动。我以前就听李老师多次讲过杨嵩的事迹，但我原来认为杨嵩的成功是因为他特别聪明，今天我才明白，他的成功首先是因为他具有超人的毅力。

我现在恰恰就缺乏他这种毅力。其实，我也有过战胜自己的经历，但只是偶尔的；更多的时候，我往往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而战胜不了自己。今天我对此有了一个新认识：毅力不光表现在是否战胜了自己，更在于是否坚持下去！

评注：不断地用过去教过的优秀学生的事迹，来教育并激励现在的学生，是我一贯的做法。黄金涛的“新认识”说明，他不但真诚地以杨嵩为榜样，而且自觉地解剖自己。

1993年4月4日

又是一个“后悔不已”：说是要向杨嵩学习，可今天又犯错误了！

数学课时，突然停电了。老师给我们送来了蜡烛。燃烧的蜡烛，似乎具有魔力，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很想玩蜡烛，但一想到“战胜自己”的话，我便极力克制自己的贪玩心理。遗憾的是，我并未坚持下来，后来我忍不住去吹别人的蜡烛，有时又看别人玩蜡烛，既影响了自己的学习，又影响了别人的学习。过后我在心里骂自己：唉，我又成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评注：黄金涛“后悔不已”，我却对他充满希望：能够对自己的过失“后悔不已”而不是“无所谓”，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进步。

1993年6月12日

离期末考试一天天近了，我时时提醒自己抓紧时间。

我是个军事迷，爱看一些军事杂志。今天放学路过报亭，脑袋就像被一根绳子套住往报亭拉。我这时真想过去翻翻军事杂志啊！但一想到杨嵩同学戒球瘾的事迹，我就被一个正义的、坚强的“我”战胜了。我义无反顾坚定地走过报亭，头也不回！我走了一段路程，把报亭远远地扔在了后面。虽然我还是有点可惜我没有看到精彩的杂志，但更觉得自己终于战胜了自己，说到做到了，就不觉得可惜了，而是十分自豪！

评注：让学生不断亲身体验“战胜自己”的喜悦，是引导学生自我教育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1993年10月17日

今天是星期天，但我并没有因此为爱偷懒的我找睡懒觉的借口。我很早就起床了，然后坐在书桌前复习功课。天还没亮，整个家属区还一片宁静，外面一片漆黑，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在挑灯攻读。想到这，我竟感到一种骄傲和自豪！因为在这寒冷的早晨，谁不想多在温暖的被窝里舒服舒服呢？谁愿意迎着寒冷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学习呢？而我却做到了这一点！这难道不是意志的胜利吗？

评注：记得后来黄金涛在一篇作文中再次写到这个令他自豪的“星期天早晨”，我在班上读了他的那篇作文，并号召全班同学都向黄金涛同学学习。

1993年11月2日

今天，李老师给我推荐了一篇报告文学《指挥博士陈佐湟》，他让我好好读一读。我当然理解李老师良苦的用心，他是想在我心中再树立一个真正值得我们崇拜的英雄！

一口气读完陈佐湟的事迹，我重新思考“用脑科学”这个问题。是的，正如李老师说，历史上凡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艺术家等等，没有一个是“科学用脑”的！他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科学用脑，而是针对现在一些人学习极不刻苦却动辄讲“科学用脑”而说的。陈佐湟在美国留学时，一天只睡几个小时，过着“咖啡加闹钟”的苦行僧般的生活，却一举拿下了该大学空缺了 20 年的音乐指挥博士的学位！再看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华罗庚、邓稼先等等杰出人物，哪一个不是在“折磨自己”中走向事业的辉煌？所以，就我们中学生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现在首先还是应该提倡拼命精神，加倍努力，而不管是否“用脑科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味蛮干。在发扬拼搏精神的前提下，我们还是应该总结科学的学习方法。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提高效率。我最大的问题是学习时，效率观念不强，磨磨蹭蹭，时间一会儿就过去了，坐在书桌前几个小时，却不见有多大收获。今天，我决心抓紧时间。晚上，我把一只小闹钟放在桌前，指针走动发出的声音如滴水一般，似乎在催促着我；我握笔的手不由自主地在本子上急速地“跑”过，去追逐时间。这才是抓紧时间，提高效率的感觉！

评注：在教育的过程中，有时一位震撼学生心灵的英雄形象，远远胜过教师一大堆“苦口婆心”的唠叨。我至今珍藏着 1989 年第 11 期《文汇月刊》，上面刊载的《指挥博士陈佐湟》，是我后来每一届学生的必读教材。

1993 年 12 月 27 日

今天，我意外地听到李老师在班上念我的作文《一个小牢骚》。这是我最大的殊荣！原不过是有感而发之言，李老师却表扬我有社会责任感。

不过，细细想来，进入高中，在李老师的影响下，我的确比过去爱思考了，对周围的社会也多了一份关心。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理想吧！我已经是 16 岁的青年了，不能把自己当小孩了。我要对自己的一生负责，更要把自己的理想与祖国和民族的未来联系起来，要努力使自己真正成熟起来！

评注：黄金涛这篇《一个小牢骚》后来选入了毕业时我给学生们编撰的“班级史册”《恰同学少年》中，该文全文如下：

校门前的马路，车辆川流不息，路边装满了垃圾的垃圾桶，散发着阵阵腐臭，人人过之无不掩鼻，但唯独他，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污垢浑然一身的乞丐，像一个家庭主妇在菜市场买菜似的，在垃圾中与苍蝇争抢食物。

路边的火锅店，吃客闲吃着生猛海鲜，锅中热气腾腾，香味阵阵袭人，他们无暇去看一眼与卫生不符的肮脏的活物，因为他们既要吃火锅，还要摆龙门阵，实在忙不过来。

如此的一幕，在我眼中不知有多少。以前初见此景，心中也感乞丐可怜，始终没有给他们施舍。偶有过几回，也被朋友取笑，并且知道了有些乞丐是假的，为善者往往上当受骗，于是又为假乞丐的行骗所怒，见到此景也见惯不惊，甚至鄙夷。然而今天所见此景，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想忘记这不快，可当我路过“小天鹅火锅”店，看见门前停放的大小豪华或公或私的小车时，先前所见的乞丐以及所见所闻的大款官僚们便在我眼前纷纷浮现了出来，像是人人都挤着登场，出演一幕似乎毫无关联的闹剧。

我又有些怕想到他们，因为我无法回答我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可爱的国家，有的人极富极乐，有的人却极贫极悲？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差距如此惊人？如果他们都是在社会竞争的结果，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要付出那么多的代价，为什么有的人要得到那么多，而且还不满足呢？为什么有的富者要行不仁，有的官者要行不义？我想，他们作为社

会的产物，其产生的原因也在于社会。我虽未作调查研究，但我总认为社会的一方得到了额外的东西，另一方也必然付出额外的代价，而伴随这现象而来的便是两极分化。我痛恨这种不公平、不道德的现象，但我不恨人富裕，我希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也恨贫穷，既然都是人，就不该那样活着。但我也确实感到自己的渺小，感到现在无力扭转乾坤，但我相信“老有所养，幼有所爱，残有所助，人人皆劳动，人人皆富裕”的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会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实现，到那时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说实话，这篇文章不无偏激之词，但它仍然真正打动了我。我为一个16岁的中学生可贵的善良与忧思而感动，并以此教育全班学生要有社会责任感，也引导黄金涛把对社会的关注与自己的学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当时，我在这篇作文后面批了这样几句：“‘一切都会有的！’是你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但这一天的到来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所做的一切，包括你每天的学习！”

1994年1月5日

对于“爱情”，像我这样大的孩子，实在难于启齿。偶尔看到电影里、电视里有关爱情的内容，也感到脸红。但我们这个年龄，有时又忍不住要朦朦胧胧地想想这个我们根本无法想清楚的问题。今天，李老师却把这个敏感的话题搬上了讲台。他的《青春期教育系列讲座》正式开始了。李老师真诚坦然而又幽默风趣的讲述，让我们听得十分投入。听了之后，又陷入深深的思考，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成熟，什么是真正的人生意义。我感谢李老师为我们提前打“预防针”，使我们在成长的路上走得更稳当。

评注：当时，我之所以要给学生开设这个讲座，是因为我已觉察班上有个别学生在这个问题上把握不住自己。于是我想，与其被动地去扑“早恋”之火，不如主动地向学生正面进行青春期心理辅导。黄金涛的这篇日记和后来班上的风气证明，我的这个做法是明智的，也是有效的。

1994年3月12日

语文课上，李老师继续为我们读小说《凤凰琴》。最近一个星期，他每天都利用语文课为我们读这篇感人的小说。

今天念的是小说的尾声。当张英才背上行李即将离开界岭小学时，余校长用嘶哑的嗓子对他说：“今后你不管到了哪里，都别忘记在界岭山上有这样一座界岭小学。”念到这儿，李老师声音哽塞了，他半晌发不出声，转过身去背着我们擦拭眼泪。教室里鸦雀无声，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我的鼻子也一酸，险些掉下泪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热血在胸膛里沸腾。为了控制泪水，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又分明听到气流在颤动，那是心灵在为之震动！

为了山区的孩子，我真是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我想可以捐书，自己有许多现在不用的学习参考资料，都可捐出。当然，我更应该珍惜现在拥有的良好学习条件。看看他们，想想自己，净化灵魂，树立志向：发愤学习，考上大学，建功立业！为自己，也为他们，更为我的国家和民族！

评注：我从来不认为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就可以取代对学生所有的思想教育，那未免把教育看得太简单了；但是，在有些时候，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确可以起到某种“催化”作用，使学生思想由量变飞跃到质变。比如，对黄金涛来说，这篇《凤凰琴》就一下点燃了他沉睡的理想火焰。最近，他来看我时，还谈到这篇小说当年对他思想的震撼。

1994年4月6日

不知是因为我的纪律比以前大大的好了，还是因为同学们有意想“以毒攻毒”，今天，我荣幸地被班上选为班委纪律委员，专门负责课堂纪律的监督，每天下午把当天课堂违纪同学的名字写在黑板上。

不管同学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我就要对得起这几十张选票！正好下午上自习课，我就勇敢地行使了一回“权力”。

刚开始上课时，纪律还不错。可到后来，就有人小声说话了，声音渐渐多了起来。我也渐渐不安起来。嘈杂的教室里只有我的脑子一片寂静，我没有管脑外的声音，只有“管，还是不管”的问号接二连三地打得我头晕。站起来吧，又怕众人看我、笑我，我天生的薄脸皮，从小就怕抛头露面，只恨不得马上用布遮了脸，什么都不管，什么人都不得罪。大喊一声“不要说话了！”则更怕人笑话，无人理会，讨个“假正经”的名声，那可更可怕！但是，周围的说笑声却不停地传来，我感到十分刺耳。如果我就此沉默，当然没有人会笑我“假正经”，但会有更多的人在心里蔑视我：我们白选你当纪律委员了！我终于站了起来，大喝一声：“不要说话了！”令我吃惊的是，我这一声还真管用，周围的声音都平息了，直到下课，教室里都是安安静静的。

这也应该叫“战胜自己”吧？

评注：那一周的周记，许多学生都不约而同写到黄金涛的“大喝一声”，并为他的凛然正气所感动。记得当时我特意把同学们的周记拿给他看，鼓励他继续发扬正气。一学期后，黄金涛继续当选班委，不过他的职务换成了体育委员。于是，在每天我班课间操的队伍中，总有黄金涛巡视时那威风凛凛的身影。只要有谁不认真做操，他便在班上黑板一角记下姓名让其曝光，他还为这个“曝光角”取了一个幽默的名称：“今日病夫”。

1994年5月1日

今天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我却“节日”不起来。半期考试，我考得很不理想。虽然我一再告诫自己：“过了的事就不要老去想！”但心里始终忘不掉。就像病人去了盲肠，却总要在腹部留下一块不大不小的伤疤。我这人好面子，裤裆破了，便赶忙夹紧了双腿，蹩着脚走路，脸上带着让人迷惑的笑，眼睛总盯着别人的脸孔，心里却嘀咕着别人是否见丑了，或是听见线崩的声音了……总之心中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

唉，我不知何时能走出失败的怪圈？

评注：说实话，黄金涛的自控能力已大大提高，但科学的学习方法还没有转化为自己良好的学习习惯。他很苦恼，在这次考试后，他主动找到我，请求我帮助。我给他提出了“每日10问”的要求，即每天晚上睡前问自己10个问题：一问今天在家早读外语没有？二问今天上课开小差没有？三问今天学习上提出什么问题没有？四问今天的功课复习没有？五问今天预习明天的功课没有？六问今天做过闲事没有？七问今天“过电影”没有？八问今天计划完成没有？九问今天有未弄懂的难题没有？十问今天有无浪费时间？我要求黄金涛把这10个问题制成表格，每天按实际情况填写。最后我对他说：“一两天做到这每日10问并不难，但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唯有这样，你才能真正步入学习的良性循环。”

1994年5月17日

出差几天的李老师，今天又回到我们中间来了。他问我们这几天表现怎样，大家自然是异口同声大叫“好得很”。他似乎有点不相信，便走访诸位科任老师，结果大喜。我们当然更是十二万分的自豪！因为我们在没有班主任的情况下保持了良好的纪律。我们都

逐渐在思想上向李老师所说的真实、真诚靠拢。李老师又在班上搞“最近班上最守纪律的同学”的调查，结果，我荣幸地榜上有名！我以此为最大的荣誉，因为我在以前总是爱说小话，屡屡因课堂违纪被老师批评。现在，我可以毫无愧色地对自已说：我是一个守纪律的学生，我保持了进步，战胜了自己！

说实话，今天我受到的表扬，比我考试取得了好分数还令我高兴。因为道德的殊荣远比成绩的殊荣更可贵；同样的，道德的沦丧比成绩的下降更可怕！

评注：经过我的引导，更通过黄金涛本人的自我教育，他终于彻底改变了上课说小话的缺点。更令我欣慰的是，在改正缺点的过程中，他逐渐成熟起来。在以后的前进道路上，也许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对他纯正的品质，我是可以放心的了。

1994年6月2日

也许是因为学习太疲倦，也许是因为我心灵深处的懒惰的根还未彻底铲除，这几天，我好像又有些松劲了。不行！我这辆耗油量大的破车是该加加油了！于是，我找到李老师，向他求援。

同往常一样，李老师亲切和蔼地与我谈心。他先听我的诉说，然后帮我一起分析我现在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心理。他特别问我“每日10问”坚持得怎样？我说坚持是坚持了，但怎么效果不明显呢？他笑了，说：“我这一副药是中药，不是西药。”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后来，李老师又给我讲了“体坛尖兵”叶乔波的事迹，并给了一篇写这位世界冠军的报告文学。

回想进高中来，李老师不厌其烦地给我介绍一些拼搏人生挑战命运的强者的事迹，在我心中树起了一座又一座英雄的丰碑：带咖啡壶上课的陈佐湟、背英汉大词典的杨高，今天又是带伤夺冠的叶乔波……也和往常一样，我为之冲动，为之热血沸腾！

李老师今天为我加了油，我又升起一种拼搏的欲望：16岁正是应该拼搏的时候，我还等什么呢？其实，人生时时刻刻都在拼搏。这样才算是真正的活着！

评注：给他介绍叶乔波事迹的情形，我现在都还记得。黄金涛当时说他有一种对学习的厌倦感，很着急，求我帮帮他。我很理解他的心情，因此一点没有批评他。因为长期紧张的学习，心灵的疲惫是不可避免的，何况他是带着一双信任和渴求的眼睛来的。面对这双眼睛，我们所提供的应该是抚慰和鼓励，而不是批评和指责。

1994年6月10日

如果说，前段时间我的“每日10问”多少有些完成任务似地被动的的话，那么，现在我已逐渐养成习惯。这种习惯促使我每天的学习都很有规律。更让我高兴的是，这一良好习惯（其实也是良好的方法）使我的学习明显有了进步。我将继续坚持下去。真感谢李老师！感谢他用看似这么简单的“每日10问”，就把我的学习状态纳入了良性循环，更使我的学习效率大大提高。不知这是不是李老师的发明，如果是的话，他真应该获诺贝尔奖！

评注：真理总是朴素的。教育科学有时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教师的教育意图尽可能转化为学生的自我要求，再设法让学生坚持下去以形成习惯。

1994年7月5日

还有一年就要高考了，可我在最近的期末考试中却失败了。李老师帮我总结了原因，是我太看重考试，太急于求成，导致应试心理素质太差。李老师又送了我一句朴素的话：

“把考试当练习，把练习当考试。”他解释说，把考试看淡一些，“不就是一次练习吗？”丢掉任何患得患失的思想包袱，考试时反而可能会发挥得好一些；而对平时的每一道练习，都要当成考场上的试题，一丝不苟，而且要有时间观念。这样，真的到了考场，也就不会紧张了。

我完全理解了李老师这句话的意思，而且我想，只有平时把练习当考试，到时才能把考试当练习。

评注：经过两年多的教育，我自认为黄金涛进入了优生的行列，但要让他的学习成绩稳定下来，还需加强他的学习心理的优化，包括考试心理。

1994年9月1日

今天是高三学年的第一天，从今天起，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将在紧张的拼搏中向高考冲刺。说不清是恐慌还是振奋，也许都有一点吧！不管怎样，我对这一年的学习将全力以赴，争取考上重点大学，这是我人生理想的第一个台阶。

第一节下课后，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笑吟吟地送我一本笔记本：“今天是你17岁生日吧！我给你写了一首小诗，连同这本笔记本，算是给你的生日礼物！明年7月，你就要参加高考了，衷心祝你明年能以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作为自己18岁生日的礼物！”我非常激动，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停地说：“谢谢！谢谢李老师！……”我心中涌起一阵激动：这是我进高中以来，李老师第三次赠给我生日礼物了！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喃喃说道：“谢谢！谢谢李老师！”

回到教室，我打开笔记本的扉页，上面是李老师潇洒的行书——

也许……

——贺金涛同学17岁生日

名字也许太普通，
人格永远不会平凡；
生活也许较清贫，
事业永远不会黯淡；
歌声也许会暂停，
旋律永远不会中断；
理想也许还遥远，
追求永远不会遗憾！

你的朋友李镇西

1994年9月1日

我明白李老师诗中的含义，他是告诉我，人生的意义更多在于对理想的追求，而不仅仅在于追求的结果。放心吧，李老师！我会用行动回答您对我的期待的。

评注：这首诗是写给黄金涛的，也是写给我自己的，后来我又把它作为毕业赠言送给了全班学生。我想以此告诫我和我所有的学生，理想的追求比追求的理想更重要！在这个日益物质化、实用化的时代，人们急功近利地追求“结果”，却放弃了“过程”中更有意义的价值或者说更有价值的意义！当然，把这首诗写给黄金涛，也算是对他纯正人格的评价；同时也表达了我对他的一种含蓄的提醒：即使是对高考这样的重大关口，也不妨以平常之心待之，它不过是整个人生长河中一段湍流而已，而决不是最后的港湾。无论成

功或失败，都只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一年以后，黄金涛以优异成绩考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临行前，他和学生们来看我，并送给我一张签有学生姓名的尊师卡，我打开一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黄金涛代表全班学生写的一句话：“镇西兄——血脉虽不相连，心灵永远相通！”

王铜：男子汉的追求！

高一新生开学第一天，我正在办公室清理新生报名表，黄金涛同学就急匆匆地闯进来：“李老师，不好了！王铜被政教处抓去了！”我一惊，赶忙向政教处奔去。

远远地就听到政教处办公室传来主任气愤已极的叱责声：“处分！一定要给处分！学校哪能容忍这样的学生！简直连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了！你难道真的不晓得后果吗？真的要把人杀死了，你才晓得好歹吗？……”

我推门进去。政教主任的脸涨得通红，一旁站立的王铜却满脸不屑的样子，歪着头斜视主任一眼，那挑衅的眼神仿佛在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能把我怎样！

这是一个个子高大且浑身都洋溢着过剩精力和倔强傲气的顽童形象。

原来，刚才政教主任巡视各班，刚走到高一（1）班门口，就感到眼前寒光一闪，随即“当”的一声，一把匕首从身边飞过，颤巍巍地扎到教室门上方的横梁上！

于是，政教主任就把王铜“请”到了办公室……

虽然是新生开学第一天，我对王铜却已相当熟悉。他初中便在本校就读，早已小有名气：一是因为他智商较高，成绩拔尖；二是因为他相当顽皮，常常违反纪律，有时还桀骜不驯，令人十分头疼。

显然，这是一个十分有个性的学生。而初次见面，他就以这种方式给了我一个十分有个性的“见面礼”。

教学区里甩飞刀，这行为当然十分恶劣，也十分危险，我完全理解政教主任要给处分的决定。但从长远的教育看，简单地处分，会给王铜今后的成长设下障碍，也会给日后对他的教育蒙上阴影。这不是因为他成绩拔尖，我们就迁就他；而是对像他这样有个性的学生，我们只能采用符合他个性的方式来教育和引导。

基于这个思考，我建议政教处暂缓处分，“冷处理”一段时间再说。

一番十分勉强的谈心，他十分勉强地承认了自己的不对，然后又十分勉强地到政教处认了错，此事就暂且了结了。

我知道，这一连串的“十分勉强”并没有使教育深入其内心，但他毕竟低下了倔强的头认错了，这对他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何况，对他的教育才刚刚开始呢！

开学不久，我就明显感到，他并不因我为他解脱了处分而对我有丝毫的好感，相反，他几乎处处与我作对，仿佛我早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仇。

在第一次班会课上，我和学生们一起制定《班规》。我建议，为了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每天放学后集体长跑800米。学生们都表示赞成，王铜却叫了起来：“不跑！就不跑！反正我不跑！”

同学们都惊愕地把眼光投向他。我尽量耐着性子问道：“王铜同学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我不想跑！”仍然是硬邦邦的吼叫。

我有点火儿了，仍然没有发怒：“那，总要说个理由嘛！”

“没有理由，就是不想跑！”

我终于勃然大怒：“是这个集体的人，就得服从集体的决定！”

他瞪了我一眼，还想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只是在鼻子里重重地“哼”

了一声……

第二天下午，班里正式开始集体长跑，一清人数，只差王铜！

这是公然向集体挑衅！我当即把王铜找来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还强词夺理：“长跑不就是为了健康吗？我身体本来就健康，没必要长跑！”

我只好说：“那好，明天请你家长来一趟，如果你家长说王铜可以不遵守集体的决定，以后一切都随你的便！”

他一听“请家长”，立刻软了下来：“那就算了嘛！跑就跑嘛！”他大概觉得顶撞我确实让我生气了，便又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对您说话不够礼貌，望您包涵。大人不记小人过嘛！嘻嘻！”

我知道，“请家长”是教育者最无奈的表现。但对王铜，我确实有些束手无策了！

不久，在一次语文课上，他又一次和我发生了冲突。

讲完《雨中登泰山》，我布置学生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和爸爸妈妈一起到公园游玩，然后完成一篇写景作文。为了让家长配合，我口授了一封给家长们的信，我一边说，让学生们一边记。学生们都在紧张地记录，唯有王铜跷着二郎腿（这是他上课的一贯造型）摆弄他的什么小玩具！

我不得不停下来，批评他：“王铜，请拿起笔，认真记录！”

“我记下来了！”他坦然回答道。

我一惊：他明明没动笔嘛！便问：“你记在什么地方的，给我看看好吗？”

他用手指指脑袋：“我记性好，记在这里边了！”

学生们一阵哄堂大笑……

我对他自然又是一阵声色俱厉的“臭骂”。

恰好那堂课结束后，就是为校庆照全班集体像。我将大家编好队，然后反复告诫学生：“注意，按快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同时笑——也不能笑得太过分了，总之要自然。”

这时，站在最后一排的王铜突然向我走来。刚才上课他太让我生气了，现在看见他就烦，便没好气地问他：“你又要干什么了？”

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李老师，你对大家说，叫大家在按快门的时候，一起说‘茄——子’，这样照出来的效果一定会很好。”他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真挚，不，甚至是无邪的天真！

我一下竟有些感动：他毕竟还是个不失纯真的孩子啊！

后来在我们那张齐声“茄——子”的合影上，果然所有人都笑得很整齐，也很“自然”。

现在回忆起来，即使是在王铜最“混蛋”的时候，他让我感动的时候也不止一回。

有一次，我谈到社会风气不好时，教育学生们应该具有一种正气，并说现在患“软骨病”的男人太多，因而真正的男子汉太少了。学生们都听得很认真，连王铜也很专注地凝视着我。

第二天早晨，王铜一跨进教室，便递给我一张报纸：“李老师，您给同学们读读这篇文章吧！”我一看标题：《正义呼唤男子汉》，我心里一热：看来昨天我的一番真挚打动了王铜的心灵！

我在班上读了这篇充满正气的文章，并特意说明这是王铜推荐的。

从这件事上，我窥见了王铜心灵深处正直品质的萌芽：他愿意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不过，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对男子汉的理解可能太肤浅也

太片面了：以为粗鲁、不受约束、敢于顶撞就是“男子汉”。

遗憾的是，王铜这样的思想火花太少了。

更多的时候，是王铜和我也和班集体的碰撞：几乎天天迟到；除数理化课之外，其它课差不多都睡觉（尤其是政治课，有一次鼾声大作以至压倒了老师讲课的声音）；也有上课不睡觉的时候，那多半是在和其他学生谈笑甚至打闹；仅因不交语文作业，就被我多次批评……

他特别爱发出一些“奇谈怪论”，而且常常和我顶撞，因此，班上同学都称他为“持不同政见者”。

说实话，有时他与我强词夺理时，我真恨不得扇他一耳光！

但静下心来一想，他又和一般的“捣蛋大王”不同。首先，他对数理化，特别是对物理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就是说，他有着较强的求知欲（虽然相当偏科）；其次，虽然他常常与集体作对，其实他也有一定的集体荣誉感，比如运动会他主动报名参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第三，他心胸很宽阔，不管我怎样批评他，他从不往心上记；第四，他讲义气，这种义气有时表现为正气。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初一同学被初三学生欺负，他走过去就给那个初三学生一耳光。

显然，他是具备成为品学兼优学生的良好潜质的。问题在于，他不愿受任何纪律约束（所以常常无视班规校纪），一切都凭自己的兴趣（所以只愿意在自己感兴趣的学科上下功夫）。

他的独特性正在这里：既不是痞子似的“差生”（因为他学习成绩不错，而且毕竟还有一定正义感），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优生”（因为他的行为习惯实在太令人头疼）。如果引导得好，他将出类拔萃；如果顺其自然，他将很难成才，甚至危害社会。对于教师来说既要适应其个性，又要让他懂得遵循必要的规章制度；既要鼓励他在某些学科上拔尖，又要引导他全面发展——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个性教育的意义及乐趣也正在于此！

高一结束时，我给他的评语是这样写的：

毋庸讳言，在高一年级你犯的错误不少，常挨批评，但你身上的优点仍然是引人注目的：关心热爱集体，并以自己的体育特长为班争光，有一定的正义感（前次为我推荐一篇呼唤男子汉的文章就是证明）；虽有时与我顶撞，但过后能认识错误，并不记恨老师，反过来安慰余怒未息的我“大人不记小人过”。……你最大的弱点是至今很不成熟：把纪律当成是对自己的约束而未把它当成是自己的行为规范，学习凭兴趣而不是凭志向。不能说你不聪明，但我担心，你老不成熟，很可能“聪明一时，糊涂一世”。我多么希望你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李老师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啊！

其实，反思我对他的教育，也不是没有教训和失误的。最大的教训就是，整整一年，我和王铜还没有建立起像我和黄金涛那种彼此信任的感情；其次，我对他批评责备过多，这也使他对存有抵触情绪；另外，对他的学科成绩我“一刀切”要求全优，这显然不太符合他的实际。

进入高二后，我决定改进方法，真正在王铜身上体现出教育的个性。

开学后，我从分析他的学习成绩入手，找他谈了一次心。按他的智力和学习基础，本来应该在班上获得第一名的，但第一名却是班上一个叫陈峥的女同学。“你的主要问题一是学习不够刻苦，二是偏科。”我对他说。

一贯自负的他，居然败在他多少有些瞧不起的女同学手下，他也感到不

好意思。在这次谈心过程中，他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在学习成绩上来个飞跃。

“那么，你要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首先是遵守课堂纪律。你看人家陈峥是怎样学习的？”我又有意拿陈峥来刺激他。

“还有，不能偏科。”我又说。

听了这话，他表示为难：“我对语文等学科不感兴趣，因此以前没学好。现在要让我一时突上去，恐怕有困难。再说，我对物理太感兴趣了，忍不住把精力往物理上倾斜。”

“这样吧，”我说，“数理化 and 外语，你必须达到门门优秀，考试成绩必须达到 85 分以上，物理应该达到 90 分以上；语文我只要求你不低于 75 分；政治、地理等学科，你不应该低于 70 分。这样，既有重点，又比较全面。怎么样？”

“太好了！”他高兴地说。

“还有一条，凡有数理化竞赛你都必须给我拿奖！”

“没问题！”他信心十足。

我又说：“我知道你爱好田径，爱打篮球，这很好。我支持你，如果愿意的话，我给体育老师说，让你参加训练。但是，不能因此而影响学习！”

他喜出望外：“谢谢李老师！”

在一次作文中，他写到了这次谈话，说是他的一个“新起点”，并“非常感谢李老师朋友般的理解”。

星期六到了，我约上王铜、黄金涛等同学到我家做客——说是“家”，其实就我一个人，因为我爱人孩子还没有到成都。

在我空旷的单身宿舍里，我和一群学生们一起包饺子吃，大家海阔天空神聊一通。此时，王铜一点没有了桀骜不驯的气息，完全像一个天真可爱又有点调皮的小男孩——他玩扑克牌时输了，便老老实实地按规矩钻了两回桌子！在大家善意的笑声中，他也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我明显地感觉到，王铜正在感情上和我靠拢。

学校分了一套新房子给我，王铜听说后，主动要求帮我搬家。我同意了。于是在一个星期天，他一大早就来到我的宿舍。

在卸木床的时候，需要一把锤子，可我没有。王铜说：“我到学校木工房去借！”便飞快地跑了。

等了好久不见他回来，我便前往木工房去看个究竟，远远就看见王铜低着头站在木工房前，总务主任正在严厉批评他。

原来，王铜来到木工房一看，门是锁着的，他使用砖头砸开窗子翻了进去。待他提着锤子从砸坏的窗子往外跳时，恰好被路过此地的总务主任“现场抓获”！

主任听说是我的学生，便说：“好，让李老师好好教育教育！”便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补了一句：“砸坏的窗子，得赔偿！”

这是一个典型的“王铜式的错误”或者说“王铜式的好事”——为了做好事，竟去干坏事；通过干坏事，来达到做好事。面对王铜闯下的这个祸，我真是哭笑不得！

我批评了他，他没有和我顶撞，反而说：“我来负责赔偿吧！”

“这怎么可能呢？你是为我而犯错误的啊！”后来我付了赔偿金。

这件事使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意识到，我已在感情上“征服”了王铜。

但很快我就觉察到，王铜的感情绝不仅仅属于我：他居然“早恋”了！我是从一次周末晚会时，同学们对王铜起哄声中发现这一动向的。

那次周末联欢会，我即兴出了个游戏节目：要求同学们把外套脱下来堆在教室中央，然后把灯关了，让大家去乱抢外套来穿上。等灯重新打开时，学生们互相看着彼此“乱穿衣”的狼狈相，都忍不住笑出了眼泪。

在一片欢笑声中，大家对王铜的评价弦外有音：

“耶——王铜如愿以偿！”

“哈哈！王铜肯定是有意选这件漂亮外套穿上的！”

“嘿嘿！王铜，舒服！舒服！”……

王铜穿的是一件大红的紧身高腰外套，领子上还绣着朵朵色彩绚丽的碎花。这漂亮的外套套在高大魁梧的王铜身上，当然十分滑稽！但是，同学们的起哄似乎更在于这件外套的真正主人。

这是时燕玲的外套。

当时，王铜的尴尬和时燕玲脸上的红晕，便暴露了他俩的所有秘密。

难怪有老师给我说，常常发现王铜放学后和时燕玲一起在学校外面散步；难怪时燕玲的家长曾向我反映，常常有一个男同学给时燕玲打电话；难怪有一次自习课，王铜竟私自换座位去挨着时燕玲坐；难怪有一次组织看电影，王铜和时燕玲都“请假”……

时燕玲的智力不如王铜，王铜即使是边玩边学，成绩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可她则不同了，学习老上不去，不能说与王铜的过分交往没有关系。

我把王铜找来谈心时，他不承认与时燕玲有那种“特殊关系”；我找时燕玲谈心，她也是矢口否认。

一次，我从教学楼前的大厅穿过，一转弯，就看到王铜和时燕玲在不远处的一角神秘地说着什么。王铜突然发现了，条件反射似地从时燕玲身边跳开，装作也刚好从这儿走过的样子。等他走近我了，我只说了一句：“男子汉敢做敢当。做了的事又不敢承认，算什么男子汉？”

这句话显然击中了他的要害，他没有顶撞我，还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决定在全班学生中开设题为《健康地跨进青春的门槛》的讲座，正面引导学生们正确对待自己生理心理的微妙变化，也从侧面给王铜和时燕玲敲响警钟。

我把有关心理学的知识融入学生的实际，并结合我中学时代的一些经历，向学生们讲述“早恋”和“爱情”的青春话题。讲座以后，不少学生在周记中向我诉说了他们的烦恼，并感谢我给了他们及时的帮助。

时燕玲的周记回避了这个敏感的话题。

王铜的周记却第一次向我袒露了他的心迹。他说他很矛盾，一方面觉得“早恋”并不影响自己的学习，而且还可从中获得感情的慰藉；另一方面，觉得李老师说的有道理，年纪轻轻就把精力花在这方面实在不值得。最后，他说“我希望和李老师作一次朋友般的谈心”。

有了讲座和周记的铺垫，我和王铜的谈话就开诚布公得多了。

我问他是不是现在就决心一辈子和时燕玲生活在一起，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这怎么可能定得下来呢？将来的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啊！我说，既然如此，你这样下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你的学习基础好倒问题不大，可时燕玲却被这“感情”害苦了——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他不说话了。

于是，我把话题引向他最感兴趣的“男子汉”：“我知道你是希望自己

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但小小年纪就这么唧唧我我的，算什么男子汉？常言道‘男子汉志在千里’，可你连中学时代这一步都还没跨出去，就陷入了感情的泥潭，还谈什么‘志在千里’啊！王勃诗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我想，这‘歧路’也是指人生之路。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很难有什么结果的感情交往上，这样做，对自己的前途对别人的前途太不负责任了吧！”

那天的谈话很长很长，涉及面也很宽很宽，我谈得很动情，王铜听得也很感动。他后来也承认：“我不过是她闹着玩的。其实，我还真没有那种感情。”

“那你不是就太荒唐了吗？”我批评他。

谈话结束的时候，他提出一个问题：“要我一下子就冷淡她，我恐怕做不到。”

我说：“没叫你冷淡她。都还是同学嘛，为什么要互相冷淡呢？但是，你不应该再和她偷偷摸摸地搞什么‘约会’了。”

“可是，如果她要来找我怎么办呢？”他问。

“笑话！你顶撞老师的勇气都有，居然连回绝她的约会都不敢吗？你可是堂堂男子汉啊，我的王铜！”我又用“男子汉”来激他。

我并不指望通过几次谈话，就把王铜心中的感情杂念彻底清除。我还辅之以其它的教育方式——在找王铜谈心时，我还多次找时燕玲谈心，只不过我对时燕玲的谈心要委婉得多。在我的暗中“煽动”下，王铜被选为班委会学习委员，大量的工作占据了他大量的课余时间；我还给他推荐了不少名人传记，扩大他的胸襟与视野……

大概一个月以后，他完全和时燕玲断绝了“非正常往来”。

直到最近，他来看我，谈到高中时的这段经历时还说：“那是我的思想十分混乱的时期，头脑特别不清醒，是非不明，极为幼稚可笑！多亏李老师及时帮助啊！”

现在想来，我之所以能够同他进行坦率甚至有些尖锐的谈心，前提是他已经和我有了比较深厚的感情基础；若在高一时就和他进行这样的谈话，是不可设想的！这再一次证明：师生间的感情，是教育成功的第一块基石。

在我看来，要使王铜在同学中“重塑形象”，除了提醒他努力战胜自身弱点外，还应该细心发现他的可贵之处并及时表扬。

有一次批改作文，我发现王铜特意把他的作文本折了个记号，大概是提醒我重点看一看吧。我仔细一看，竟很感动。在这篇作文中，王铜写了不久前发生在历史课上的一件事：当老师讲到中国近代史上最耻辱的一页——鸦片战争时，同学们都义愤填膺，有一位女同学却在下面悄悄地玩电子游戏机！王铜写了这件事后，愤然写道：“作为一个中国人，面对我们祖国过去的耻辱历史，居然在一旁悠哉游哉地玩电子游戏机，这真是一种悲哀！如果我们今天的中国人都像这个女同学一样麻木，那么，在祖国的土地上重演鸦片战争的悲剧，是完全可能的！我希望每一位当代中学生，不要把爱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在行动上，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学习上！”在作文的后面，王铜还专门注明：“请李老师一定在班上念念这篇文章！”

我在班上郑重读了王铜的这篇作文，学生们在对个别同学的行为感到气愤的同时，也为王铜真诚的爱国心而感动。

在这篇作文的后面，我批道：“我高兴地看到，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正在

走向成熟！”

春游银厂沟的路上，王铜的男子汉血性，再一次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

那天晚上，我班夜宿都江堰市某宾馆。正当我在五楼和几个学生玩扑克的时候，忽听楼下有人争吵，好像是王铜的声音：“老子和你们拼了！”

我连忙跳下床往楼下跑去，迎面看见王铜正往楼下冲，我一下子跑过去抱住他：“冷静些！王铜，什么事？”

旁边的张辛同学被打了一耳光，脸上指印赫然，他对我说：“刚才有几个喝醉了酒的地痞进来肇事，借口说我们往外面扔杂物打着他们了，进来就给我一耳光！当时王铜在隔壁房间，听到动静后就过来和他们讲理，那伙人就打王铜，王铜便和他们搏斗起来……”

我问：“那伙人呢？”

“刚刚走，可王铜还想追上去教训他们……”

我看王铜，果然脸上有被打过的伤痕。

王铜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边怒吼一边挣扎：“放开我，放开我！老子今天和他们拼了！”

我死死抱住他的腰，喝道：“王铜！你就听我一句话！你想拼命？拼得过这些流氓吗？”

我惟一的念头是：制止事态继续扩大，保护学生不再受伤害。

我对他说：“我非常赞赏你的勇敢。但是，这不是拼命的地方啊，而且，即使拼了命也不解决问题啊！”

王铜的情绪渐渐平息下来了，我连忙去宾馆保安部反映情况……

春游回来后，不少同学在作文中赞扬王铜的“见义勇为”，我把这些作文一一给他看，他居然还在叹惜：“唉！要不是李老师您把我抱住，我非追上去捶那几个人不可！”

王铜的学习成绩也比过去大有进步，在一次半期考试中，他终于超过了陈铮。他还分别参加了几次省市级的物理、数学和化学竞赛，均取得很好的名次。

令我感到高兴的是，他开始对语文学习感兴趣了。一次，他特意找到我，说他的作文不行，问我怎么办。我想了想说：“我有个主意，但不敢对你说，怕你不愿照着做。”

“说，快说！”他急了，“我一定照办。”

我叫他每天写一则300字左右的人物肖像，就写班上的同学。写好后，不注明写的是谁，然后交给我批改；我批改的时候，便根据他的描写猜他写的是谁，再把答案写在他的作文本上。

“好！我一定认真写。”

于是，他每天都给我交上一篇“人物肖像描写”。我按事先说好的办法，认真地给他批改，认真地判断所写的人物是谁。他根据我判断的正误，就知道了自己的观察是否准确、描写是否传神……

每个同学的肖像都写完了以后，他的人物描写能力大大提高。

在高二下学期，他在纪律、学习和行为习惯方面的进步更加稳定了。也可以说，作为男子汉，他更加成熟了！

高二学年结束前，班委会换届选举。这次，王铜勇敢地走向讲台：“我愿意在高三这个学习最紧张的学年担任班长，为同学们服务。恳请每一位同学都投我一票！”

结果，王铜如愿当上了班长。

后来，我在他的一篇题为《家庭“维和”行动》的作文中，才知道他为了当这个班长，还巧妙地平息了一场“家庭风波”呢！王铜在作文中写道：

这一天，我放学回家比平时晚了一些。推门一看，爸爸、妈妈正在为什么事生气，脸色很难看，家里出现了少有的沉闷气氛。

他们究竟为什么生气呢？我不好问，便独自一人进了我的房间。

这时，传来了爸爸妈妈的争吵。“孩子到高三了还当班干部，肯定要影响学习。”这是妈妈的声音。“不会的，”爸爸说道，“这正是他一次难得的锻炼的机会。……”

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他们在为我当班长这件事争论。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我想：爸爸是赞同我的，只要把妈妈说服，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于是，我有了一个“解决矛盾，恢复和平”的方案。我先借楼上赵叔叔的名义，对爸爸说：“爸，赵叔叔找你有事儿！”边说边向他挤了挤眼。真是知子莫若父，爸爸心神会地向楼上走去。随后，我又跟着妈妈来到厨房，给她打下手。当妈妈炒好第一道菜时，我猛吸一口气，赞叹道：“真香啊！”妈妈笑了笑，我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问道：“妈妈，你上中学时是学习委员吧？”“不对，是宣传委员。”妈妈纠正道，“而且从高一到高三都是。”看来，我已成功地唤起了妈妈对中学时代的回忆。接着，妈妈又非常自豪地说：“我那时每次考试都是班上的前三名！”我又问妈妈：“你看我现在的成绩比你那时如何？”“嗯，差不多快赶上我那时的水平了。”妈妈毫不谦虚。“那为什么你高三当班干部不影响学习，而我就要呢？”我单刀直入，挑明了关键。妈妈一时愣住了，无言以对，她没想到我巧妙地让她来了个自相矛盾。最后，她说：“好吧，不过你一定不要松懈。”我高兴地点了点头。

进入高三，王铜对我提的第一个要求是：“安排我和陈峥坐在一起吧！我想好好跟她学习学习。”我虽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但我表扬了他的上进心。要知道，过去谁都瞧不起的他，现在竟然主动拜一个女同学为师，还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呢！一开学，王铜就进入了班长角色。他的倔强和桀骜，过去常常成为他违纪的性格原因，而现在却成了他作为一个班长的独有风格或者说特殊气质——谁要是违反了纪律，王铜那魁梧的身躯和咄咄逼人的气势便让违纪者心虚了三分！请看一位学生对晚自习的描写：

和往常一样，刚到 6 30，教室里便坐满了同学。已形成习惯了，当老师辅导结束离开教室后，同学们便自觉地自己学习起来。虽然没有老师在场，但整个教室都安安静静的，毕竟高三了嘛！

可是，过了不久，后边角落出现了极小的议论声，大概是在讨论什么难题吧。声音渐渐大起来，而且又有同学加入了讨论。受到干扰的同学都忍不住转过头去用不满的眼光看着他们。

这时，王铜的声音响起了：“请自觉点！”他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特有的威慑力量。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就让刚才越来越热烈的讨论和议论小声了许多。然而，仍然还有两个同学在悄悄讨论，而且还发出了笑声！突然，“砰”的一声巨响，王铜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愤怒的眼睛直视那两个同学：“你们想干什么！”

面对王铜的“铁腕”，那两个同学再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教室里又恢复了宁静。也正是靠着这种“铁腕”，在我一次外出开会的

一周里，王铜在班上担负起了班主任的工作，把班上各方面管理得井然有序。我回到学校的第一天，王铜特意到办公室来找到我，调皮地硬拉着我的手往教室走去——在教室黑板旁的墙壁上，赫然挂着三面流动红旗：“纪律流动红旗”、“卫生流动红旗”、“课间操流动红旗”！

王铜当然不仅仅有“铁腕”，更多的是一颗热爱集体关心同学的善良之心。他经常在班上组织学习经验交流活动，把自己的学习方法和一些学习资料介绍给同学们；他经常耐心地帮助一些学习成绩暂时不理想的同学；一位同学病了，他主动帮他抄课堂笔记；在一次春游中，一位同学身体不适，王铜一弯腰便把他背了起来……

枯水季节，电力供应不足，常常在上课的过程当中，突然停电，教室一片黑暗。这时，往往是王铜和李海华（也是一个非常关心集体的同学）最先跑出教室，到办公室点燃汽灯，把光明重新带到教室。而那汽灯又不争气，特别容易坏，有时点燃竟需要一节课的时间。于是，王铜经常是早早来到学校，同学们点着蜡烛上第一节课时，他还在办公室修理汽灯。久而久之，他竟成了一名熟练的“汽灯修理工”！

有一次晚自习，我到班上去点名，想不到就差王铜一人。足足 15 分钟以后，他才走进教室。我一下火了，当着全班就狠狠地呵斥他：

“怎么来迟到了？你这个班长就是这样起带头作用啊！太不像话！”

他低着头，没有半句辩解。

刚过了半个小时，教室里的灯便熄灭了——又停电了！

这时，照例又是王铜走了出去，显然是去点汽灯了。我知道汽灯早就坏了，修好、点燃至少得半个小时，于是叫学生们出去休息一下。学生们都不大愿意出去，他们抱怨着：“还有那么多作业！”“烦死了，这个鬼电！”……

然而，仅仅过了 1 分钟，王铜便提着明晃晃的汽灯走进了教室，同学们忍不住欢呼起来，向王铜投去感激的目光。我很纳闷，问王铜：“汽灯什么时候修好的？”王铜回答：“就是刚才上课前。我估计今天晚上可能要停电，就……”

我一下明白了：刚才王铜迟到，是因为修汽灯啊！一种内疚和感动同时涌上心头。我的眼前叠现出刚才王铜挨批评时低着头的形象，和两年多前他在政教处时那蛮横的神态……

高三毕业前夕，学校给了我班一个市级三好学生名额和一个区级三好学生名额。按招生规定，市级三好学生将享受高考加分的待遇，而区级三好学生则没有这个“优惠”。

投票选举结果，王铜得票最多，李海华名列第二。

放学后，王铜找到我，提出把市级三好学生的名额让给李海华。他真诚地说：“李海华一贯表现比我好，同学们写作文都称他‘人民的勤务员’，而我不过是高三当班长才做了一些我本来就应该做的事。另外，我的学习成绩比他好，不需要任何加分，我想我凭实力有把握考上重点大学；让李海华去享受加分待遇吧，这样他上重点大学更保险一些！”

此刻，很难用什么语言表达我对王铜的敬意……

也许在其他人眼里，后来王铜收到的“中国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是他高中生活的完美句号；而在我心中，王铜主动把市级三好学生的荣誉让给其他同学，这才是他高中生活也是我对他三年教育的辉煌叹号！

爱心与教育

教师要尽力使自己具备“学生的心灵”——用“学生的大脑”去思考，用“学生的眼光”去看待，用“学生的情感”去体验，用“学生的兴趣”去爱好……

手记四：回答心灵的呼唤 ——青春期教育的尝试

不堪重负的心灵

“老师讲的不是我们想的，我们想的，恰恰没人回答！”《北京青年报》上一位中学生这发自肺腑的声音，代表了许多中学生对目前学校教育（特别是德育）的看法。

老师因自己传授的思想遭到学生反感而十分伤心，学生因自己关心的问题得不到老师的解答而万分苦闷。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双方都感到离不开对方，然而现在却失去了对方！

这正是德育的危机之一，也是德育的转机所在——对处于主导地位的教育者来说，回答学生所关心的问题，找回失去的对方，正是改革班主任工作的一个突破口！

究竟什么是学生最急于解答而往往“没人回答”的问题？对此，我曾在我自己所教的高一新生中进行了一次调查。

调查题：除了学习以外，目前你还有哪些最关心的问题得不到解答？

调查结果：47名学生共提了106个问题，内容涉及人际关系、心理保健、性知识教育、宗教信仰、职业选择、国际政治、与父母的关系、自我评价、社会风气、男女感情、人格塑造、哲学流派、环境保护、生与死等方面，而这些几乎全是当时学校教育内容的空白！

现摘录其中一些片断如下：

——好不容易考上重点高中，我却有了一种失落感，茫然不知所措，甚至莫名其妙地自卑，这到底为什么？

——我最想知道怎样搞好与父母的关系，有时明明是他们错，我稍微申辩一下，他们便说：“翅膀长硬了，连父母都要顶撞！”他们对于我的日记、信件很敏感，老是喜欢趁我不在的时候偷看，我很反感，干脆断绝了一切通信联系，也不再写日记。我真想与父母搞好关系，可是不知该如何着手。

——老师总是说社会上主流是好的，可现实生活中，我老是感到不好的是多数，这是怎么回事？

——我很想知道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是什么样子。

——近来不断听说有学生自杀，其中好些都是高才生，他们比别人成熟得早，更早接触和认识社会。我想知道，他们成熟得早是否好事？他们成熟了，有思想，认识了社会，却跑去自杀。而那些成绩不太好、思想不“复杂”的人，却无忧无虑，生活得平稳。究竟谁好？

——社会上“开后门”、拉关系成风，老师说这是不对的。我的爸爸妈妈也常常“开后门”，但他们确实是善良的人，迫不得已才这样做。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种现象。以后我参加了工作又该怎样对待“开后门”呢？

——现在很多同学比较讲究穿着，还爱谈论某人长得怎么样，大家对这

些问题好像特别感兴趣。这是为什么？

——我很想与男同学建立一种非常真诚，又绝不是爱情的友谊，但不知道怎样注意分寸，怎样去交往。

——我想知道人体上的一些秘密，但《生理卫生》上介绍得很肤浅，又找不到这类书。

——我很想了解有关宗教的问题，为什么法律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可老师又不赞成我们去教堂，书店里也不卖类似《圣经》一类的书？

——人为什么要活着？古猿为什么要变成人？人死后是否就要到阴间？人要不死该多好。

——我常常感到孤独，真想偷偷大哭一场。不知为什么？

——我感到生活中处处是矛盾，为什么现在我国社会生产发展了，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淡薄了，各种歪风邪气、腐败现象更加猖獗了？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

一颗稚嫩而纯洁的心，竟然承受了这么多这么沉重的问题，该是多么的忧虑！如果这些烦恼憋在心里得不到排遣，那就更加苦闷了；若这些苦闷不但得不到老师的理解而且还受到责怪，那简直就是痛苦不堪了！

一位外地中学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那么多的政治课、班会课、团组织生活，可从来不愿谈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这些问题一般也不愿问老师。有一次，我憋得受不了，鼓起勇气找班主任，他听了我的叙述，便给我讲了一大通‘要有远大理想’、‘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你的苦闷难道还有张海迪遇到的困难大吗’‘看问题要全面嘛’之类的套话，真是烦死人！更气人的是，几天后的一次班会课上，班主任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些同学缺乏远大理想、心理灰暗、思想不够健康’……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

面对这位中学生的苦恼，我感到悲哀：莫非我们的教育真的束手无策？

面对千千万万中学生不堪重负的心灵，我们教育者应该感到惭愧！

负重的心灵向谁求救？

一名优秀的教师应该同时又是一名出色的心理学家。

目前教育最缺乏的内容之一便是心理教育——虽然近几年许多学校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但比起广大中学生的心灵需求，还是远远不够的。不少教师仍然习惯于把学生的心理疾病、性格弱点，当做“政治思想”、“道德品质”问题来解决，或热情地教育，或严肃地批评，这些“牛头不对马嘴”的思想工作怎么会奏效呢？

被教育者感到了一种精神空虚和人生危机，本能使他们寻求急救。于是，街头书摊上各种各样良莠不齐的“心理保健”、“人生指南”之类的书籍，便成了他们颇感兴趣的读物——《你的误区》、《自卑与超越》、《生存空虚说》、《感悟人生》、《滋润心灵》、《EQ情商》、《心灵鸡汤》、《情感鸡汤》……

“李老师，我给您看一本好书。”学生递给我一本薄薄的《人性的优点》，一百来页的书已被翻旧，上面还密密麻麻写满了批语。该书作者是美国一个叫戴尔·卡耐基的人。

我惊异于学生在如此繁重的课业重压下，居然还有时间看这些书。

学生却回答：“这本书能教给我课本上没有的知识——怎样处世。”

我曾见到在公共汽车站牌下，几位等车的中学生在进行一场自发的讨论

——
“‘没有人去踢一只死狗’！卡耐基这种对待流言蜚语的态度真是绝了。哎，这算不算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呢？”

“以往我总觉得说别人的好话就是在奉承人家，对别人的长处总是不服气。其实真心地对别人说一些赞美的话又有何妨？别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听到你的真心赞美而对你有好感。”

“要使别人做什么事，就要让别人对你的问话或要求尽可能答‘是’。据书上说这是一种心理学原理。也就是说，要尽量让别人考虑做这件事对自己的好处——这一点似乎有些自私，但就心理满足而言，也不无道理。”

“读卡耐基的书，感觉是实在，仿佛刚同作者进行了一次交谈。让人看完之后有种强烈的‘试一试’的愿望。”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书，我们老师不讲。”……

我并不简单地否认《卡耐基成功之路》、《心灵鸡汤》之类读物的确有不少合理的“人生忠告”，但这些外国畅销书未必真正适合中国的国情，更不用说中国学生的心灵实际了。这几位学生的言论显然片面、偏激，然而从中可以得到一个令教育者不安的明确信息：当我们这些号称“灵魂工程师”的人不能关注学生的灵魂时，他们渴求援助的灵魂便只有自己拯救自己了！

谁说现在的学生逆反教育、拒绝帮助呢？关键是这种教育与帮助是否充满真诚、贴近实际、深入心灵。

我又想到了“素质教育”。既然教会学生学会做人，是素质教育的首要任务，那么优化学生的心理素质不也是素质教育应有的义务吗？学生青春期心理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促进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形成，预防和消除一些不健康的心理现象，为学生知识的获得、智力的开发、优良思想品德的形成、人格的健全发展提供良好的心理基础，并起到积极的推动调节作用。

看来，单纯而孤立地对学生进行政治引导、思想教育、品德培养、知识传授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关注处在青春期的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别是他们在知识、情感、兴趣等一系列心理状态上的变化，并予以主动积极的辅导。只有这样，教育才能真正深入每一个学生复杂多变、奇妙无穷的心灵，而教育者才真正无愧于“灵魂工程师”的称号。

心理教育的途径与形式

说到“青春期心理教育”，不少人便以为只是“性道德教育”或“爱情教育”，而一提到“性”与“爱情”，一些家长、教师惟恐避之不及。这实在是一种狭隘的认识，至少是一种误解。我们所理解的“青春期心理”，主要是指面临“第二次断乳期”的中学生所具有的所有心理现象、心理特征和心理状态（包括他们开始萌发的性意识，但远远不只这点）。因此，“青春期心理教育”就是根据中学生心理、生理的特点，有针对性、有计划性地对他们进行心理卫生的保健、心理品质的培养，帮助学生健康地度过青春期，顺利地“完成人的第二次诞生”。其内容主要有：中学生一般心理介绍，爱情与性道德教育，改善人际关系指导，学习心理的优化，心理疾病的防治，优良性格的培养等。

心理教育（也可简称“心育”）的途径与形式，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创设和谐氛围

氛围的和谐有利于心灵的舒展、愉悦，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具备了舒展、愉悦的心灵，教师的心育便成功了一半。所谓和谐氛围，主要指师生之间的和谐关系与班级内部的和谐环境。

1. 建立师生和谐关系

青春期教育是心灵对心灵的启迪，精神对精神的感化，而离开了和谐的师生关系，“启迪”与“感化”便只是教育者的一相情愿。相反，如果教师对学生具有了真诚的信任与尊重，学生就会感到一种人格的尊严，他们的自卑、自私、孤独、胆怯、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就会大大降低。一旦学生对教师产生了朋友般的信赖，他们就会主动地向教师敞开心扉，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这就有利于教师随时了解学生的心灵，及时帮助他们解除心理烦恼。因此，班主任对学生的心育要从与学生建立和谐的关系入手。

怎样建立师生和谐关系呢？首先要端正对学生的看法。我们应认识到自己的教育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年龄虽小，但也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师生关系不是皇帝与臣民的关系，不是警察与小偷的关系，不是医生与病人的关系，而是平等、尊重、信任的朋友关系。其次，要注意平时的感情投入与积累。要善于在与学生一起活动、一起神吹海聊、一起嬉笑玩耍中自然而然地感受他们的心灵，同时，要尽力使自己具备“学生的心灵”——用“学生的大脑”去思考，用“学生的眼光”去看待，用“学生的情感”去体验，用学生的兴趣去爱好……最后，教师还应充分理解并尊重学生的一些独特的、奇妙的，甚至错误的想法，这并不是说教育者放弃自己的责任而一味迁就学生，而是要让学生在老师面前有一种人身安全感和思想自由感，不然，学生不愿对老师说真话，“教育”、“引导”又从何做起呢？

2. 造就班级和谐环境

心理学认为，人的情绪、情感或态度都是环境在个体身上的体现与反映。一般说来，一种环境或一些人如果能满足或符合我们的需要、观点与习惯，我们便会产生好感或积极的情绪，反之就会引起相反的情感。没有任何一种心理的内容不来源于外部现实，没有任何一种心理现象的产生不存在着客观的原因。因此，一个和谐的环境无疑有助于学生保持心理健康，形成良好的

心理品质，并且使可能出现的异常心理现象减少到最小程度。

造就和谐的班级环境，班主任至少可以做四方面的工作：一是教育全班学生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真诚友好的人际关系。既激烈竞争又携手共进，既和睦相处又诚恳帮助，既互相督促又彼此信任。这种和谐环境能使每一位学生的心灵都充满友情和温暖，使自私自利、钩心斗角、嫉妒猜忌等恶劣品质没有生存之地。二是提倡并鼓励男女同学正当交往，以打破男女之间的“神秘感”，满足青春期学生异性交往的心理需求，同时又减少“早恋”现象。三是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独特的长处，同时又看到其他同学的长处，从而使班上呈现人人自尊，同时又尊重别人的好风气，最终使每一个学生都树立起自己的尊严与自豪感，愉快地接受自己，充满信心地发展自己。四是组织各种有益有趣的课余活动，调节学生的紧张学习生活，使他们有一种集体自豪感和精神充实感，避免长期单调枯燥的学习给学生造成焦虑烦躁、极度紧张等不良心境。

开设专题讲座

开设专题讲座是一种集体谈话形式。班主任根据学生已经出现或将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将有关的心理学知识和心理保健方法传授给学生，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和科学地健全自己的心理素质。在开设专题讲座时，教师应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则：

1. 主动

青春期教育不是被动地解决学生已经产生的心理问题，而是在学生刚刚进入青春期时积极主动地发挥引导作用。因此，专题讲座应在学生进中学之初就开设，一直到高中毕业。通过这种集体谈话，教育学生正确对待、把握自己的青春期心理，以积极的思想准备去迎接并完成“人的第二次诞生”。苏霍姆林斯基在其女儿14岁生日时，曾给女儿写了一封长信，以亲切美好的语言向女儿讲述什么是“爱情”。这为我们每一位教育者做出了榜样。

2. 生动

一般来说，学生不喜欢听大报告。为了让学生乐意接受讲座内容，教师应注意讲座的内容与形式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尽量淡化讲座的理论色彩，避免把讲座变成纯粹的理论知识课，要善于把有关的道理与知识寓于亦庄亦谐、富有情趣的讲述之中，并尽量联系生活中的实例。总之，要让学生身心轻松地听讲座，使他们在听老师谈生活、讲故事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获得启迪。

3. 平等

学生在青春期出现一些心病，往往觉得难以启齿，特别是一旦产生了爱情萌芽或性意识，更是有一种负罪感。在这种情况下，居高临下的“严肃”教育，只会增加学生的苦恼与恐慌。教师应以朋友般的平等态度给学生以体谅，进而给予细心的开导，学生的心理负担便会减轻许多。教师如能推心置腹，谈谈自己在中学阶段的感受与经历，让学生感到老师和他们一样，也有过类似的心理历程，这样效果会更好。

4. 参与

专题讲座虽然只是班主任讲授，但也不应只是班主任唱“独角戏”，而应设法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在每次开讲之前，班主任应在学生中搞心理调查，让他们谈自己的心理现象。在讲授过程中，可组织学生围绕某个问题发言或

讨论。每讲完一个专题后，留点时间让学生提问，班主任当场解答；也可让学生把问题写在纸条上，课后个别回答或下次讲座时集中回答。让学生参与讲座，不仅能保证讲座的针对性，增强学生的兴趣，而且还能自然而然地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

进行个别谈话

个别谈话是青春期教育最重要、最广泛的一种形式。这里说的个别谈话是心理辅导，与单纯的教育性谈心不同。心理辅导的谈话具有两个特点：倾听与协商。

1、倾听

所谓“倾听”，就是说这种谈话不只是教师一人的“苦口婆心”或“语重心长”，而应该是尽量让学生倾诉、宣泄，教师则先当听众。心理学认为，一个人将悲伤、委屈、苦闷等情感通过向自己信任的人诉说而合理地发泄出来，可求得心理平衡，保持心理卫生。因此，心理辅导的个别谈话应先让学生讲，诱导、鼓励学生滔滔不绝、一吐为快。学生通过倾诉，把内心深处的困惑、焦虑、积郁、愤懑、悲伤等等表达出来，教师则以仔细聆听，并通过眼神和点头、蹙眉等体态语言告诉学生：“我是理解你的，你完全可以信任我，我愿意分担你的一切苦闷！”从而使学生无所顾忌地继续讲下去。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开初不一定愿意直接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时教师就要从学生欲言又止的神态或吞吞吐吐的只言片语中，猜测或推测出学生的真实想法，鼓励他们继续倾诉。善于倾听，也是一种教育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让学生倾诉而教师耐心聆听（包括听学生对老师的抱怨），这本身就是有效的心理辅导。

2.协商

所谓“协商”，是指教师倾听学生诉说之后对他的谈话，只是一种“仅供参考”的意见，而不是替学生作出选择与决定。这是心理辅导与单纯的思想教育的重要区别之一，也是教师在心理辅导过程中的身份——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育者，而是平等真诚的朋友——所决定的。这更体现了我们多次谈到的心理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一条原则：对心灵的尊重。因此，教师听完诉说之后，应避免对学生说：“我想，你应该这样……”或“我劝你还是……”而应该首先向学生表示感谢——感谢学生的信任；然后对他所谈的一切表示理解。即使学生说的是荒唐错误的想法，也要表示理解，这时的“批评教育”只会把学生心灵之门关上，让其永远不对教师说真话。接下来，便与学生一起分析、寻找有效的解决办法：“你是不是可以试一试？”“这样做，也许会有些作用……”教师的谈话，当然包含了对学生的引导甚至教育，但这不是强迫，而是充满关切的建议。

保持书信交流

对于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有时候交谈并不是心灵沟通的最好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书信便成了师生对话的合适途径。对学生来讲（尤其是对一些性格内向的学生），这样做既避免了面谈的局促不安，又能与自己信任的老师进行心灵的交流。对班主任来说，与学生建立并保持书信联系，意味着赢得了学生的信任，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的成功，更重要的是，通过师生书信往来，教师可以比当面谈话更全面、更真实、更细腻地感受到学生的内心世

界及其变化，从而更主动、更准确、更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

怎样与学生保持书信交流呢？

1. 巧妙联系

以了解思想和汇报思想为目的的师生通信，学生是不会欢迎的。因此，教师发出的第一封信，应避免容易引起学生反感或误会的内容，从学生最关心、最感兴趣的话题谈起。为了不使学生感到突兀，教师的第一封信还应该选择一个恰当的日子发出：或是这位学生生病在家的时候，或是他正为考试失利难过的时候，或是他的生日那天……只要对学生有充分的了解，就一定能找到发出第一封信的“借口”，并可以充满信心地等待学生的回信。

2. 内容不限

师生书信联系应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特别是对学生来说，他给老师写信，应完全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不是碍于老师的情面。而让学生保持与老师通信的兴趣与热情，教师要特别注意，不应对书信内容有所限制，相反，要尽量让学生有充分的思想自由，不断丰富书信的内容。学生在书信中话题越宽，越说明他对老师信赖，这样，师生的书信联系便越稳定、越持久。

3. 平等对话

与前面谈到的“个别谈话”一样，师生在书信往来中双方也是平等的。在书信中，学生可以向老师咨询，教师也可以向学生请教；教师可以向学生表达期望，学生也可以向老师提出建议。双方可以展开坦率的讨论甚至激烈争论，但都不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即使教师的回信是目的性很强的心理辅导，但字里行间仍然没有任何强迫接受的色彩，仍然只是一种来自朋友的诚恳交谈。

当然，让教师与班上每一位学生都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是不现实的；有选择地与某些具有特殊性的学生保持书信交流，却是可行的。因为对这些学生来讲，这也许是最有效的心理辅导。

推荐有益读物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推荐一些有益的书籍报刊资料，这也是进行心理辅导的有效方法之一。这些读物包括几个方面：

1. 心理学通俗读物。直接给学生推荐一些浅显易懂的中学生心理学读物，以提高他们认识自己、把握自己的能力。如《中学生趣味心理学》、《中学生青春期教育》、《青春期诱惑》、《磨亮女性智慧的利剑》等。

2. 关于个性塑造、交往艺术等方面的小册子。推荐这类读物的目的，是让学生从中借鉴一些改善性格、改善人际关系的具体方法，如《中学生丛书·性格集》、《性格与人生》、《克服性格弱点五十法》、《神奇的人生》等。

3. 中学生题材的文学作品。有选择地向学生推荐一些反映学生思想、感情、生活的小说、报告文学，通过阅读，使他们更容易潜移默化地受到感染与教育。如小说《青春万岁》、《早恋》、《危险的年龄》，报告文学《多思的年华》、《你在哪里失去了他》、《我们和你们》、《与当代中学生对话》等。

4. 优秀人物的传记。让学生读一些优秀人物的传记，使他们在钦佩杰出人物伟大品格、非凡意志、辉煌人生的同时，感到自己心灵的震撼与净化，这是对中学生的一种积极的性格培养和人格教育。

争取家长配合

父母与子女的特殊关系，确定了他们在青春期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实践证明，学生家长的参与是青春期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1、举办家庭教育讲座培训家长

在子女青春期教育的问题上，相当一部分家长的认识是糊涂的。他们往往以“保护子女纯洁心灵”为由，不愿积极主动地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一旦子女产生了某些青春期特有的思想意识，家长便简单粗暴地斥之为“胡思乱想”、“变坏了”等等。这样的家庭教育，直接危害子女心灵的健康发展。举办家庭教育讲座的目的，是改变某些家长的错误观念，让他们认识到青春期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还应向家长们介绍有关青春期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特征的知识，指导家长们科学、民主地进行家庭教育。

2、组织家长座谈交流经验

在本班家长中广泛征集青春期家庭教育难题后，召开家长座谈会，组织家长们围绕这些难题展开讨论，交流做法。也可以请在青春期家庭教育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家长作专题发言，介绍经验。教师还可以根据不同心理类型的学生，分别召开小型家长座谈会，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探讨。

3、指导家长与子女开展心灵对话

学生与家长存在着心理隔阂，是目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极不利于家庭青春期教育。因此，争取家长配合心育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帮助家长与他们的子女建立真诚的心灵交流关系。教师可引导学生经常与爸爸、妈妈说悄悄话、知心话，同时要求家长也放下长辈的“尊严”，以朋友的身份与子女谈心。班主任还可以利用“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14岁生日主题班会”等特殊日子，组织学生与家长互相通信，让两代人平等对话、增进理解。

4、与“特殊学生”家庭保持密切联系

教师在对学生集体进行心育的时候，应重点关注一些有异常行为、异常心理或心理疾病的“特殊学生”，并与这些学生的家庭保持密切联系。应定期向家长介绍其子女在校各方面情况，同时提出要求或具体建议，要求他们不仅要关心子女的生活，更要细心地观察、敏锐地感受子女在情绪、言行等方面的变化，积极配合学校教育。

心理辅导通信选

我是不是变坏了？

来信：前几天，我看一部外国电影，里面有不少男女拥抱接吻的场面，我看得很不好意思。不过说心里话，我又很想看。由此想到自己最近老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心境中：一方面不由自主地想看书籍刊物中的爱情描写甚至性描写，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太下流；一方面渴望与女同学有更多的接触，另一方面又努力克制这种愿望，表面上做出不屑与女同学交往的样子。我是不是变坏了？

（高一男生义强）

义强同学：

你的来信，使我想起了我中学时代的一件令我惭愧的往事。我读中学时正是“文革”期间。我担任班上学习委员，负责监督课堂纪律。一次，我发现一女同学上课时偷偷地看什么课外书。课后我暗中去翻她的书包，原来她看的是一本以前出版的《青春期卫生》。我翻了几页，里面的一些字眼使我脸红耳热。我当即向班主任打小报告，说这位同学看“黄色书籍”，可我又以“没收黄色书籍交给老师”为由，把那本小册子窃为己有，暗中阅读……

当时我是够“虚伪”的了。不过，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我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受的教育，使我真诚地认为那本小书是“黄色”的，作为班干部，理所应当地向老师反映；但自己身体的发育与心理的发展，又本能地想看看“黄色”的东西。对你来信所述，我可以这样说：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渴望了解性知识，是一种普遍而又正常的心理，与“下流”无关。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男女同学的身体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同学产生了“这是怎么回事”的疑问，并急于解答。同时，同学们对异性也产生了既有好感，又觉得羞怯的微妙心理。这种心理是中学生青春期性意识萌发的表现，是完全正常的；渴望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也是合理的。中学生获得正确的性知识，会促进性心理的健康发展，改变对性的愚昧无知状况，使自己对性成熟的生理、心理变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解除消极的心理反应，这不仅有利于现在的心理健康，而且对以后的性生理、性心理健康和性生活的正常发展，都将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义强，现在你不会认为自己变坏了吧？另外，我还要提醒你两点：一是正确的、科学的性知识，其来源应该是老师、家长的教育以及专门为中学生编写的有关读物（包括科普录像），而不应该是淫秽书刊、黄色手抄本以及不适合中学生阅读的读物；二是了解性知识毕竟只是你们目前应该掌握的知识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内容。所以，适当了解这些知识是必要的，但主要精力应该用于其他各门功课的学习，若一味迷恋于此，便是极不应该的了。

好，愿你消除负罪感，坦然地走向成熟！

男女同学交往引起别人误解怎么办？

来信：这学期，妈妈为我在少年宫业余艺校报了名，让我星期天去学舞蹈。碰巧我班有一位男生也在那里学书法。于是我们有时便一起走。几个星期过去，班上有同学便怀疑我们在“早恋”，有人还在背后议论我们“常常在星期天约会”……我很气愤，因为我绝对没有那种意思，我相信他也不会朝这方面想，可是，竟有人这样造我们的谣言。现在，弄得我俩都很尴尬，不知该怎么办？

（初二女生露玫）

露玫同学：

从你来信中所说的情况看，你和那位男同学是没有错的。本来嘛，一起在少年宫学

习，难免会接触得多一些。这种正当交往无可非议，你们完全可以坦然相处，不必尴尬。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对男女交往、两性关系既感到神秘，又感到好奇。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有一部分同学对异性同学之间的接触交往特别敏感，是很自然的。但过多地议论，甚至无端地猜忌，就不应该了。这会影响同学之间正常的交往，更给一部分同学思想上造成精神负担。因此，这些同学应停止这种无聊的议论，把时间与精力用于自己的学习。

露玫同学，既然你“绝对没有那种意思”，你就完全不必为此烦恼。你越是计较那些议论，越是感到不好意思，那些同学便会以为真有那么一回事。你问心无愧地做自己该做的一切，甚至装作没听见议论，过一段时间，也许那些爱议论的同学也会自觉没趣，不再议论了。

我认为，男女同学的正常交往应该是“等距交往”、“公开交往”和“坦然交往”。所谓“等距交往”，就是对班上所有异性同学都保持一视同仁的友好态度，除了临时的工作需要，尽量避免与某一异性的过多接触；所谓“公开交往”，就是尽量在公共场合与异性交往，如果有意避开其他同学，而长时间与某一异性单独往来，就难免引起误解；所谓“坦然交往”，就是与异性同学相处时，言谈举止保持自然大方，坦荡庄重，既不要过分亲热，也不必拘谨羞怯。我相信，同学们在与异性同学交往时只要注意这几项，即使有人议论，自己也尽可磊落为人，潇洒行事！

露玫，你认为我说这些对吗？不知我这封信能否使你的烦恼有所减轻。好，我真诚地希望你早日摆脱目前的苦闷，轻松愉快地生活、学习！

什么样的自我是最美好的？

来信：小时候我曾有过许多理想。读小学时，我家隔壁有一位很有名气的舞蹈家，于是我便参加了少年宫舞蹈训练班，想长大后也成为舞蹈家。上中学后，我读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又立志成为作家，还偷偷写过小说和诗歌。最近几年的改革开放，又使我崇拜一些著名改革家，并希望自己今后成为一名建功立业的改革家。现在我即将毕业，将独自踏上人生旅途，以前的理想却离我而去，可我仍在苦苦思考：怎样的自我是最美好的？

（高三女生姝洁）

姝洁同学：

面对你的提问，我的回答是：做一个最好的自己！

谁都渴望成为英雄豪杰、伟人巨匠，但受自身条件、社会环境等制约，真正成为艺术家、文学家、企业家的，只是少数。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也许永远成不了“家”，但通过努力，却完全可以成为最好的“我”。

有人说：“每个人都是一棵树。”的确，我们生活的世界像一片森林，其中有的人是乔木，有的人是灌木；有的人是参天的白杨，有的人是婆娑的杨柳。你即将毕业，可能升入大学，可能参加工作，而志愿与职业的选择往往不能取决于你自己。你以前的理想都是很好的，而现实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因此，问题不在于你“做什么”，而在于你“怎么做”——

你也许不是最美丽的，但你可以最可爱；你也许不是最聪明的，但你可以最勤奋；你也许不会最富有，但你可以最充实；你也许不会最顺利，但你可以最乐观……因此，你若是工人，就要当技术最出色的工人；你若是营业员，就要当服务质量最佳的营业员；你若是医生，就要当医术最高明的医生；你若是教师，就要当最负责的教师；甚至你只是一名“个体户”，也要当最受顾客称道的劳动者！你也许不能成名成家，不能名垂青史，但你可以成为同行业中千千万万普通人里最好的那一个！

一位外国诗人曾这样写道——

如果你不能成为山顶的一株松/就做一丛小树生长在山谷中/但须是溪边最好的一丛
小树/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大树。/就做灌木一丛

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丛灌木，就做一片草绿/让公路上也有几分欢娱/如果你不能成为
一只麝香鹿，就做一条鲈鱼/但须做湖里最好的一条鱼

我们不能都做船长，我们得做海员/世上的事情，多得做不完/工作有大的，也有小
的/我们该做的工作，就在你手边

如果你不能做一条公路，就做一条小径/如果你不能做太阳，就做一颗星星
不能凭大小来断定你的输赢/不论你做什么都要做最好的一名

姝洁同学，不管今后你从事什么，都让自己成为最好的吧！——做最绿
的小草，最纯的水滴，最亮的星星……

心灵，是这样打开的

作为班主任，没有比不了解自己的学生更痛苦的了。而只凭作文、日记、思想总结甚至谈心来了解现代中学生真实的内心世界是不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少学生对老师、家长逐渐关闭了自己的心灵。这除了与心理发展特点有关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对师长们的不信任。12年前，我教初二时，有个叫洪菁的女生曾在周记中愤愤地写道：“我讨厌师长们！……如果世界上只有我的同龄人，大家都是平等的，该多好啊！”可见，师生之间保持人格上、思想上的平等，是产生信任的基础，而离开了信任，则谈不上真诚的思想交流。

洪菁是一个天资聪明、思想早熟、性格内向的学生。她把周围的一切都看得较灰暗，学习懒散，缺乏上进心，而且对家长、老师的教育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像这样的学生，要了解她的真实思想是很难的。考虑到她擅长写作，我便决定在她身上尝试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师生通信。

在给她的第一封信中，我谈了与她通信的目的：“进行朋友式的思想交流，以互相理解、互相启迪，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写作水平。”我有意识地隐蔽了我的教育意图。我还与她“约法三章”：“第一，我们既是师生，又是朋友，各自的看法、观点决不强加于对方；第二，通信是自由的，什么都可以谈，是否继续通信也完全由自己决定；第三，我们的通信是保密的，内容决不让第三者知道。”信中，我还就她的性格特征、精神面貌、兴趣爱好等谈了我的看法。

一周后，她回信了：“惊讶地收到您的来信，觉得挺好玩的。我当然愿意与您进行这种有趣的通信。读了您的信，我觉得您似乎像小学生一样幼稚而纯真——原谅我的不敬……我想向您申明：我不是个纯洁的女孩子，哪方面都不是！上次您来家访，说我与班上同学一样，是‘心清如水’的孩子。我要向您坦白：我一点儿也不纯洁，我过早地明白了许多不该我明白的事……我想搞好学习，但不知怎样才能获得上进的动力，您能告诉我吗？……”

她向我敞开了心扉，我在欣喜中给她回了信：“虽然你自认为过早地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但我认为你的确是纯洁的。因为不纯洁的人不会如此坦率；另外，过早地知道一些事未必是坏事，只要自己思想意识健康，便是‘心清如水’……”

看了电视片《迎接挑战》，她又给我写信：“我感到恐慌，越看越感到自己很有可能被历史所抛弃，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我很想奋进，可是……”

“恐慌可以理解，但不必担心自己被历史抛弃，因为你已经‘很想奋进’了，这极可喜，……当然，仅仅‘很想’是不够的。既然你征求我的意见，那我给你提两点建议：一是要有远大的志向，把自己的未来同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考虑。二是看待周围的事物不要老盯住阴暗面，只有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才能使人乐观向上……”我这样给她回了信。

时间一天天流逝，我和她的通信却一直没有中断。谈思想、学习、趣事、苦恼……我并不奢望仅仅靠通信就使她成为“后进变先进”的典型，但这种真诚的思想交流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感染作用是客观存在的。洪菁的精神面貌的确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在收到我的第一封信的次日早晨，她竟破天荒地主动将教室里的保温桶灌满了开水，让大家很吃了一惊；期末语文

考试她名列全班之首,却主动找到我:“李老师,这道题你少扣了我一分……”

洪菁初中毕业后就读于市内另一所高中,可我们的通信仍在继续:或交流看《红高粱》的看法,或探讨“该不该入团”的话题,或交流对《丑陋的中国人》的评价,或争论金庸、琼瑶小说的优劣……与洪菁通信的成功使我的班主任日常工作多了一项内容,但也因此让我进入了一个鲜活的心灵世界。由此开始,以后在我所带的每一个班,我都与十来位有一定特殊性的学生进行通信交谈。到了1994年,对这些通信的整理改编,便成了我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专著:《青春期悄悄话——致中学生的100封信》。

12年过去了,洪菁早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当然已没有了当时那种频繁的通信联系。但是,每到新年到来,我总会收到她的贺卡:“多么怀念当年那心与心之间的平等交流啊!”

细心呵护心灵的幼芽

一篇作文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篇文章以生动细腻的文笔，描写了一位初三女生对班上某男生的“朦胧情感”。她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健康的”，但总是“忍不住要去想”；有时候独自一人漫想时，觉得“心情挺舒畅”，但同时又感到“脸红”甚至“羞愧”；特别是当她这样“让时间白白流逝，而老师的讲课却听得半懂不懂”时，她便在心里骂自己“下流”。文章特别写了一次令人“既兴奋又尴尬”的场面——

有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她多么想和他坐在一起啊！可是她有什么理由让文艺委员把她和他的票连在一起呢？然而，当她走进电影院找到自己的座位时，她惊喜地看到，他竟紧挨着她的位置坐着！她坐下了，一颗心莫名其妙地剧烈跳动着；想和他说两句话，却没有勇气。她就这样面红耳赤地坐着，无比地激动，也无比地尴尬。放映时间到了，灯光终于熄灭了，场子里一片黑暗，她终于舒了一口气。

作者在这篇作文后面专门写了一段后记：“李老师，我这篇文章写的完全是真人真事。作文中的‘她’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不知为什么，思想变得复杂起来，老忍不住去想一些不该想的事。我知道我开始变坏了，不纯洁了，但我愿意改正，因此，我如实地写了这些。希望李老师一定帮帮我！”

这位女生名叫颜丹琳。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非常朴实单纯的女孩子，学习成绩也不错。她能在作文中与我交心，令我十分感动；这种高度的信任感，是我对她进行疏导的有利条件。于是，我找她谈了一次心。

我先感谢她对她的信任，同时向她说明，她的这些“想法”并非“不健康”，更不能说是“下流”。她如实地向我说了作文中的“他”，就是她的同桌刘颖华。

“他对你也有这种意思吗？”我问。

“好像没有，他并不知道我对他的感情。这也是我苦恼的一个原因。”她非常坦率地对我说。

“这些想法或者说感情，对你们现在这种年龄来说，的确是太早了一些啊，而且正如你在作文中所写到的，这种想法已经影响了你的正常学习。”我诚恳地与她谈着。

我和她一起探讨了她的学习状况，并由此谈到了女性成才的话题：“不少人都认为女生不如男生聪明，因为的确有一些女同学初中时学习拔尖，而上了高中就渐渐走下坡路。是不是女同学就比男同学笨呢？许多中外科学家、教育家对男女智力进行过比较研究，结论几乎是相同的：男女两性在智力发展方面的确有差异，但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智力优异发展的个性特色上，比如，女性长于形象思维，男性长于逻辑思维；女性听觉反应速度较快，男性视觉反应速度较快，等等。因此，从总体上看，男女两性的智力发展是平衡的。那么，为什么有些女同学在学习上确实后劲不足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女孩子的感情世界比男孩子丰富细腻，这使女同学在学习上更容易分心。比如人际关系的困惑、朦胧情感的烦恼、对自己容貌衣饰的本能关注等等，都可能使自己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开岔’，偏离自己求

知的轨道，影响自己的学习成绩，进而影响今后的成才。反过来讲，古今中外所有杰出的女性，无一不是战胜了自己的弱点才踏上了人生成功的辉煌顶点的！那么，对你来说，你是希望自己将来干一番事业呢，还是碌碌无为过一生？”

“我当然希望自己这一辈子有出息。我也觉得自己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可是——我又实在控制不住自己要想他。”她很认真地对我说。

“这就是理智和情感的矛盾。这样好不好——我把你们两人的座位调开，怎么样？”我开始给她出主意。

她静静地想了好一会儿，还是摇了摇头：“算了吧，李老师，您还是别把我和他调开。那样，我上课可能会更想他。”

“那好。”我宽容地同意了她的要求。“不过，我得给你提三点建议：第一，别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更不要有负罪感，实在要想不妨就想，说不定想着想着，你自己都觉得没意思。总之，淡化这件事在你心中的位置。第二，最近你不妨多想一想他的缺点，他有哪些令人讨厌的地方。这当然不是要你去有意贬低他，而是为了适当降低他在你心中的位置，从而冷却一下你目前多少有些盲目的情感。第三，千万不要让他知道你对他的这些想法，更不要让同学们觉察出来，不然，同学们的议论会让你背上更大的思想包袱的。”

第二天，上完语文课，我把颜丹琳叫出教室，给她一本书：“我送你一本《磨亮女性成才的宝剑》。这里面分析了女性成才的优势和障碍，并列举了大量中外杰出女性成才的事迹，你好好读一读。相信对你会有启发的。”

在那本书的扉页，我特意抄录了一段我刚刚读过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话：“人在自己一生的各个阶段中，是有各种各样的内容的。它们能形成完全不同的幸福，价值都是同样的珍贵和巨大。幼年时父母的慈爱，童年时好奇心的满足，少年时荣誉心的树立，青年时爱情的热恋，壮年时奋斗的激情，中年时成功的喜悦，老年时受到晚辈敬重的尊严，以及暮年时回顾全部人生毫无悔恨与羞愧的那种安详而满意的心情，这一切，构成了人生全部可能的幸福。它们都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欢乐，都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珍贵的回忆。怎么能说只有爱情才是最宝贵的幸福呢？”

一个月后的一个课间，我把颜丹琳叫到走廊的一角，笑眯眯地问道：“怎么样？还在想他吗？”

她爽快地回答：“嗨！真没意思！”

第二天，她交给我一封信：“李老师，最近一段时间，我仔细阅读了您送给我的那本书，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是呀，古往今来，无数女性成功的萌芽其实是被她们自己掐断的，因为她们是自己脆弱感情的奴隶；而一切卓越的女性，如书中所列举的居里夫人、林巧稚、吴剑雄等等，恰恰是勇于战胜自己的英雄。相比之下，我前一段时间的思想的确太幼稚了。我现在不想许下什么宏大的诺言，但我决心以最大的毅力抛弃这种过早到来的感情，为自己将来一生过得不平庸而把握好自己每一天的学习。”

几个月以后，这个班的学生初中毕业了。颜丹琳和刘颖华都考入了另一所高中，碰巧又分在同一个班上。当我听说了这个“巧合”时，心里还真闪过一丝担心：“他们会不会又有什么感情瓜葛呢？”

开学不久便收到颜丹琳的一封来信，消除了我的担心：“李老师，我怀着气愤的心情，告诉你一件事。我们高中新班集中了原来“未来班”的十多

位同学，大家都暗暗下决心，要用行动为“未来班”争光。在第一次单元测验时，我们都告诫自己决不能作弊。然而，在这次考试过程中，由于老师监考不严，相当多的同学作弊；而我们“未来班”的绝大多数同学保持自己的童心，没有做任何弄虚作假的事，取得了品德上的100分。但是，我却亲眼看见了刘颖华作了弊！我很痛心，他为“未来班”丢了脸，也为李老师丢了脸！我听他说，他最近要来看你，所以，这里我给你寄来了我以“未来班”同学的名义写给他的一封信，请你转交给他。”

颜丹琳的信，义正词严地对刘颖华进行了批评。

我感到欣慰：半年前，我仅仅就她的“朦胧情感”而轻轻梳理过她的心灵，她在抛弃这种“过早到来的情感”之后，得到的却是一副更加纯洁、更加成熟也更加博大的胸怀！

爱心与教育

我对教育的反思，当然不是全部否定我以前的教育实践，更不是彻底否定我们现行的德育，而是要通过反思发现我们德育存在的弊端，进而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德育。

手记五：沉重的思考 ——由一位女生自杀引发的德育剖析

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

宁小燕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在欣然叩开死亡大门的同时，会给人间留下一道难解的人生方程式。

应该说，她走得格外从容而坦然。有她自杀前一天——1987年11月2日晚上写的遗书作证：“我明天早晨要去远行，悄悄地、默默地、自由地。”

应该说，她去得相当冷静而周密。有她半年前——1987年5月12日的一则日记作证：“昨天，我给一个同学写信，撒了个谎，让她替我买20包磷化锌，我的生命仅值四角钱，比小老鼠强不了多少，但我很愿意，也很高兴放弃它。我将快乐无比！”

但是，面对她那安详的遗容，人们还是惊呆了！

——因为，她只有16岁！

——因为，她是连续两届市级三好学生！

——因为，人们分析了她的各个方面：她的经历（从小学到高中一直“走红”），她的家庭（出身于干部家庭，父母很爱她），她的学习（成绩虽不算拔尖，但一直较好），她的人际关系（由于性格内向不太接触同学，但与同学并无大的矛盾）……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置她于死地的打击和挫折！

于是，人们有了重重的叹惜：“这么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死了，实在太可惜！”

于是，人们有了深深的疑惑：“她这么顺当，竟莫名其妙地自杀了，真不可思议。”

按照惯例，出了人命案，总应该有个结论。二十多天后，经过多方调查、分析，区教育局发了“情况简报”，有如下两段——

“宁小燕在人生观上存在着缺陷，她对人生的意义、价值早就产生了消极的认识，因此，她的自杀不是偶然的。”

“宁小燕的自杀反映出加强青少年学生人生观的思想教育的必要性、紧迫性；反映出在深入地关心、了解学生内心世界方面，我们还应做很多过细的工作。”

这个结论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太简单了。

一切关心祖国前途、民族未来的教育工作者都有理由发问：作为一位“平时显得懂事、自重”，“在学校期间，遵守纪律、好学，在各种集体活动中表现较好，被选为班上宣传委员、通讯员和学校广播组播音员”（引自区教育局“情况简报”）的好学生，她的“人生观缺陷”、“消极认识”是怎么产生的？她的自杀，除了她本人的原因以外，我们的教育该负什么责任呢？

宁小燕临死前，给友人写信说：“我并不希望自己就这么悄悄地告别人世，但我太累、太疲惫了，我没有勇气留下来，也没有勇气和毅力继续前进。”

一位曾经对生活充满希望的青春少女，一位由我们的教育一手培养起来的共青团员、三好学生，竟然“没有勇气和毅力继续前进”而选择了死亡，而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察觉，直到她死后才震惊不已——这，难道不令人感到一种教育的危机吗？

不仅仅是为了解开宁小燕留下的人生方程式，更是为了更多的虽然没有自杀却同样感到“太累、太疲惫”的青少年学生，我对我们现在学校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和思考。这些调查也许不够全面，这些思考也许还相当肤浅，但我愿把它献给所有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教育者，让我们一起来剖析一下——

我们的教育面临着怎样的危机？

曾经是朵“小红花”

当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时，宁小燕还是一个上小学的小姑娘。然而，她却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官衔”——“小雷锋队”的“女司令”。

看见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抢扫帚、见缝插针地铲杂草，有时候为了争着送一个迷路的儿童回家，小伙伴们竟然吵得热火朝天，一向好胜又机灵的她，不动声色地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写了一行字：“‘小雷锋队’即将成立，愿参加者迅速报名。宁小燕。”

当天便有二十多位同学集结到她的“麾下”。

“好，从今天起我们小雷锋队就算成立了。那么——”宁小燕似乎是在征求大家的意见，“谁来当司令呢？”

不叫“队长”，而叫“司令”，在大人看来是很可笑的，但在孩子们看来，“司令”更气派。

“当然是你啦！”众人异口同声。

看着这些比自己高出一个头的“小男子汉”们和平日叽叽喳喳的女同学这样甘心情愿地听从自己的命令和调遣，宁小燕自豪极了。

宁小燕把“小雷锋队”分成四个小分队，每分队固定“承包”学校附近的两家慰问户。于是，每周星期六放学后，“小雷锋”们便来到孤寡老人家或军属家里，劈柴挑水、买粮送煤、扫地洗衣……完成任务后，各路人马回校集合，由小队长向“女司令”汇报大家的表现和居民的反映。

“小雷锋”们自然受到人们的普遍好评，其中，“司令”直接领导的那个小分队当然是最优异的。当时班上每周都要评选一次“小红花”，宁小燕几乎是每回都被评上。到了期末，教室后面“小红花评选栏”中宁小燕的名字下，竟然贴了19朵鲜艳的小红花。

放假了，宁小燕捧着这19朵小红花，向爸爸、妈妈、姐姐，还有同院的叔叔、阿姨、小伙伴们炫耀了好几天。

“小雷锋队”在宁小燕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做好事，一直到她小学毕业。

上初中了，不兴评“小红花”了。然而，美丽的小红花却在她心灵里继续开放着。

上学路上，宁小燕看到一位老盲人正用竹竿小心地探路，可就是辨不清方向。

“您要上街吗？我带您一段路吧！”小燕笑吟吟地问老人。

老人听见了声音，却不知声音来自何方，仍然茫然地说：“不是的，我在找一个熟人。他好像就在这附近，可不知具体在什么地方。”

“我帮你问问吧！”宁小燕热情地问了附近几家，仍无结果。

他着急，她更着急，因为快上课了。但是，尽管她现在离学校大门只有几十米，她也不忍心丢下这位老伯伯。

“别着急，”她柔声安慰道，“我帮您想一下该走哪条路。”

老伯伯静静地站着，等候宁小燕“想”出来。

她冷静地四下瞧了瞧，发现有一条小路通过附近每家每户的门口，走这条路没错！她打定主意，对老盲人说：“我们走那条路，来！”

她一边说，一边轻轻地牵起了老伯伯的手……

“上课迟到了，可我为此快乐了一整天。当我做完了哪怕是小小的一件好事时，我便觉得自己恢复了纯洁的童心，又戴上了美丽的小红花，我是多么高兴啊！”

——当晚，宁小燕在日记中这样地写道。

孤独的思考者

她曾经是一位多么乐观、自信而且富于思考的少女啊！她喜欢英语。她的父母希望她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翻译或者外交官。平时一有空，她便对着录音机叽哩哇啦地朗读。与同学交谈时，简单的句子也用英语说，尽管常常说得结结巴巴，大家都笑得直不起腰，但她和同学们都感到快乐无比。她还多次参加学校、市里的英语竞赛。她也喜欢数学、物理和化学，尤其喜欢钻研怪题。每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攻破一道难题时，她就感到充实和喜悦。她把这当做一种智力体操，当做一种享受。但，对宁小燕来说，最富有魅力并最能引起她如痴如醉追求的，还是文学艺术。她曾在给一位同学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热爱文学艺术，这是我显著的特点，喜欢读小说，比如外国的《茶花女》、《简爱》、《欧也妮·葛朗台》、《红与黑》、《莎士比亚戏剧集》、《安娜·卡列尼娜》等等。我看书不是为了消遣。我总是仔细读，看书里是怎样抓住风景进行描写的，是如何用凝练的文笔刻画人物外貌的，是如何用一条线索把众多的人物、纷繁的事件串成一串珍珠项链的。同时，我是带着生活中的问题在名著中寻找答案。我也喜欢读中国作品，如《呐喊》、《子夜》、《家》、《鲁迅杂文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门铃》、《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等。我尤其爱读争鸣作品，它有独到的见解，能够培养人的思维能力。我也喜欢读诗，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有时我也写一些诗，但大多随写随丢……”

“我爱好绘画艺术，喜欢齐白石的《樱桃》、《对虾》，徐悲鸿的《奔马》，喜欢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自画像》，还有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印象派的《日出》，巡回画派的《伏尔加河的纤夫》，鲁本斯的《画家和他的妻子》；罗丹的雕塑《巴尔扎克》、《沉思》，我也非常喜欢。我最爱蒙娜丽莎神秘、迷人的微笑，以及她恬静、柔美、善良的形象。我曾临摹过这幅世界名画。以前，我没事就爱画画，水彩图、素描、白描，都爱。可惜的是，我画的好多画都送给同学了，仅存一幅《蒙娜丽莎》……”

她有过真诚的社会责任感，并为自己能够生活在这创造未来的改革年代而自豪。在丁佑君纪念馆，她久久凝视着丁佑君烈士的雕像热血沸腾：“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枪林弹雨的时代，我一定会在人们永远纪念的英雄名单上占据一行。我要充分利用有限的生命，在当今这个同样是创造灿烂明星的飞翔时代中奋起！”南疆自卫反击战的炮声，震动了宁小燕赤诚的中国心，她惋惜自己不能投笔从戎，去拼杀奋战，成为保卫祖国的勇士。她摊开了洁白的信笺，对同学说：“我要写信给前方将士们，用我的热血与激情，鼓舞正在奋战的勇士，纪念为国捐躯的烈士。用我这一支笔，写出献给前方将士的感激之歌、力量之歌、勉励之歌！”

她爱读书，更爱思索。她在阅读中走向成熟，在思考中保持纯真。在同龄人中，她逐渐显出了自己的思想个性：别人“成熟”（实为世故），她显出纯真；别人“纯真”（实为肤浅），她显出成熟。

傍晚，走在放学的路上，看着每天见惯了的破旧农舍里射出的微黄煤油灯光和在昏暗灯光下辛勤劳作、表情麻木的农妇，无忧无虑的同学嘻嘻哈哈，“高歌前进”，宁小燕却感慨万千：为什么煤油灯还会统治着社会主义中国农民的夜晚？为什么电影上40年代农村家庭的情景还会在80年代出现？为

什么不少人至今还不能摆脱物质贫困和各种愚昧的精神枷锁？

正陶醉于《冬天里的一把火》的同学们被宁小燕这非常严肃的几个“为什么”逗得更乐了：“你真是忧国忧民呀，我们的小燕真应该去当国务院总理！哈哈哈哈哈……”

几句善意的玩笑，使她感到周围的同学是那么陌生而浅薄，她感受到了不被理解的惆怅。

半期考试，班上纪律乌七八糟，尽管学校事先为了防止学生作弊而让各班学生混合交叉，但考场上的情景仍使宁小燕感到震惊：相互递纸条，交换试卷，通报答案，讨论试题，翻书翻资料……她暗暗作了统计：作弊人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她在考场上保持自己的纯洁与诚实，却被同学们指责为“假装高尚”、“故作清高”！

她愤慨地与同学辩论：“你们这样做，是为了名誉吗？可大家都知道成绩是假的，有什么名誉可言呢？是为了奖学金吗？这样换来的奖学金，心里好受吗？……”

她在作文中激愤地写道：“这难道就是 80 年代的学生的所作所为吗？有人一味地为 80 年代的中学生唱赞歌，什么‘奋发有为的一代’，什么‘富有思想的一代’……他们看到了这些现象吗？”

宁小燕这些独特的思考，敏锐的思想，赢得了老师的赞扬和鼓励：

“你真可爱，在别人赞美之风盛行的时候，你却勇于唱反调，不是颓唐的调子，而是悲怆、激越的调子。”

“对，人就应该不断地思考，努力地做。”

但是，当她按照老师的教诲继续深入“思考”的时候，她与周围同学的心理距离却迅速拉大。她越来越从心里瞧不起同学们，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对他们看不顺眼。

她感到知音难觅。

她感到孤独。

心灵的自白 ——宁小燕日记选评

1985年9月23日 星期一 多云

我讨厌虚伪，厌恶假话和不敢说真话的人。我追求直和真。但是，以前父母警告过我多少次，有时还像哄小孩一样哄我，说信任别人，向别人说真话没有好处，什么朋友、友谊，都是假的；有什么话只能对父母说，只有父母才是真的，如此等等。对于这种“真理”，我不予理睬。以前，我的朋友很多，学校里的，社会上的，什么人都有，最初他们都喜欢我活泼、单纯、会理解别人。但到后来，他们都和我疏远了。他们是怕我的性格。有些人也“好心好意”地劝我，教我“对人不要太相信、太真诚”，我当然也置之不理。我也不必再和这些人一起好，因为我同他们之间有堵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摧不毁的厚墙。但是，我真诚和直率的性格是不会变的（现在有好些人，他们从前也很真诚，但踏上社会后就变得对一切都假起来，互不信任）。如果要变，也只是变得更“直”更“真”！

正直和真诚，的确是一种高尚的品格。我们的教育多年来也试图让每一个学生正直而真诚。但是，怎样在保持正直和真诚的同时，又能正视邪恶与伪善？怎样既诚实地做人，又机智地做人？我们过去的教育是很少对学生讲的。我们的学生真正执着地追求“直”和“真”，其结果往往是碰壁“吃亏”。因此，当宁小燕发誓追求“直”和“真”时，我们不健全的教育已经为她的人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86年1月7日 星期二 晴

又是一个“走后门”！现在，恐怕“关系学”也是一门学问了，说不定以后还会把它作为学生必修课之一呢！……我讨厌关系学，更讨厌搞关系学的人，也不愿同搞关系学的人沾边。但生在这关系学垄断的人间，谁也无法逃避，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洁身自好。

损人利己的庸俗“关系学”理应谴责。但以尊重人为目的的人际关系，是不是也应理直气壮地给学生讲讲呢？一味简单而绝对地批判“关系学”，实际上是把学生培养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

1986年4月8日 星期二 多云

这几天，我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希望不要又有“出轨”的地方。今天又是班主任老师的物理课。他一进教室总要先上几分钟政治课：“道德这个词嘛，意思大家都知道，报上报道，北京市最近开除了不少大学生。大家都清楚，大学生的成绩都是拔尖的，但还是被开除了，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些学生只注重成绩，而不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现在，我们要注重这个问题了……因此，我特别提醒某些同学注意，要培养自己的道德修养，多想想道德二字！”班主任又在“提醒”我了。这在我的预料之中，他根本不相信我。

任我怎么小心翼翼，他也会找到我的岔子。

下午自习课，班上一片闹嗡嗡的。开始我一直很守纪律，前面的同学又是唱歌，又是说话，还莫名其妙地掏出一封信来问我：“你猜是谁给我写的？”我没好气随口答了一句“朋友”。没料到下课后我被班主任狠狠批评了一顿：“我看你越来越不像话了！真是学坏容易学好难啊……”

于是，我被惩罚留下来静坐。一直坐到6点40，才被“释放”回家。

我想不通，老师竟然如此不相信我。为什么这种惩罚形式竟光明正大地成了教育手

段呢？

离开了对学生的尊重、信任和理解，任何“道德教育”都是虚伪的。更可怕的是，教育者的神圣形象也会在教育者自以为神圣的教育中崩溃！

1986年5月7日 星期三 晴

×××总是有事没事地找我“谈工作”。我下课刚走出教室，他又叫到我他办公室里去。

我真讨厌他的眼睛，滴溜溜地把别人浑身扫遍，最后一动不动地死盯着你。即使你看着他，他的眼光也不闪开，他好像并不怕别人瞪他。我漫不经心地把手撑在办公桌上，看着玻璃板下的照片。

“你看你们办的板报呀，”他对我大声说，“基本上都办完了，就偏偏剩那么一小块空白。人家好多老师都说，宁小燕的板报办得好是好，就是……就是……嘿嘿，就是虎头蛇尾……”他说着说着悄悄地把手伸过来，试探性轻轻握住我搭在桌上的手。“总是掉一条尾巴，虎头蛇尾，嘿嘿，蛇尾……”他一边说一边用不怀好意的目光盯着我，想看看我有什么反应。上星期四他叫我去拿彩色粉笔时，举止轻浮，我便看出他居心叵测，没料到他今天竟如此放肆。

我不动声色地把手轻轻抽了出来，擦了擦玻璃板，指着一张校篮球队合影说：“嘿！你看，这个人照相时没精打采的！”我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一边用眼角余光瞄瞄他。他把手缩回去，身子向后靠在竹椅靠背上，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快，脸上的笑也凝固了。

此刻，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他上政治课和主持团干部会议时的情景，挺着胸，双手不停地划动，用企鹅似的姿势飞快地走过教室或会场，然后站定，用严肃得近乎严厉的目光扫视大家。俨然是一个架子十足的老师。哦，应该是保持着矜持和尊严的教育者。

我感到一阵恶心和烦躁不安。好在那表情一瞬而过，尔后又是一脸不经意的笑容。

正当这时，三位同学喊了声“报告”便走进来了，汪老师也随后进来。我便对×××说：“那，我去把那空白补上。”他仿佛没听见，还在发呆，我提高声音重说了一遍：“×老师，我去把那空白补上！”他才如梦初醒，看了我片刻，尴尬地说：“哦，好吧……彩色笔在门背后。”

我匆匆拿了一支粉笔，逃也似地奔出了那幽暗的屋子。

我心不在焉地在那空白处随便写了个日期。“哼哈！宁小燕，偷懒，应付！”我浑身一颤，回头一看，果然又是他，倒背着双手踱着步，脸上仍是一副随和亲近而又让人生厌的笑容。我漠然一笑，又回头填着已写好了的日期。

当这位老师向宁小燕发出令她“浑身一颤”的阴森冷笑时，宁小燕透过他那猥劣的眼睛，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丑恶的灵魂，她同时联想到了“政治课”、“团干部”、“教师”这些崇高的字眼。不要责怪她“以偏概全”吧，因为在我们教师队伍中的确有个别败类败坏了“人类灵魂工程师”这光荣的称号！

1986年9月5日 星期五 小雨

刚下数学课，某位老师就把我叫到了她的寝室，和蔼地对我说：“这次评奖学金可能没有你。”这我早已知道，虽然上学期我的成绩总分达到了评奖学金的分数线，但由于某科不及格，自然不在评奖之列。我是有些惋惜，但并不悲伤。一次失败算什么呢？何况有些人即使得了奖学金，我也不羡慕，因为是靠作弊换来的。我想，老师一定是想安慰我，

便说：“我早已知道，没什么！”可她摆了摆手说：“我反复复查了你上期的试卷，我判分严了一些，其实你完全可以及格，我已经给你添了十几分……”“不……”我惊奇地打断了她的话。可她不容我说，仍然平静和蔼地说：“你不要感到不好意思，别人不会知道的，本来嘛，你平时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走出她的寝室的。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我平生最讨厌的就是虚假。我当然清楚，这位老师为什么会对我如此关心——她爱人与我爸爸同一单位同一科室，她是想通过我巧妙而曲折地巴结我那当科长的爸爸。

生活中，为什么处处是虚伪啊！

如果说前面那位老师的轻浮是偶然现象的话，像这位教师这样的“关心”，这样的作假，恐怕决非个别了。在老师的精心培养下，宁小燕逐步接受并树立了教育者所希望的道德信念。可没料到，正是这些教育者不知不觉地亲手把宁小燕的道德信念摧毁了！

1986年12月8日 星期一 雨

学校里沉闷的空气，冷漠的人际关系，过早萌发的爱芽……压得我这颗天生动荡不安的心不能喘息。

我不能老这样下去，我不想读书，今天，这个念头又出现并占据了 my 大脑。唯一能够解脱，能逃避这一切的办法是什么呢？

我仿佛已脱离了这个世界，超脱于现实，顿觉眼前的水、朦胧的山、淅淅沥沥的小雨，都带着清淡的诗意……

一颗孤独的灵魂需要温暖和理解。多年来，我们过多地注意了“思想教育”、“品德培养”、“政治引导”，却忽视了学生心理卫生的指导，少女的心灵是个丰富、微妙而多变的世界。此刻，宁小燕若能遇上一位心理保健医生，该多好啊！

1987年3月20日 星期五 多云

爸爸是他们单位里分房小组的主要成员，但我们家在分房时却仍被人蒙了。人啊人！狡猾的、世俗的、卑鄙的、肮脏的、莫名其妙的人！

一切都是世俗的，让人生厌……

“离开这个肮脏的人世间吧！”一个声音在呼唤，可是，我似乎太弱，还没有太大的勇气。救救我！帮助我吧！让我得以自由和解脱吧！

“社会主义社会结束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关系，因而能够在全体人民内部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我们社会的主流永远是好的”——这是目前中学政治教材中的论述。既然这些观念已牢牢地在宁小燕头脑中扎了根，那么，她怎么能够面对如此现实而不感到惊异以至于绝望呢？“救救我！”——这不仅仅是宁小燕一个人的呻吟，而是无数在“玫瑰色教育”下走入社会后感到迷惑的青年的呐喊！)

1987年11月2日 星期一 阴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日记了。我下了很久的决心，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等待到了最失望、最无聊的时候，我该离开了。

现在，我突然感到有点匆忙。等我把该做的都做了，所希望的都实现了，再心满意足地离开吧，可是，那太多了，我已无能为力，也无勇气继续完成它们了。

再见了，我心爱的日记本！不会再有人来续写了……

!!!……

我听见了历史的回音——那是本世纪初一位思想巨人的呐喊：
救救孩子！

“纸船”破碎了

如果她的意志坚强一些，如果她的心胸宽阔一些，如果她的性格开朗一些，如果她的思想成熟一些，如果她对生活热情一些，如果她对未来乐观一些，如果她对现实的看法复杂一些，如果她对社会的认识全面一些，如果她的人生观积极一些，如果她的世界观科学一些……她本来是不会死的。

——宁小燕的教育者（老师、领导、区教育局的同志）一致这么认为。这个看法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宁小燕本人的思想性格弱点的确是造成她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

但这绝不是惟一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我们教育者为什么不愿意这样来“如果”一番呢——

如果宁小燕在幼年启蒙时，我们能告诉她未来不仅仅是美好的，更是艰苦的；如果她成立“小雷锋队”时，我们不仅教育她要学雷锋，也告诉她生活中并非人人皆雷锋；如果我们对她的理想追求与道德要求合乎实际地降低一些；如果我们给予她的学校教育同她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是基本和谐而不是相抵触的；如果在她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感到困惑时，我们给她一本《怎样使别人喜欢你》（送给中学生礼物丛书之一）；如果当她的青春爱芽萌发时，我们给她一本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如果她的政治老师是一个高尚的人而不是一个卑劣的小人；如果她的班主任不仅仅是一名教育工作者，而且还是一名明察秋毫、洞悉心灵的心理学家；如果她的父母不仅仅是她的哺育者，而且还是她最信任的知心朋友……那么，宁小燕的生命之火本是不可能熄灭的。

然而，这些“如果”仅仅是“如果”而已。因此，宁小燕的青春之弦必然崩断。

1987年8月19日，宁小燕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诉说着自己的迷茫和幻想——

……我曾经很要强，想做的就一定要做，想得到的就一定要获取。可后来，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沉下去，弱下去，从而一蹶不振。我从未意识到的天生性格中的软弱一下子暴露无遗，于是我由一片生机勃勃的绿叶变得枯黄，最后从我着根的理想与信念的大树上坠落。我不知道现实生活中还有什么东西是美好的，我不知道前面是怎样的，当然不会有鲜花，只能是荆棘。我现在踌躇不决，每走一步都是迷茫……

我知道，谁也不会是救世主，我的上帝就是我自己，可现在，我觉得已没有力量拯救自己了。也许等待我的将是樱桃山谷和玫瑰村庄。听起来多美，也确实很美，他们属于另一世界，这只是时间问题。

在宁小燕看来，自己美好的理想与丑恶的现实是激烈碰撞的，自己高洁的品格与污浊的世风是不可调和的，自己纯真的个性与混沌的环境是尖锐冲突的。她感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她决心做“真、善、美”的殉道者。她憧憬着死亡。

1987年11月2日深夜，她从容冷静地写了两封遗书。

一封写给爸爸、妈妈、姐姐——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也许我已离开了你们，永远地。

我别无它法，只能用这种最软弱、最无能的方式使自己得到解脱。你们也许会感到不平。但请为我想一想，我这样无聊地活着实在是一种浪费。我的灵魂早已离我而去，只剩下一具空壳在你们身边，又有多大意义呢？这样活着，我实在感到太累，太疲倦了。

我感谢爸爸、妈妈创造了我，不然我也不会懂得下世千万别错投人胎；我也感谢你们对我的爱和抚育，但对于我，实在是一种伟大的浪费；我也爱姐姐，希望她永远幸福。

我就这样向你们告别了，留给你们的也许是无尽的哀伤，但这种方式对我是十分幸福、十分适当的。因此，你们也不必为我悲哀，也不必为我遗憾。

一封写给友人——

我真的要去远行了，带着我的梦，我的希望，去寻找那自由王国。

原本有许多话要说，但现在似乎已无意义了。

我也留恋我爱过的一切，但要坚强地将“人”做下去，仅靠这些爱是远远不够的。

此时，我好害怕孤独呀！我将孤零零地，只身一人乘上小船，漂泊到那个苍白然而纯洁的世界，只有我的梦和幻想陪伴我。我也许仍感孤独，但我终究自由了，解脱了。

我没有什么可遗憾，人生最美好的我都已经过了。尽管也有未实现的愿望，但毕竟已希望过了。

我不能为你祝福。

没有一般人面对死亡时的恐惧或悲壮，宁小燕欣然而恬静地把自己年轻的生命交给了死神。

毕竟在这世界上生活了16年，毕竟是承受过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第二天早晨，宁小燕离开家门时，情不自禁地多次回头久久凝望着自己的妈妈……

“还东张西望干什么？快迟到了！”母亲对女儿说。

——女儿不同寻常的深情凝望竟丝毫未能引起母亲的注意！

到了学校，宁小燕向老师请了“病假”，便约上自己一个最好的朋友来到江边。宁小燕和她谈起了有趣而幸福的往事——那次春游自贡灯会多有趣。还记得那回我们在蝴蝶山洞探险吗？去年这儿第一次下雪，多美！可惜雪太少，堆不起雪人。哼，如果她再和我比赛乒乓球，我一定不会再输的！什么时候能再去梅花沟玩耍？“小雷锋队”。小时候，第一次偷吃辣椒，到河边捉泥鳅。用葫豆叶吹泡泡……

整整两个多小时，宁小燕神态自若、谈笑风生，竟使好友一点也没察觉出这是宁小燕留在人间的最后的声音了！

该想的都想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带着对生的幸福满足，怀着对死的美好向往，宁小燕坐在江堤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咀嚼着磷化锌，同时又悠然地欣赏着周围如画的美景。15包磷化锌下肚，宁小燕倒在了岷江边……在她的身边，飘落着一页洁白的诗笺。那是头天晚上，宁小燕抄写的泰戈尔的一首小诗《纸船》——

我每天把纸船一个个放在急流的溪中。

我用大黑字把我的名字和我住的村名写在纸船上。

我希望住在异地的人会得到这纸船，知道我是谁。

我把园中长的秀丽花载在我的小船上，希望这些黎明开的花能在夜里被平平安安地带到岸上。

我把我的纸船投到水里，仰望天空，看见小朵的云正张着满鼓春风的白帆。
我不知道天上有我的什么伙伴把这些船放下来同我的船比赛！
夜来了，我的脸埋在手臂里，梦见我的纸船在子夜的星光下缓缓地浮泛向前。
睡仙坐在船里，带着载满着梦的篮子。

诗笺被秋风扬起，飘零在江面上——
宁小燕的纸船连同她的生命的白帆破碎了……

不仅仅是“宁小燕”的悲剧

我与宁小燕同在一个城市，但素不相识。当她吟诵着泰戈尔的诗歌告别这个世界时，我正在离她不远的另一所学校辛勤“塑造”着学生的“灵魂”。

宁小燕之死，震惊了我这位“教育者”。经过采访、思考、分析之后，我写下了一篇报告文学《“真善美”殉道者》投寄《中国青年报》。不久，该报予以头版发表。

不过，编辑对标题作了修改：《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

我折服编辑所取的这个标题。的确，面对宁小燕的遗体，每一位教育者都应反思自己的教育，并从中悟出点什么。

文章发表后，引起的反响是我没想到的。当时，《中国青年报》有一栏目叫“每月一榜”，专门评述上月读者来信反映强烈的文章。结果，《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名列榜首。编辑这样综述道：“反应焦点：来信认为，宁小燕的死教育者有责任，社会也有责任。一位师范学校的学生来信说，我和许多同龄人都对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感到迷茫、不解。这些社会现象深深压抑了我们的进取心和对生活美好的希望。希望宁小燕自杀这件事，对社会有所触动。”

同年9月9日的《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一位中学生题为《难道我们的教育真的毫无责任吗？》的文章——

《中国青年报》在头版给了一位“不知到底为何自杀”的女中学生——宁小燕以相当可观的版面。像宁小燕那样热切地追求“真善美”又过于天真的好学生，当今已经很少见。而她走极端的解脱方式——自杀，却大声发出了“在玫瑰色教育下走入社会后感到困惑的众多青少年的呼唤”，以致记者用醒目的黑体字质问道：“难道我们的教育真的毫无责任吗？”

身为一个中学生，对这样的质问并不觉得奇怪。多少毕业生都曾对他们的恩师说：“您教给我们的那一套，在社会上根本不顶用。您想让我们做大好人，可社会容不下我们。”那些头发中有些许或许多银丝的“园丁”，对此往往只是摇头，叹惜世风日下，然后回到课堂仍旧向新一批学子传播他们坚信的正确思想，然而一切往往都只是轮回而已。

我们的师长，当您千方百计地想把一个孩子教育成您心目中的好孩子时，您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青少年身心的成长是一个痛苦而复杂的过程。

当他们在黑暗中感到阵阵孤寂之时，当他们在日记中发出莫名的长吟之时，当他们在拥挤的人群里感到恐慌之时，当来自内部外部的无形压力向他们慢慢逼来之时……您不要再拿一些硬邦邦的正确的框框去套他们，不要幻想只要让他们明辨是非就可万事大吉。

可不可以使环境宽松一些，可不可以拿您或别人有益的人生经验去疏导他们拥塞的心灵，可不可以不把学生们当做一部部受教育的机器，而看做是一个个正在通过他人帮助，更通过自己不断努力而逐步形成的“人”……

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请给他们以自信力和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胆略；请给他们以一颗健康而有强大生命力的心脏；请给他们以一个清醒而有独立思辨能力的大脑；请给他们以一种积极而富于弹性的生活态度……

这期待是给予我们的师长，也是给予我们自己的。

看来，悲剧的确不仅仅是宁小燕的，尤其是心灵的悲剧！

我在《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中对我们的教育发出了一声声质问，

这绝不意味着我的教育就十分高明，因而可以居高临下地去指责其他的教育者。不，当我第一次关注“宁小燕”的名字并试图理清她的成长历程、思想轨迹和命运发展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把批判的解剖刀对准了自己的教育！

我开始了反思。

而且这种反思一直持续到宁小燕悲剧发生 10 年后的今天。

德育观念的十大碰撞

我对教育——不，准确地说，主要是对德育的反思，当然不是全部否定我自己以前的教育实践，更不是彻底否定我们现行的德育。而是要通过反思发现我们德育存在的弊端，进而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德育。

我之所以把反思的重点更多地放在德育上，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既然教育学生学会做人，是素质教育的首要任务，那么对教会学生做人最直接的德育，我们理应有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比起 10 年前，我们的学校德育已经有了可喜的变化。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党和政府把德育改革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各地中小学在德育改革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与 10 年前相比，学校德育的内容和渠道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扩展和拓宽。

但从大面积上看，特别是微观到每一位班主任的具体工作，我们就不能不感到，德育改革的步伐还相当沉重，相当缓慢。

因为我惊异地发现，距我写《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10 周年之后，自杀的中学生并没有减少。国家教委领导在谈到素质教育时，多次地提到这个严峻的问题。

而学生的心理素质问题，仅仅是教育问题的一个小小方面。如果要罗列现在暴露出来的其他德育问题，那更是令人忧心不已。

为什么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改进和探索之后，效果始终难以尽如人意呢？

关键在于观念！

对于加强和改进中学德育问题，人们并无异议；但应该以什么样的观念来推进我们的德育改革，人们的认识并不相同。我认为，我们今天加强学校德育，决不只是为了克服前些年“一手硬，一手软”和忽视德育工作的倾向，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形势对学校德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因此，所谓“加强和改进”，就不仅仅是恢复五六十年代的德育模式，而是在继承和发扬我们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新路子。

加强和改进德育涉及的方面很多，其中的关键之一是德育观念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目前，在德育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能适应德育新形势、时代新要求的观念，这妨碍着德育的真正加强和科学改进。这种德育观念的碰撞，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 德育目标：是培养膜拜师长、迷信权威的守旧者，还是造就崇尚真理、勇于开拓的创造者？

对此，理论上似乎并不存在分歧。因为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重申了党和国家对学校德育的一贯要求：“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献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崭新事业，作为这宏伟壮丽事业的继承者和参与者，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崇尚真理、勇于开拓的创造者。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有的

德育工作者却在有意无意地培养膜拜师长、迷信权威的守旧者：讲演作文习惯于重复名人或英雄的豪言壮语，一举一动只能听命于老师或家长的“细心指导”，书本上写的、老师说的都是对的，不敢也不愿有自己的见解……久而久之，思维受到束缚，思想变得苍白，创造精神被压抑以至泯灭。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因此在德育工作中，我们应鼓励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和方法去独立思考、勇敢探索、大胆创新，最终成长为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进21世纪的一代新人。

2. 德育内容：是唯上唯书，还是面对实际？

不少教师习惯于从上级文件中找具体的德育工作内容，他们甚至希望上级布置的德育任务越具体越好：学什么事迹？读什么书籍？听什么报告？开什么班会？……如果离开了“上级精神”，他们便茫然而不知所措。党和国家的有关文件、国家教委颁布的《教育大纲》以及各级教育领导部门下达的德育任务，无疑是德育工作的方针、原则和依据，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宏观指导，而非我们每一位教师的工作方案；即使是学校的德育工作安排，也不能取代每一位班主任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在与上级精神一致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也必须面对学生实际，确定我们的具体德育内容。“老师讲的，不是我们想的；我们想的，恰恰没人回答！”——《北京青年报》上一位中学生的话提醒我们，要使德育真正深入学生的精神世界，就必须切合学生心灵，回答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在理解学生中引导学生！仅仅拿着各种文件苦苦思索：这堂班会课，我讲什么呢？——这样的德育只会越来越远离学生心灵。陈云同志曾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德育工作者同样应该充满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3. 德育教师：是“学生保姆”、“班级警察”，还是“灵魂工程师”？

“有关教育与教学的问题中，没有一个问题不总是和教师培养的问题有联系的。如果得不到足够数量合格的教师，任何最使人钦佩的改革也必然要在实践中失败。”（皮亚杰语）德育教师更是如此。如果仔细考察一下一些德育失误，追根寻源无不与教育者本身的弱点相联系：学生依赖性强，自理能力差，这往往是教师“慈母般无微不至关怀”的结果；学生个性特点淡化，习惯封闭自己的心灵，言谈举止总是被动服从，这是教师“严加管教”的结果。令人忧虑的是，这种“保姆型”、“警察型”的班主任，至今还被一些人推崇。这样的德育教师是难以培养出人格健全的现代化新人的。德育工作者最根本的任务是“塑造灵魂”。作为“灵魂工程师”的教育者应该是专家、思想家和心理学家——他应具有某一专业博大精深的知识结构，并且在学科教学上令学生由衷敬佩；应具有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现代观念，重视理论学习与研究，不断吸收各种新的思想养料，关注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敏锐地预见未来对当今教育的影响；他善于让每一位学生都乐意向自己敞开心扉，同时不知不觉地走进学生的心灵，与他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使学生不但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科学的思想观念、良好的道德风貌，而且具有健康的心理、完善的人格。

4. 德育情感：是长官，还是朋友？

德育过程中情感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而这情感主要来自师生关系。固然，师生之间管理与被管理、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决不应该是师生之间唯一的关系。如果在学生心目中，老师是威严的长官，而在教师眼里，学生不过是顺从的臣民，那么，德育情感很难产生，德育效果很难出现。然而至今不少德育工作者仍信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我说你服”、“我打你通”、“我管你从”等旧德育观念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使学生对老师敬而畏之，畏而远之，德育完全失去了动人心魄的感人力量。更为严重的是，在“德育长官”的管教下，学生逐渐丧失了自我教育能力，也缺乏起码的独立思考能力：“老师说的总是对的，不用我操心！”一方面畏惧老师，另一方面，为了服从又不得不迎合老师，以致形成“双重人格”。我认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教学相长”，“当仁不让于师”等至理名言同样应体现在德育之中。教师与学生除了教与被教、管与被管的关系外，还应有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朋友关系、同志关系，因为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双方的平等意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教师不应把自己与学生的平等关系和对学生的尊重，看成是自己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而应觉得理所应当，本该如此。教师应发自内心地把自已看做是与学生一起探求真理的志同道合者。唯有这样，德育才会产生应有的情感力量。

5. 德育艺术：是“泥塑”，还是“根雕”？

人们往往说青少年时期可塑性最大，这话强调了教育对学生的重要影响，无疑是有道理的。一些教师便因此认为，学生是一块泥团，而德育是教师随心所欲的“泥塑”，说什么“学生的内心是一个空荡荡的容器，需要教师注入良好道德、正确思想”，“学生是病人，德育就是治病”。这些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无视学生的主体性。我认为，学生不是一块可以任意搓揉的泥团，而是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根块”。因此，科学的德育应是“因势象形”的根雕艺术。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我们的教育对象的心灵绝不是一块不毛之地，而是一片已经生长着美好思想道德萌芽的肥沃的田地，因此，教师的责任首先在于发现并扶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一株幼苗，让它不断壮大，最后排挤掉自己缺点的杂草（参见苏氏《要相信孩子》）。教学上讲究“因材施教”，德育也应如此。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美好道德的萌芽，并且要善于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这种萌芽。德育“根雕”艺术的实质在于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摒弃思想教育的“一刀切”，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乐于研究学生的心理特点，善于解除学生的心病；创造条件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展示其某一方面的独特优势，使每个学生都抬起头来走路。

6. 德育方法：以灌输为主，还是以引导为主？

在德育中，灌输与引导都是需要的，对此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问题在于，以什么为主。鉴于前些年思想政治工作淡化，有人便提出“还是需要灌输”。我们并不一概反对灌输，在某些时候，动之以情而晓之以理的灌输，往往会收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然而一味灌输的结果，德育未必随之真正强化。作为德育的常规方法，还是应以引导为主，这不但符合德育中因势利导的原则，也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

最后一条便是“保密”：“在自然而然的气氛中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是使这种影响产生高度效果的条件之一，换句话说，学生不必在每个具体情况下知道教师是在教育他。教育的意图要隐蔽在友好和无拘无束的相互关系气氛中。”有人把列宁针对工人运动中社会主义思想启蒙而提出的“灌输”原则，简单地套用于当代中学生的教育，用心固然良苦，效果未必如意。“一个不高明的教师向学生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学生自己发现真理。”（第斯多惠）我们的教育目的一定要明确，但我们的教育痕迹最好淡化，而春雨润物的德育感染往往比慷慨陈词的德育说教更为奏效——德育辩证法正是如此。

7. 德育过程：是虚假，还是真诚？

通过德育培养出品格诚实的人，这是每一位教育者的真诚愿望。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确实不自觉地培养出了不少两副面孔的人：想的与说的不一样，说的与做的不一样，言不由衷的作文，口是心非的讲演等。造成这种恶果的原因是复杂的，而德育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种种虚假是其原因之一：其身不正，偏要正人；己所不欲，硬施于人；为迎接上级检查，不惜弄虚作假；只讲形式的轰轰烈烈，不管内容的扎扎实实……凡此种种，教育者也许习以为常，却没有意识到这都是在言传身教地教学生怎么作假！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德育的力量在于诚实。而德育过程的真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者的诚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自己不相信的决不教给学生，勇于向学生承认自己的过失——这应当成为德育工作者起码的职业道德。真诚只有用真诚来唤起，信念只能靠信念来铸造！

8. 德育环境：是封闭，还是开放？

“学校教育一点钟，抵不过社会一分钟！”这是许多德育工作者的叹息。于是，一些教育者便在修筑学校德育的“铜墙铁壁”上狠下功夫：不准学生与社会上的人接触，尽量减少学生与校外的联系，严格控制学生放学后回家的时间，有的学校连春游也取消了……在如此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纯而又纯的德育，这样培养出的学生是很难改造社会、创造未来的。社会上的确存在着对青少年成长不利的因素，对这些消极因素的抵御方式之一，恰恰应是教育者大胆地调动社会有利因素来充实、完善学校教育。最近有人提出：“社会教育化，教育社会化”，这颇有见地。我们提倡的德育开放，含义至少有三点：德育向家庭开放，让学校教育引导家庭教育，使家庭教育协调于学校教育；德育向社会开放，帮助学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引导学生在社会风浪中明辨是非，经受考验；德育向未来开放，教育者要站在21世纪现代化中国的高度来审视当今的教育，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现代意识。

9. 德育管理：“人治”，还是“法治”？

不少班主任已经习惯于德育管理中的“人治”：大小事务由教师一锤定音；班风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的强弱，而仅仅取决于班主任个人素质的高低。对学生而言，这种“家长式”（不是常常把优秀班主任赞誉“严父慈母”么）与“一言堂”，与其说是管理，不如说是管制！也许从表面看来，学生集体秩序井然、纪律良好，但潜在的德育负效应是令人忧虑的：学生的主人意识受到制约，创造精神受到束缚，自育自律

能力受到压抑；班级只有教师的绝对权威，而无学生的集体意志；学生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无参与的权利。在这种“德育管制”下成长起来的学生，距离“具有开拓进取品质和一定的道德判断能力及自我教育能力的社会主义公民”（《中学生德育大纲·德育目标》）何止十万八千里！因此，德育管理应从“人治”走向“法治”。通过“法治”管理，使班主任的权威转化为集体的权威，使学生自我教育与管理制度化、“法律化”，使学生民主管理的意识与能力得以增强和提高。在“法治”管理中，学生与教师有同样的权利，教师与学生有同等的义务。德育管理中变“人治”为“法治”，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式的改进，而且是一种德育观念的更新；也不仅仅是教育者个人工作艺术的偶然体现，更是使德育适应社会发展，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

10. 德育评价：是片面测估，还是科学衡量？

比起单纯的教学，德育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反映在德育效果上，所谓“长期性”意味着德育见效慢，周期长，远不是靠一两次教育便能立竿见影；所谓“复杂性”意味着德育效果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有行为的也有观念的，有短时的也有长远的。目前对德育效果的评估往往片面和不公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智论德——一个学校或班级的德育好不好，往往只看其升学率高不高；反过来，一个升学率高的学校或班级，往往可“挖掘”、“提炼”出“德育先进经验”。二是庸俗化——用数字来“量化”德育：计划、总结的份数，纪律、卫生的分数，做好人好事的次数，上交学校广播稿、表扬稿的篇数……教师有填不完的各种表格，学生有挣不完的各种分数。如此“德育量化”非但不可能真正反映出一个学校或班级的德育水平，而且往往会引诱、助长教师和学生弄虚作假。对德育效果全面而科学的衡量，当然要把学习情况作为指标之一，但绝不应把德育看成是智育的“婢女”；科学的量化也是必要的，但德育效果并非仅仅是简单枯燥的数字。衡量德育效果，既要有定量分析，也要有定性描述；既要看短期效果，也要看长远效应；既要看学生一事一时的是非，也应看学生一生一世的行为；既要有学生在校时的表现记载，也要有学生离校后的跟踪调查……对德育效果的片面测估，严重挫伤了许多教师的德育积极性。因此，德育评价的科学化，理应成为德育改革的迫切课题之一。

德育观念的不断更新并不是德育改革的全部内容，但它应是必要条件之一。而就“加强与改进”的关系而言，与其说是在“加强”的前提下“改进”，不如说是通过“改进”来“加强”。我们每一位素质教育的真诚拥护者，应该在这方面不懈探索、不断创新，以无愧于 21 世纪那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伟大时代！

提高师生素质的有效途径

查有梁

经过两个半天的认真阅读，读完了李镇西撰写的《爱心与教育》，其间，我数次流下了眼泪。我不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学人，更何况“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为一位教师的爱心、童心、悲心、真心、信心，自然地流下了热泪。我为四川有这样的青年教师感到骄傲，我为中国有这样的青年教师感到自豪。

《爱心与教育》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素质教育探索手记”。论述一位教师采用什么途径，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素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指出：“发展基础教育，必须继续改善办学条件，逐步实现标准化。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的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这里明确提出了要提高学生的“四大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劳动技能素质、身体心理素质。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题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该报告指出，教育有四个支柱，这就是：“学会认知，即获取理解的手段；学会做事，以便能够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影响；学会共同生活，以便与他人一道参加人的所有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进行合作；最后是学会生存，这是前三种学习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很明显，“四个支柱”与“四大素质”，从整体上看，是全方位对应的，一致的。“四个支柱”立稳了，才称得上现代教育；“四个素质”全面提高了，才称得上现代教育。

我读《爱心与教育》一书，不仅看到了“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有效途径”，而且更多地看到了“全面提高教师素质的有效途径”。实施素质教育关键在于提高教师素质。

1998年3月6日，我为“成都市骨干教师研修班”作报告，题为“优秀教师素质研究”。对于“优秀教师素质研究”，我没有采用“讲授模式”，而是采用“参与模式”——让教师们通过参与、交流，自己教育自己。我提出以下20个问题，要教师们作书面回答，然后我当场作评论。40分钟过后，我收到了64张答卷。

经成都市教科所语文组吴玉明提示，我第一个念了李镇西的答卷。在我念李镇西的答卷时，全场很安静，显然教师们被他的回答所打动。我在念到他的精彩的回答时，内心十分激动，边念边给出好评。

李镇西的答卷如下：

1. 对您影响最大的教育论著有哪三本？

《给教师的建议》（苏霍姆林斯基）；《教育诗》（马卡连科）；《陶行知论德育》（陶行知）。

2. 在您所教学科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专业著作有哪三本？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叶圣陶、吕淑湘、张志公语文教育论文选》；《中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

3. 您认为最重要的师德有哪三点？
真诚地热爱每一位学生； 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 永远不对任何学生绝望。
4. 对您启发最大的教育名言有哪三句？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 “真正的教育自我教育。”（苏霍姆林斯基） “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陶行知）
5. 学生最不喜欢的教师有哪三项缺点？
懈怠； 不公； 专制。
6. 在您的学生时代，优秀教师给您印象最深的有哪三点？
真诚爱生； 教学有方； 谈吐幽默。
7. 您对学生的教育赠言有哪三句？
“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马特洛索夫） “忠实于少年时代的友爱、热情和誓言，这是人生最严肃的事情。”（王蒙） “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
8. 您最满意的论文或论著是哪三篇（本）？
《教育呼唤民主、科学与个性！》； 《青春期悄悄话——致中学生的 100 封信》； 《爱心与教育》。
9. 您最好的教学经验有哪三条？
注重文学感染； 引导学生自学； 师生平等对话。
10. 您采用的教学艺术有哪三条？
让学生不知不觉地进入思维的王国； 让学生不知不觉地燃起思考的火焰； 让学生不知不觉地展开思想的碰撞。
11. 您采用的教学技术有哪三项？
粉笔、黑板； 投影仪； 影视作品。
12. 您采用的教学模式有哪三种？
师生平等探讨； 学生互相交流； 指导学生自学。
13. 您认为优秀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有哪三点？
童心； 爱心； 事业心。
14. 您认为优秀校长最重要的素质有哪三点？
民主； 真诚； 有自己的教育思想。
15. 您认为优秀家长最重要的素质有哪三点？
人格高尚； 不仅仅以分数苛求子女； 理解教育规律。
16. 您认为优秀学生最重要的素质有哪三点？
善良； 正直； 有志。
17. 您对品德不良的学生采用的教育策略有哪三条？
调动集体舆论的鼓励； 有意识地对其感情倾斜； 引导其不断战胜自己。
18. 您对成绩差的学生采用的教育策略有哪三条？
设法增强其信心； 暗中降低学习要求； 创造其成功的机会。
19. 您对心理素质差的学生采用的教育策略有哪三条？
与之建立朋友般的信任感； 保持思想和情感的交流； 有针对性地推荐有益读物。
20. 你认为理想的学校至少应具备哪三点？
民主的校长； 和谐的氛围； 优越的教育科研条件。

李镇西仅在 30 分钟内，写出以上答卷，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这份答卷，正是《爱心与教育》的简明提要。我提出这 20 个问题要大家回答，是“突然的”，他们谁都没有准备，答卷的可信度高。我评论道：“你们对

这 20 个问题的回答，是一本简要的《实践教育学》，你们各人正是按照自己的回答那样，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对这 20 个问题的回答，部分地反映了你们的教育教学水平。”我建议每位教师都应对这 20 个问题给出各自的回答，然后，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共同提高。理论教育学是需要的，因为它系统；实践教育学也是需要的，因为它生动。

在评论李镇西的答卷之前，我并不认识李镇西；甚至在评论之后，也不认识他。我虽然为“成都市骨干教师研修班”讲过几次课，但下面毕竟有一百多位教师，没有一一交谈的时间，我不可能一一认识。这次课后，我又详细地看了收上来的 64 张答案，毫无疑问，李镇西名列第一。一个月后，成都市教科所普教室王必成主任打电话告诉我：“李镇西有一本新著，想请你看后作跋，同意吗？”我说：“可以，等我 5 月初，回蓉后即写。”我正想研究他为什么有如此高的水平。

5 月 8 日，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田曦、郭孝平两位编辑，同李镇西一起来到我的办公室，将《爱心与教育》的校样交给我，这时，我才认识李镇西其人，看了书后，才知其人其书。我把其它重要事情都放在一边，专心看此书，方知李镇西对我提出的 20 个问题的答卷，之所以名列第一，实非偶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977 年恢复高考后，李镇西首届考入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 年毕业后回到乐山市一中，做了九年语文教师、班主任；1991 年应聘到成都市玉林中学当班主任、语文教师，工作了六年；1997 年到成都市石室中学任教。1966 年至 1976 年，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破坏，其间正是李镇西读小学和中学的年代，他受到的学校基础教育不可能是良好的；他的大学生涯，并非在名牌大学中度过，也并未获硕士、博士学位。然而，经过 17 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他作为一位教师的全面素质提高得如此快、如此高，这是很值得研究的。我认为，他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们，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为他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这是不能忽视的；但是，更主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从实践中学习，从实践中提高，从实践中发展。他充分实践了以下四个成人教育模式：

其一，工作模式：参加教学，工作中学。过程是：教学 经验 比较理论。

其二，经历模式：参加活动，经历中学。过程是：游历 考察 采访总结。

其三，交往模式：结识师友，交往中学。过程是：乐群 亲师 访友交流。

其四，自教模式：系统读书，自教自学。过程是：阅读 思索 笔记创作。

我在《教育建模》（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年）中，研究过上述四个成人教育模式，所幸李镇西正好是实践这四个教育模式的突出代表。必须补充的是：他非常善于向学生学习。《爱心与教育》正是他与学生们的共同创作，因而也适合中学生阅读。

《爱心与教育》，正是他广泛而深入地实施了上述四个教育模式，才使之经过 16 年的努力，即达到一流水平，这为我们如何有效地提高教师素质，提供了新的思路。

我对《爱心与教育》一书给出以下简要评论：

《爱心与教育》是一本成功的“实例教育学”。此书既有精要的教理阐述，又有典型的教例剖析。作者对“逆境”学生的关怀，对“后进”学生的转化，对“优秀”学生的培养，对“心理”教育的尝试，对“有效”德育的探索——有普遍的启发性，值得每一位中小学教师一读。家长阅读此书也会大受教益。这是一本智慧与情感整合的教育学。作者做到了：“言为人楷，行为世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真正做到了：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根本宗旨。这本书“言之有人”，“教之在人”，讲真话，有感情，充满爱心。作者的教育思想源于苏霍姆林斯基，又超越了苏霍姆林斯基。本书也反映了作者如何开放式地进行语文教学，对学科教学改革也很有启迪。本书为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素质教育的理论、模式、实践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为了生活的教育当然也是丰富多彩的。《爱心与教育》提供的许许多多具体做法，是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提出的，不是要人照搬；重要的是从整体上领悟这本书的思想、观点、方法。具体的做法，需要每一位教师也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自己去创新。科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教育学的生命力也在于创新。有创新则立，无创新则废。我们需要理性的教育学，也需要感性的教育学；我们需要共性的教育学，也需要个性的教育学；我们需要一般的教育学，也需要特殊的教育学；我们需要理论的教育学，也需要实践的教育学；我们需要原理的教育学，也需要个例的教育学。像《爱心与教育》这样高水平的生动的“实例教育学”，真是太少了！但愿这一本有创新的“实例教育学”引出更多更好的有创新的“实例教育学”。

李镇西从事过教育工作的三所中学，都是很有名气的学校。属于“处境良好的一流学校”。大量的学校是“处境一般的普通学校”，也有不少是“处境不利的薄弱学校”。我对在后两种学校工作的教师深怀敬意，对在后两种学校学习的学生深表同情。一流学校在于一流教师，一流教师在于一流教学。在后两种学校里，多一些一流教学，就可以多一些一流教师，就有可能成为一流学校。虽然，永远都不可能所有的学校都是一流学校；但是每一所学校里，都完全有可能出现一流教师和一流教学。我们中国的每一位教师都能像李镇西那样，通过教育教学实践，大大提高教师自身素质，从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素质，实施素质教育定会取得成功。

1998年5月10日

（本文作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省智力开发与专门人才研究所所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后记：我的感谢

李镇西

这可能是一份会让读者感到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必须列出来，因为在我从教 17 年以来，正是这些同志、朋友、师长、专家、领导……先后给我以真诚的帮助和支持（大体按时间先后为序）——

吕安，我的大学校友，原在乐山师范学校执教，现任眉山地区教科所副主任。真挚的情意和共同的志趣，使他一直是我事业的同行者。

冯宗秀，乐山一中原体育老师，已退休。她是我班主任工作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我带的第一个班就是从她手中接过来的。

赵久如，乐山一中老校长，已离休。我第一次打学生时，是他给我推荐了苏霍姆林斯基《要相信孩子》。这是我读的第一本苏霍姆林斯基著作。

林祥康，乐山一中老校长，已离休。我编第一本“班级史册”《未来》时，他曾解囊相助。可当年年轻气盛的我常为教学和他争吵，现在想起来，惭愧！

罗永昌，乐山一中前校长，现乐山市教育督导室主任。是他一次次亲切而直爽的谈心，使我逐步走向成熟。

吴忠中，现乐山一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当我遇到挫折时，是他给我以充满热情的鼓励。

谷建芬，著名作曲家。她为我的“未来班”谱写的班歌，不但激励着我的学生奋发向上，而且也一直鼓舞着我“守好脚下这块净土”（谷建芬语）。

刘希亮，原《中学生》杂志主编。他曾专程从北京到乐山来采访我，给我以很大的鼓励。我给历届学生朗读的《爱的教育》，就是他赠送给我的。

唐建新，乐山市教科所原副所长，现在深圳市南山区教研室工作。他给我以教育思想的直接影响。我的一个教改课题，就是在他的指导下获得成功的。

邓富源，眉山中学校长。他是我最初进行教育改革探索时的志同道合者，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通过书信和电话互相勉励。

王宝祥，《班主任》杂志主编。是他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教育论文《师爱二题》；《班主任》杂志还曾全文发表我的《“未来班”实验报告》。

蒋自立，武汉市首义路中学原校长。他是我的“文友”，更是我的老师。我第一次到省外讲学，就是受他之邀。遗憾的是，现在我和他失去了联系。

丁如许，江苏泰州中学教师，优秀班主任。他以“班级活动教育”见长，给我以很大启发。虽然相隔遥远，但我们一直书信往来，互相交流，互相勉励。

程永宁，《教育导报》总编。由于他的支持，我在《教育导报》发表了一系列教育教学论文。

罗大宪，《教育导报》原副总编，现四川省教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一篇介绍我教育事迹的见报文章，就是他 1988 年采写的。

傅冠华，河南西华县五二农场子弟校政教主任。1991 年春节前夕，他专程从河南来乐山一中看我，交流教育心得，令我感动至今。

朱根发，《河南教育》原编辑。是他为我开设了《集体主义情操教育》专栏，这是我第一次在教育报刊上发表专栏文章。

吴盘生，江苏无锡市教科所研究员，曾任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文化参赞秘书。他的来信，使我在教育理论方面获益不少。遗憾的是，我俩至今未曾谋面。

唐云增，江苏无锡市教科所研究员，已退休。班主任理论研究专家。他的亲切教诲和高尚人格，给我以深深的影响。

王逢贤，东北师大教授，教育家。我曾冒昧去信向他求教，很快便收到他长长的来信。这封凝聚着教育前辈殷切期望的信，我一直珍藏着。

彭柏林，四川省委组织部干部。这是一位我很敬重的共产党人。在我教育历程的多次关键时刻，他都给我以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杨连山，《天津教育》编辑。他不但编发了我不少论文，而且1992年《天津教育》上组织了围绕我班级管理方式的争鸣，使我颇为受益。

张万祥，天津大港一中教师，天津市模范班主任。我们因共同的事业心而结为朋友和同志，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宝贵的东西。

杨兴政，成都玉林中学校长。我在玉林中学工作期间，他给我提供了教育探索的条件，我永远铭记他对我的事业曾有过的支持。

傅良材，成都玉林中学研修室主任。我刚到玉林中学便得到了他真诚的关心，对我后来的教育科研，他也曾给予大力支持。

蒋杰根，成都玉林中学语文教师。我们是同事也是朋友，但他宽厚的为人，丰富的学识，让我更愿意把他视为兄长和老师。

刘传碧，成都玉林中学数学教师。和她合作三年，我从她身上学到了淡泊名利的做人态度、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和对学生真挚的爱。

郭景坤，成都玉林中学数学教师。他曾和我一起进行教改课题的研究，在教育探索中，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赵应红，原成都玉林中学政治教师。和她共事时，她曾对我的教育工作提出过许多好的建议，并曾为我出版专著尽力。

任维丽，四川科技出版社编辑。正是通过她的辛勤劳动，我正式出版了第一本专著《青春期悄悄话——致中学生的100封信》。

史有为，《中学语文教学》编辑。体现我语文素质教育的几篇重要论文，都是她为我编发在《中学语文教学》上的。

范守纲，《语文教学》原副总编。他曾来信对我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勉励。

唐晓云，《语文教学》副总编。他约我写的《让思想冲破牢笼——语文教学中学术氛围的培养》，被发表在《语文教学》“优秀青年教师名录”栏目。

鲍东明，《中国教育报》编辑。他鼓励我写了不少有一定价值的关于素质教育探索的文章。

王必成，成都市教科所普教室主任，语文特级教师。他对我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给予积极的肯定，并多次为我提供了宣传素质教育的讲坛。

吴玉明，成都市教科所语文教研员。她经常对我的语文素质教育实践予以具体的指导，并且在她的辅导下，我多次较为成功地上了语文教学公开课。

汪定远，成都市教科所语文教研员。他对我的语文教改探索，给予了多方面的理解与支持。

王绍华，成都石室中学校长。承蒙他的厚爱，我得以在石室中学这座具有悠久文化积淀和优良教育传统的千年古校工作。

徐敦忠，成都石室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已退休。他曾精心辅导我写语文教研论文，并做认真评点分析。

王志坚，成都七中校长。他对我的教育思想非常理解。早在 80 年代，他便关心着我的教育探索，现在还常常给予我许多有益的忠告。

冯惠芹，成都十二中数学教师。她所带的班和我的班曾结成“友谊班”，在班主任工作方面，我向她学了不少东西。

张新仪，乐山市草堂高级中学物理教师，我中学时的班主任，已退休。我的教育思想，一直有着她当年教育的影子。现在她还常常对我进行教诲。

杜道生，四川师大古汉语教授，我大学时的老师。我常常收到他写满小楷毛笔字的来信，阐述他对教育的许多精辟见解，给我以极大的启发。

喻钢，原四川邻水中学教师，我的大学同学。80 年代，我们曾通过书信交流教改得失，我从他那里获益不少。

江清源，四川汉源二中教导处主任，全国优秀教师。作为教育领域为数不多的大学同班同学之一，我们常常互相勉励。

李效宁，我的大学同学，原在四川省教委高教学会工作。在我遇到挫折时，他曾给我很大的安慰，并为我呐喊、奔走。

凌一航，我的大学同学，成都市国土局干部。作为我的挚友之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给予我最真诚的支持。

李亚东，美学硕士，青年学者。他的职业与教育没有直接联系，但他却一直关注着我的工作。同他的交往，扩大了我的学术视野。

邹小工，四川文艺出版社美术编辑，是我的学生家长。她曾为我编的“班级史册”《恰同学少年》、《童心》、《少年》等书，无偿设计封面。

唐海海，深圳高级中学校长。出于信任和厚爱，他曾希望我去他的学校工作，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前去，但知遇之恩难以忘怀。

徐惟诚（余心言），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现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执笔为我这本小书作序，其殷切的鼓励我永远难忘。

查有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的《系统科学与教育》、《教育模式》等著作曾给我有益的启示。他饱含激情为本书写跋，更使我深受感动与鼓舞。

……

另外，经常给我以支持和帮助的，还有成都市中青年骨干教师研修班语文学科的老师，他们是：钟毕、杨兵、易伯伦、吴康君、张天劲、曹诚、李晓年、张伟、李勇、陈功玲、汪娅丽、王秉蓉、杨卓、阮萍、谭同。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参加教育工作以来教过的近 1000 名学生及其家长。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教过的每一位学生都是我教育的试验品，正是在不断的“试验”中，我的教育思想才一天天走向相对成熟。毫无疑问，我给他们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教育遗憾，为此我感到真诚的内疚；但我也因此而深深地、永远地感谢他们！

将名字编入学生心灵的词典，将事业载入祖国教育的史册——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追求，我将继续以此报答所有关心我、支持我的人们。